
C. Mackenzie 著

羅 斯 福 總 統 傳

張 尙 之 譯



峨 嶺 出 版 社 發 行

一 九 四 七 年 九 月

羅 斯 福 總 統 傳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者
翻 譯 者
發 行 人
發 行 者
代 發 行 所
特 約 經 售 處

C. Mackenzie
張 尙 之
方 學 武
城 滄 出 版 社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轉
聯 營 書 店
漢口·重慶·成都
利 羣 書 報 發 行 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定 價 國 幣 十 元 正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九 月 初 版

S. 1—2000 P. 1—324. (2)

目次

羅斯福總統傳	張尙之譯(一一—二四)
羅斯福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	柏園(二四七—二六三)
羅斯福年譜	柏園(二六三—二九四)
後記	柏園(二九五—二九六)

第一章

傳記作家要研究一位偉大人物出生的種種預兆，必須在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誕生時的世界政治狀況中去覓取資料。它們是很清楚的。

「這一年在德國重復演着無恥的，對猶太人的暴行，這些暴行表示出普魯士和它那自誇的文明中仍舊保持着古老中古時代野蠻的，不能容忍其它種族人民和宗教的精神。」

這是「每年紀事」(Annual Register)在一八八一年作德國一戰時關頭的一段話。

那年法國佔據突尼西亞，引起國際間的緊張局面，一八八二年時，俾士麥看到英法爲保衛蘇彝士運河有佔領埃及的可能，因而竭力激起種種困擾，意大利對於大不列顛在突尼斯問題上給她的難堪，很爲不快，而「這種不快……使政府和人民都想另外尋覓與國，因此使他們聽那些不斷鼓吹親德的人們的言論……把德國當作在歐洲和意大利的利

益完全一致的國家看。」

俾士麥就從這種不快事件中鍛製出三國同盟。

三四個月之後，甘貝他在法國內閣中曾經批評道：

「有許多人毫不了解真情，認為有和英國衝突的可能。我以深深自覺到我祖國的利益和幸福的立場來說，同時我深深地相信，而且仔細考慮過未來的形勢，我得再度指出：和英國磨擦鬥爭，是一切冒險中最不該有的舉措……那怕出最大犧牲的代價，我們不能摧毀英國同盟……沒有它，法國的利益無法維持。如果不幸破裂，在地中海上的一切將完全喪失。」

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出世才二十天光景，史可貝萊夫將軍被俄國外交部解差，因為將軍在巴黎告訴了一批塞爾維亞學生說條頓和斯拉夫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鬥爭，而且表白了他願能和他的聽眾們在戰場上見面共同對他們的敵人作戰。「德國人深入並且散佈在俄國各地各種事業之中。俄國人是被它政策所愚弄的人，是它陰謀的犧牲品，是它武力的奴隸。」將軍在夏季被召回聖彼得堡；他在返國路過華沙時，曾經對一羣波蘭人說如果沒有俄國衛戍兵隊在華沙，必將有德國衛戍兵隊。這位土耳其戰爭中的

英雄大受聖彼得堡居民們的歡迎；但是他却受了沙皇嚴重的譴責。但是，尼黑派的思想却「在俄國社會各階層中有如此驚人的進展」，以致報紙 *Kölnische Zeitung* 在批評允諾制定憲法時認為「沙皇和他的大臣們所專注的大問題不再是如何好好統治，而是如何保持統治權力的問題了。」

富爾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出世前三個月，適值在約克城的康華利斯 (Cornwallis) 投降百週年紀念。在紀念儀式將終時，美國的陸海軍對英國國旗致敬，以「表示在未來年中兩國之間將永遠互相信任，和平善意相處。」

這重大而愉快的典禮，正在迦斐爾德總統被支加哥一個律師所刺這一事件之後舉行。這律師忘信「要結合共和黨中兩派，同時挽救共和國，使它不致轉入叛徒和民主黨人手中的唯一方法，就是悄悄地移掉大總統。」他用一枝手槍完成這種移掉的工作。這個人心想竊取地盤的人的瘋狂舉動，使人們更堅決地認為國內政權必須從政黨政治的腐化中拯救出來，由此而自然形成一種信仰，認為聯邦當局必須為國家的尊嚴和行政效率而維護自己的立場。當這位嬰兒羅斯福才過兩個月的時候，他同族中有位激烈的青年正被選入紐約州議會 (New York Assembly)，開始攻擊彈劾法官衛斯特勃洛克，認為他

「和高傑·高爾德通詞受賄，爲了財富而濫用他崇高的司法地位。」這位青年就是西沃圖·羅斯福。

正當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出世那天，一家大金融行家延期付出款子，引起了歐洲大陸上嚴重的金融危機。但是並沒波及大不列顛。在英國，格萊德史東 (Gladstone) 先生在他的預算演說中將冬季不敷的八萬五千鎊用「死亡稅」來彌補，這是很新奇的，而在富人們發現了無法將每鎊納五便士的所得稅減爲四便士，很感不滿。

最後還有一件該記錄下來的時代徵兆，就是當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出世六星期時，布納拜 (Burnaby) 上校帶着毯子，一些三明治，幾瓶礦質水，駕汽球橫過英倫海峽，完成了當時認爲很驚人的在二千呎高空每時推進三十哩速度的紀錄。

這位美國未來大總統出世年月的前後也許不足以影響他日後的目標；但是這年月却是命運決定他在日後要獻身於無數人矚目的事業上的適當時機。在他這一特定時機中出生的人，沒有比他更完備的，這話雖然是在他事業尙未完成時說的，可是作者是由於熱烈的信仰所激動，相信未來的一切一定會證實這句話的。

在時間上如此，在空間上也是如此的。命運決定選擇這樣一個人物在現在正在進行

中的人類進化偉大戲劇中担任要角，這要角地位是命定了要美國人——而且要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來担任的。這羅斯福是道地美國人，我們在此該記住孤立主義乃是一種從下列兩種思想中產生出來的見解：一種是種族太接近歐洲的不安感；另一種是地理上距離的安全感。

使羅斯福能認出在國家狀態完成的情況下，他的國家不能採取以冷苛，妬忌的獨善政治孤立為基礎的態度來對付世界其它國家的，正是他那種美國人的作風。他出世時，沒有一點血液不是有二百年以上的美國歷史的：甚至有比二百年更久遠的美國血統。

在歐洲，沒有一個城市（甚至威尼斯也計算在內）看來是像安斯達坦（Amsterdam）那樣為海水所貫穿縱橫着的，懸在深綠色的運河水流兩岸的榆樹散落着沙沙的葉片，在城中，肥肥的鷓鴣像農家飼養的鴨子似地，懶洋洋地浮在池沼中。當安斯達坦商會還在經營在大西洋彼岸新建立的新荷蘭省份時，已經建立起來的倉庫還在這些運河兩岸裝卸貨物。在曼哈丹（Manhattan）的小島被名為新安斯達坦是很恰當的，因為它也被海洋所縱橫，那裏，古老的建築還沉緬在舊日的迷夢中。

大約是在十七世紀初葉的時候，有一位叫克拉埃斯·馬丹仁（Claes Martenzen）

(尼古拉斯，馬丁 Nicholas Martin 之子) 的青年柴蘭德 (Zealand) 人，從安斯達坦或者另一個荷蘭港埠動身，離開羅斯維爾特 (Rosevelt——意為玫瑰田) 小村莊到新世界去。他的兒子尼古拉斯出生在曼哈丹一個田莊中，他有兩個兒子，約翰尼斯 (Johannes 小名約翰) 和傑可伯斯 (Jacobus 小名詹姆斯)。西沃圖·羅斯福是他們兩人中年長一位的後代，查爾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是弟弟的後代。我們該注意當初柴蘭德那個小村莊的名稱在今日羅斯福的姓中還保持原來的讀音——讀 Rose——，不是 Roos——。兄系中保持它荷蘭血統年代較弟系為久。西沃圖·羅斯福的祖父，考尼留斯·梵·史查克·羅斯福 (Cornelius Van Schaak) 是純粹荷蘭血統。他第五代堂兄弟富蘭克林的祖父伊薩克 (Issac) · 羅斯福主要是英國血統，遠系血統中混合着荷蘭，瑞典，德國和法國的混雜血液。

荷蘭和英國在美洲的對立和嫉恨非常之深。新安斯達坦在開報時即被認為是公開的地方。事實上，當一六五三年傳說克倫威爾準備率遠征軍來攻該地時，橫過曼哈丹，立刻建築起防守工事來，這種工事到現在還為華爾街上所紀念着，但是當却理士二世任命他的兄弟約克和阿爾巴奈候爵為康乃克的克特河 (Connecticut) 和第拉瓦灣 (Delaw

are Bay) 以東地區間的皇家土地宗主 (Lord Proprietor) 時，候爵的代表和統治人，理查圖·尼可爾斯 (Richard Nicolls) 上校却發現新安斯達坦的人民首領和其它顯要居民是協助他的第五縱隊，從荷蘭手中將吏治機關很巧妙地轉入英國手中。荷蘭的私人權利仍舊被尊重。新荷蘭和新安斯達坦乃成爲紐約州和紐約市。赫德遜河上的奧蘭琪堡 (Fort Orange) 乃一變而成了阿爾巴奈堡 (Fort Albany)。這一事件的真實一面乃是早在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和英國人都被決定着要成爲美國人了。

在革命爆發時，伊薩克 (賓蘭克林·D·羅斯福的高祖父) 是紐約城中一位有地位的公民，一位糖商。他被選爲州議會的議員，在獨立鬥爭中積極地活動過。當紐約被紅衫軍所佔時，伊薩克·羅斯福放棄了城中的財產，遷移到荷蘭郡，在那兒他服役於荷蘭軍第六師中。一七七七年至一七八三年，他是紐約州參議員之一，他是在一七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歡迎華盛頓率領部下從波威雷進入紐約的公民之一，那時，英國獅旗被降下來，星條旗開始飄盪了。

伊薩克·羅斯福的兒子詹姆斯和瑪利亞·愛麗莎·華爾頓 (Maria Eliza Walton) 結婚，她是大商人兼船公司主人阿伯拉罕 (Abraham) 華爾頓的女兒。伊薩克·羅斯

福除了其它活動外，還任過紐約銀行的總理。他是十足的商人。他的兒子詹姆士還是一位商人；不過也許在獨立戰爭中從紐約退居荷蘭郡的機遇使他體味到鄉村生活的况味。總之，他出售了在哈冷（Harlem）那兒一塊一世以後可以作為招致鉅富的基礎的土地，在阿爾巴奈郵街（Post Road）建了一座屋子。詹姆士的兒子伊薩克和瑪麗·李培卡·阿絲濱華爾（Mary Rebecca Aspinwall）結婚。伊薩克的兒子詹姆士，就是富蘭克林的父親，生於一八二八年，先和一位霍蘭女士結婚，生子為詹姆士·羅斯福·羅斯福（James Roosevelt Roosevelt）。未幾，他的妻子去世，阿爾巴奈郵街的屋子也遭焚毀。

詹姆士·羅斯福仍舊是一位紐約商人；但是他的心却依戀着鄉村；於是，當有人出售紐約郊外那片美麗的，靠赫德遜河，在海德公園（荷蘭郡中）裏的田莊和古老殖民時代的農舍時，他馬上買下那五百畝地，渡着鄉下紳士的生活，他那時有不變的投資和一些指使的權柄，可以無愁地生活。他在農舍旁加了一排房屋，開始經營，使農場可以生產維持。五十二歲時他和沙拉·台爾阿諾（Sara Delano）結婚。富蘭克林的母親是華倫·台爾阿諾（Warren Delano）五位美麗姑娘中的一位，這位新娘比丈夫小二十六歲，她的美國血統較他遠久。

一六二一年，由一對法國人養育於萊頓（Lyden）的菲力浦·台爾阿諾依（Philippe DeJannoye）搭一葉小舟到了麻省的柏雷茅斯（Plymouth），和開拓者們同謀前程。他的兒子裘納丹（Jonathan）和大契約（the Compact）簽字人之一，李嘉圖·華倫（Bertha Warren）的女兒繆珊（Mercy）結婚。李嘉圖·華倫的妻子帶了他們五個女兒在一六二三年抵柏雷茅斯，比他多活四十餘年。這位出色的女人在七十歲時，依然不願當時非議守寡之風，堅毅地保住她寡婦的節操，開始收買土地：一六二三年，她的墓碑上這樣刻着：「密斯特理絲·伊麗沙白·華倫，一位九十左右的高年寡婦，過了很安適的生活，像熟透了的穀粒似地來到她的坟中。」

台爾阿諾家是船主人和商船水手，富蘭克林的外祖父是來往中國經營商業的。沙拉·台爾阿諾在生子前二十年時，曾經搭一艘茶船到過中國，她有一位漂亮，為她所敬愛的叔父，叫富蘭克林，她以此名她自己的兒子。如果不是詹姆士·羅斯福夫人下了決心要命自己兒子的名字叫富蘭克林，台爾阿諾，那麼他也許會按照羅斯福家中命名循環的習慣，被命名為伊薩克了。他之沒有被名為伊薩克，難免不令人稍感遺憾。這名字可以在等待着希特勒的那種詩意的正義上，多增加一分情趣。

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以前的美國大總統中，祇有五位是有開拓者（Pilgrims）的血統的，西沃圖·羅斯福並不在其中。很多書本中記載着他那些開荒的祖先們的故事，他們在故事中都顯示出他們最初離開歐洲，到新世界上一個新國家中來時那種興奮情緒所激發的充沛精力。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如彗星似地出人頭地，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無論在體力和智力方面，都沒有衰退的情形。那種作爲未來尊貴家族的試金石的活潑生活力，始終是被保持而傳授着的。這種生活力是美國血統的特徵；我們可以在英國的例子中，看到這種潛力如何地重新奮發起日漸衰落的尊貴家族。溫斯頓·邱吉爾先生所以有代表並且表現英國精神的能力，原因也許不在他是馬爾波羅夫（Marlborough）的後代，而是在他有一位美國母親，這說法已有時間作證。倫道爾夫·邱吉爾（Randolph Churchill）爵士能用語言來攻擊別人，但是使邱吉爾先生能辱罵墨索里尼爲鬣犬，罵希特勒爲渴血狂的，不是那種勃冷希姆（Blenheim）的作風，而是曼哈丹的派頭。祖父李奧那圖·傑羅米（Leonard Jerome）的精神鼓舞了溫斯頓·李奧那圖·斯賓塞·邱吉爾。勃冷希姆也許給予了清朗的時期；但給他們生命的却是紐約路邊的生氣。當邱吉爾先生說墨索里尼呼氣中迷漫着吃死人肉的臭味時，那個小小的意大利牛蛙反過來叫着說邱

吉爾先生呼氣中滿是酒精和尼古丁的氣息，這種反罵所引起的勉強的微笑是以美國胡桃樹作骨架的，它和英國橡樹無關。邱吉爾先生這種使我們感到活躍有生氣的攻訐他人的返老還童良藥，是波那·勞，包爾溫，蘭珊·麥唐納，或者乃維爾·張伯倫所製造不出來的。它們是礫質清涼劑，不是淡茶，也不是輕淡的印度麥酒。約翰牛（John Bull——即英國）可能不啣烟斗而吸一枝雪茄，但是他並沒有把絡腮鬚剃去而留起山羊式的鬚髭來。戰時的不列顛可以毫無躊躇地由邱吉爾先生來作她外表可見的表記，顯示出她要世界上認清她的一切；而世界上各國也就以他為她的代表了。如果說不列顛隨邱吉爾先生之起落而起落，這話並不是純然出於激動而說的，但這話也並不阻止他的讚仰者們，使他們不承認這位英國鸞鳥先生一身羽毛中雜有不少肥胖的美國知更雀的羽毛的事實。

邱吉爾先生的滔滔責難之詞，使自命為醫者，認為英國紳士們現在不敢發一言之詞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感到狼狽，羅斯福先生的不能使他們改變對美國的種種無知，不求了解的看法，也使他們感到狼狽。在夢中以他自己的睡衫當古羅馬公民外衣的墨索里尼，和在夜暗中醒着和雷電之神交談的希特勒，他們對美國的認識非常淺薄，這兩位學識淺薄的傢伙，這兩個在歷史的大湖水面上浮滑的水甲虫，簡直做夢也想不到羅斯福先生

的背景。他們不會了解那種道德上顯明的超越性所有的靜默，簡易的臆測。墨索里尼的祖先們摸索在羅馬格那（Romagna）沼澤上的熱狂迷霧中，希特勒的祖先們摸索在中歐擁擠的塵土堆中。在他們兩人看來，美國不過是一片從歐洲破沉的船隻上逃出來的一些耗子們的偷生之地，這羣耗子在那兒漸漸長肥了：他們全沒有把美國當一個國家看待。

他們兩人簡直不能認出使羅斯福大總統有能力，有權利代表一個覺得有保持歐洲精細的產品使它不致被粉碎的責任的國家說話的背景，乃是他那作為美國人而內涵着的，三世紀以來孕育着的良知。

也許希特勒到底猜測到羅斯福是他主要的對敵。當他用花言巧語聲言他在千年之內將領導人類前進時，他也許已經覺得他這種進化計劃的真正障礙是兩個美國精神。羅斯福先生是否具體代表這種精神呢？這問題的答案正是本書所要探求的。當墨索里尼跳越過『時間的落後深淵』，扮起了凱撒大帝，在阿爾比翁（Albion）的海灘上和一位染成蔞藍色的邱吉爾作戰時，那種狀況可以使我們發笑。羅斯福和希特勒是在進行一種進化的鬥爭：他們是為人類的精神而進行戰鬥。他們幾乎同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決鬥場的，這次戰爭正是他們兩種不同的哲學的鬥爭。這樣說也許對希特勒的威嚴太加誇張；

但是他是以且耳曼人來說話的，因此我們也不能輕輕放之一笑。羅斯福和希特勒是爲未來而搏鬥：邱吉爾有一半（這一半也足夠應付他的對手了）是爲過去而和墨索里尼在搏鬥着的。

第二章

布洛克林橋 (Brooklyn Bridge) 隱約在曠野上被秋天的夕陽映成一片金黃的煙霧裏，橋後，曼哈丹森黑得像一位龐大怪人的堡壘似地聳立着；橋下，漂浮着東河 (East River) 來往船隻的水流，有點像透納筆下畫出的大幅浪漫而神祕的，滿是雲的艤舟圖；到處都是噪雜的鬧聲，要不是面前的偉大景色，這鬧聲真令人不耐煩了。

河邊車道 (Riverside Drive) 和赫德遜河對岸尖頭鐵柵 (Palisades) 上搖擺的樹枝，在十月藍色的薄暮中閃爍發亮，格蘭德 (Grant) 的坟墓寂靜地躺在逐漸濃厚的黑暗中。

西點 (West Point) 和哈佛的足球場，潤濕的落葉散發着英國的氣息，古典的小叢林和建築，在它們周圍紆繞着，秋天下午，大家都去運動時帶着的那種蘊藏在空洞的牛津學院中的氣氛，近旁，寬闊銀色的河流在下面流着。

荷蘭郡的包甫凱撥西 (Poughkeepsie) 大街上，行人匆促的來去，從伐沙 (Vassar

來的女郎們趕去看戲，寬闊銀色的河流在下面流着。

在哥倫比亞州，赫德遜的趕集日，小城市的街道上擠滿了農夫們，寬闊銀色的河流在下面流着。

多山的阿爾巴奈和龐大的議事堂，還有泰恩。歐克大飯店(Ten Kijck Hotel)和它那略帶一點殖民時代古色古香的建築，還是那條寬闊銀色的河流在下面流着。

這些是一九一二年秋天，富蘭克林·D·羅斯福進行選舉烏德羅·威爾遜任大總統時，曼哈丹和赫德遜的情形。那年秋天，他和羅斯福夫人在泰恩·歐克大飯店中租定了兩間房間，可惜他們沒有在這許多紀念品之中，為從那時起，活躍在人們心目中三十餘年的赫德遜留一點紀念。作者到包甫凱撥西時，並沒有見到海德公園中那座殖民時代的農舍，但是作者至少領略了那條河流和它的鄉村所給予一位人物的影響，在這位人物和他的祖先的生活中，這條偉大的河流滔滔地流着。

富蘭克林·羅斯福孩提時代非常愉快。他的父親有點像祖父那樣慈祥地愛他，但是並不像祖父那樣慣寵他。他母親正如一般青年母親那樣，非常喜歡她這個可愛可喜的兒子。

他母親曾經講起一個故事，這故事顯示出在一個與外世隔絕而且受仔細拂愛的兒童，有時也會感到壓抑。他大約五歲時，有一天，他顯得很陰沉，他父母怎樣都不能使他高興。後來，羅新福夫人非常奇怪地問那個孩子是不是心裏覺得不快活。這裏用她的話說：

「他並沒有馬上回答我，過一會兒，他很正經地說：『是的，我不快活。』」
「我問他爲什麼不快活，他又沉默了一會工夫。然後他作了一個表示出煩惱的手勢，兩手在胸前一拍，說道：『噢，爲了自由呀！』」

「現在說來，當時的情形像是很滑稽；不過那時我真大吃一驚。因爲他不過是那麼樣小的孩子，可是他的聲調却使我發現他說這話是非常認真的。」（詹姆士·羅斯福夫人作：我的孩子富蘭克林——頁五）

我們想起宣稱人類自它的創造者那裏接受了某些不容歧視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以及快樂之追求等權利的獨立宣言，同時又想起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國會中演說時宣稱的四大自由，我們不難想到這位當維多利亞女王五十大慶時還穿着水手裝的小孩子說出這樣的話，正表示出他有着一種潛在的偉大氣質。無疑的，他那時所抱有的乃是時

間，時間的暴君從來不會站在兒童這一邊的，而保姆式的許多規則，也常在孩提生活上，投射下牢獄的陰影。在八十年代中，我們在英國的兒童們總以為我們的美國兄弟和朋友們一定比我們自由得多；可是現在我們會感激那一對美國夫妻在富蘭克林早年時就以溫和而堅決不移的紀律來輔育他，如果他當時沒有這種天生的不滿情緒，也許我們在半世紀之後的今日，將陷於十分殘酷的命運之中了。如果他早年受了嚴而合理的管束，如果他他不浪費零錢，如果有人送了一把槍給他而他知道如何去適當地運用它，如果他知道小狗小馬不是一種玩具，而是該由他負責看管的話，這全是他所受的訓練合式，使他祖先所傳給他的那種超人的活力，得到了最大的成果。祇有一個主要的希望是受堅決阻抑的，那就是他想成為水手的企望。他很小時就受着海水的引誘，他傾心於馬漢(Mahan)寫的：海洋力量對歷史之影響。他和一個小朋友在一株長青松頂上造了一隻帆船，在它上面過着想像中的航海生活。他開始他的船舶博覽室。航行到歐洲，以及他母親家那種浮海的傳統和許多航海故事更加使他對海洋懷念不已。他兩歲時就橫渡了大西洋，七歲至十五歲之間他每年要在船上過好幾個月。有兩個夏季他進了貝特·瑞漢(Bert Zanah-ain)的公立學校，他父親當時在那兒治病。他也曾經和一位導師乘自行車遊歷德國和

瑞士，他們一天之中有四次被德國警察所捕——一次是爲了追一隻鵝，一次爲了在路旁摘莓子，一次爲了帶着自行車走過火車站的候車室，最後一次爲了在日落後騎車進入斯屈拉斯堡（Strasbourg）。他愛好自然史，這種愛好是在敦倫的自然史博物館的鳥類室中開始被啓發了的。這一家人那時是在梅茵和新勃隆斯威克（New Brunswick）之間未定界區的巴森馬可台灣（Passamaquoddy）的坎普貝羅（Campobello）島的小廈中渡過幾個夏季。那種生活更深刻化了他對海洋的懷戀；當他父親給了他一隻二十一呎長的帆船，船上有兩個艙和一個中艙（他就在這兒學習一個高明水手所必需的，關於航海所需的學識），於是他更熱中於想成水手的希望了。希望並未實現。他的正式教育始於格魯頓（Groton），而不始於安那坡理斯（Annapolis）。

不論當時詹姆士·羅斯福阻抑他兒子這種希望的動機如何，他這種阻抑在今日總是值得我們感激的。由於一個人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的一點成見，這件偶然的小事，世界乃得保有自由。事物的結果往往是無法預定的。這一點，當青年富蘭克林不到安那坡理斯而到麻省有名的格魯頓預備學校去時，就足以使我們注意了。英國讀者們該知道他們所謂公學者，正是美國人的預備學校，而美國人所謂公學，正是他們所謂的初級學校。

。正如哈佛和雅禮等於牛津，格魯頓和聖保羅就等於伊頓和哈羅。

富蘭克林·羅斯福入學很晚。他進格魯頓時實際上已經是十四歲半了。他母親在回憶他童年時的情形，深以未能早日送他入學爲憾，而有人以爲反對他從事海上事業的是她和他的父親，因爲那種事業會使他遠遠地離開她的。

不能早日入學，乃是孩子不時發熱生病的結果。他父親也因爲他的病更堅決反對他進安那坡理斯和加入海軍。一八九八年二月，西班牙和美國之間的戰爭因爲美國戰艦梅茵號在哈伐那港爆炸沉沒而更趨激烈。那時西沃圖·羅斯福行年三十九，正任第一任麥金萊 (McKinley) 政府中的海軍助理部長。他在他的上司郎氏 (Long) 缺勤時，執行部長職權，發電給香港的戴威司令 (Dewey)，指使他率美國亞洲艦隊在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摧毀了馬尼刺灣內的西班牙艦隊。但是西沃圖·羅斯福單單拍發行動命令的電報是不夠的：他要實際行動，不要空話。一禮拜之內，他辭去了行政職務，開始組織他要在古巴指揮的著名的『怒潮騎士』 (Rough Riders) 部隊。

那時，西沃圖·羅斯福對作海軍助理部長，管理對內事務還感到厭煩，那麼他那位十六歲，當學生的第五代堂弟，在格魯頓該是覺得如何厭煩呵！對西班牙作戰給於美國

青年的反響正和次年南非戰爭引起英國青年的反響一樣。我們這些上了六十的英美人士，回想起十來歲時的生活，總覺得那些年月中戰爭是一觸即發的。那種滲合着飽經滄桑之感的辛苦而得到成然的自覺情感完全消散了。真正的戰爭到底搗毀了我們的幻夢。作傳記的人假想十六歲的富蘭克林當時的情緒和一般同時的說英語的青年們的情緒一樣，這也許不會有什麼錯誤的，而且我們不必再在這些情緒之中，覓取他爲何急於加入戰爭的理由。他和同校中一位朋友聽說波士頓方面在招海軍志願人員，決定前去投効。他們和一個麵包販子安排好，這個販子在一個禮拜天帶着他的行當到學校中去，設法偷載他們到最近的車站去，他們希望在學校當局還沒有發現他們的去向之前，平安地在波士頓報名投軍。這並不是一時突發的衝動。他們已經從經過幾個禮拜，所得的款子中儲足了這次行動所必須的錢。可是，當他們正要出走的前夜，兩個孩子都發疹子了。命運注定了富蘭克林，D，羅斯福要操縱一枝海神手中的三尖叉，但是並不使他在他自己的旗艦上運用它。

值得注意的是在詹姆士·羅斯福夫人關於她的兒子在學校中生活的回憶紀錄中，記載着他在格魯頓快畢業時，在演辯隊中非常出風頭，他演辯的題目，有論增強美國海

軍，有論大不列顛的責任，有保證中國土地主權完整等等。他最後一學期——那是一九〇〇年夏天，他已經十八歲半了——曾經參加失敗的一方面進行辯論，主張菲律賓應該獲得獨立，因為他們已經顯示出能運用自治權的能力。兩年之後，在英國學校中十八歲的孩子們將要參加失敗的一面而辯論，說波爾（Boer）人該獲得獨立。自由主義之風又抬頭了。格魯頓的孩子們大都來自特殊權益還沒有受絲毫損害的集團，它們那時還靜如湖水；即使稍加碰觸，已經足夠引起很大的注意。

一九〇〇年秋季始業時，富蘭克林·D·羅斯福進了哈佛。他的功課不錯，遊戲運動更爲出衆，他精神振奮，風采翩翩，親愛溫和，而且很有地位，在大學中非常有出頭地的希望，而他自然也做到了這種地步。最重要的是他在達到這種地步時並沒有減削他童年時代的信心。他雖然是一年級足球隊中的一員，雖然是一名出色的槳手，雖然按哈佛的傳統成了金灣（Golden Coast）的一員，雖然成了大學中八個俱樂部的理事，他却受着同學們的猜疑；就是在今日，當時和他一起的人很少會搖頭說富蘭克林·D·羅斯福當時的緋紅色並不是當時他們所認爲赤色彩光的陰影。

第一，他是個民主黨人。這一點也許可以忽視過去，因為他是來自民主黨人的家庭

中的。新英格蘭人之形成，並不是由於政黨的關係，而且這一點，正如在英國的公學中一個自由黨人祇要他默不作聲就會被原諒似地，被他人所寬恕。可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是一個好鬥的民主黨人。在第一個秋天，當他的同族西沃圖被舉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時，作為大學一年生的富蘭克林却在擁護從西部來的粗野而近於顛狂的W·J·白萊恩（Bryan），連來自鄉間的國務卿約翰·海（John Hay）都說這人是另一個傑克·凱吉（Jack Cade）。支援白萊恩為總統候選人，如同支援一個背叛美國的人，因為這人竟敢說壓抑菲律賓人的長期戰爭乃是一個罪惡的侵略戰爭。

富蘭克林·羅斯福非但是民主黨人，非但是在菲律賓事件中的一個反帝國主義者，而且還是一個親波爾人者，一個積極的，奔走募款的親波爾人者。在英國讀者看來，這一點在美國很不可能為人反對，但是在哈佛所規定的一切，和牛津或劍橋所定的很少有什麼出入，它對南非戰爭採取嚴格的保守性的親英態度。在十九世紀最後一年中為菲律賓人或波爾人說一句好話，在特權階層的少數人看來，就認為這種人的意見無異是讚成動搖健全而安適的社會的根本基礎。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同情於波爾人，也許是因為他有荷蘭血統的關係；但是如果我們還能記起他在格魯頓辯論菲律賓未來問題的內容，也

許我們會發現他這種態度乃是受那種準備對新世紀有所影響的青年布爾喬亞自由思想所支配的。這是當時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一種現象的一部份。

作羅斯福總統傳記的一二作者們曾經企圖把他青年時代對同時代人們的影響，和邱吉爾先生對他青年時代友人們的影響作一個比較。這兩者之間並無並行的事實。羅斯福是個有危險性的青年自由主義者，但是除了意見之外，別人對他的一切並沒有任何批評。邱吉爾從哈羅起，一直就和他同時的人們鬥爭作對，不是因為他的政治意見，而是爲了他對自己爲人的意見非常地與衆不同。他不拘於那種環境中別人所希望於他的行爲和舉止的標準。這也許是天生的，也許是美國血統的推動。不論它是什麼淵源，它總是當時內政和軍事上保守思想所反對的東西。他唯一與羅斯福相似之處，就在他們同樣地有一種不可阻抑，充沛，不可克服的生活力。當羅斯福還在哈佛的時候，邱吉爾已經在世界各地經過了種種冒險而參與政治了。他已經爲自由貿易問題和他的政黨爭執，但是在名義上他依然是奧特亨（Oldham）的國會保守派議員，而當他最後走過上院的地板而成了一個自由派時，他頭腦中並沒有一點天生的自由派的思想見地。如果要把一位羅斯福家的人和溫斯頓，邱吉爾比較，那還是把他和西沃圖·羅斯福相比較來得合理些。他並

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是一個托雷（Tory）派；染沾了一點在托雷派的觀點上看來是前進的思想而已，這種思想當然並不一定是不前進的。我們現在回顧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哈佛時的情形，不難發現他懷抱著一種典型的帕拉圖的「空中有什麼」的精神；當他進入政治圈內（邱吉爾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四年間已經參加政治活動了）時，他的開拓方法完全和邱吉爾不同，邱吉爾那時穿着一件緊身外衣，演說時非常嚴正，他那種活潑生辣的精神抓緊了聽衆，那時他也缺乏滔滔的詞令和很好的邏輯，他並不以所說的內容或是說話的態度來使人折服，他那種狡人的樣子却令人欽佩。

富蘭克林·羅斯福未來的政治觀念在他還是大學一年生時已經很明顯了，這一點在他組織了非特權的多數人聯合對那少數的有權勢的候選人們（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進行競選級中班長和理事等的事件上，已經可以看出。這一件事曾被引來貶責羅斯福，說他很早就有對低級大衆發生好感的表現；這一點也很容易使人相信他很早就有社會正義感的表現。研究一下羅斯福的事業，可以知道他要爭取羣衆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我們在一九四〇年黑暗而沉陰的年月聽他的廣播演說時，已經不願相信那些說他不忠實的惡意流言了。他在加強英國人的精神這一工作上的成就，不亞於邱吉爾。而且，世人往往

不能了解一個人所以能贏得比他不幸的人們的愛戴，完全是因為他之愛他們，比他之愛他的同階層的人們更爲深甚的原故。羅斯福童年時代遺留的許多逸話，都表明了他有着所謂愛人的天性；當比一般遲緩的學校生活經驗加在他身上時，他在童年時代從他敬愛的年長的人們中得到的堆積起來的愛，開始被運用在同時代的、較廣泛的青年們之間，最後乃用於一般人的廣大世界之中。

羅斯福在哈佛的企望之一就是編「緋紅」(The Crimson)報。據傳說他爲想獲得加入該報的機會，設法獲得西沃圖·羅斯福以紐約州長資格在A·勞倫斯·羅瑟爾(Lawrence Lowell)教授的堂上發表演說而且允許事後和他見面的消息。富蘭克林在大學二年時成了該報的助理編輯，三年級時任總編輯，一九〇四年畢業班時，任該報總理。本書作者曾經主牛津一報編務，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間也在牛津報中，還很能記起富蘭克林·D·羅斯福主持下「緋紅報」的贈報的形式，作者可以證明它是張了不起的報紙。作者常常請教日後出名的美國馬球手譚·梅爾朋(Dan Milburn)——他那時是牛津八班(Oxford Eight)的一員——要他解釋報上許多神祕的笑話。但是作者記得最清楚的的就是四十年前的「緋紅報」對學校的物質設施非常注意。在牛津的四年生眼中，他

們自己的大學乃是沒有變化，不可能變化的中古時代的遺骸，因此他們對那張報都覺得很特殊。我們想當時「緋紅報」中一定有位連那時哈佛的學生們都認為有點過失的單數者在活動着。

「如果人應有比投票選一己知己友人更高之責任，此責任即為担保全級能獲得與彼等所得地位相稱之首領是也。」

這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要求級選須不受特殊會社（他自己是這種會社中的一員）的影響的文章中開頭一段。他在哈佛時如此，以後也就一直如此。他自己複述這句話也許有三十餘年，當他被推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時，很多人聽來都和他的親友無關。但是如果把大學四年時代的羅斯福刻畫成一個情感化的青年改革者，以為他永遠在和保守的意見作對，這也是不合實際情形的。和這相反，他在大學生活的洪流中能很有力的游泳前進着。

「要是有什麼不損大體的搗亂事件，富蘭克林總是參予其事的。在這一點上，

他和他的舅舅華倫·台爾阿諾一樣，後者在較早的時期中，曾經為一個公共廣場中一座人像打扮起來，這事使哈佛的先生們大為惱怒，動員了警察和救火員去移

掉那許多衣服。」

這是他母親說他的情形。（見「我的孩子富蘭克林」）她更進一步說，富蘭克林的房間和當時大學學生的屋子一樣。「四壁完全掛了旗幟，裝在鏡框中紀錄着許多事件的紀念品，還有他所參加的各種俱樂部的標徵。」一九〇三年一月三十日他在佛萊俱樂部（Fly Club）中舉行二十一歲生辰大慶，十一位客人都是化粧來參加的。

富蘭克林在大學一年級時，詹姆士·羅斯福與世長辭，羅斯福夫人不希望獨居海德公園中，乃遷居波士頓，更接近她的兒子；可是他很忙，那時汽車也是罕見之物，因此她並不能每星期都見到他。她很知趣地不常到他屋裏去打擾。有一個暑假，他們一起繞南角（North Cape）到挪威，在威廉大帝遊船停泊的江灣中拋錨。富蘭克林被邀去遊船上觀光，他還抓起過一枝被大帝用牙齒咬了許多鋸齒痕的鉛筆。但是，大部的夏季是在坎普貝羅島上渡過的，那時富蘭克林已經是一艘四十呎帆船半月（Half Moon）號的主人，這半月號原是一隻荷蘭船的名字，那荷蘭船是一六〇九年覓取自北通西到中國的航綫的年老英國商航者亨利·赫德遜所駕駛，它是第一次航行於赫德遜河中的船舶（該河命名即用以紀念亨利者）。

「六月快來時，」他母親這樣紀錄道：「一分鐘也安靜不了的富蘭克林常常盼着休假日。」我們記起西沃圖·羅斯福那種「勤勉生活」時，總會想起富蘭克林的精神和活力是從羅斯福家族中獲得的，其實它們大約還是從他母親方面傳受來的。事實上，一般地可以說：十個偉大人物中有九個是從母親方面得到活力的。詹姆士，羅斯福給我的印象，乃是一個可親有禮的鄉下紳士，他的精力祇限於一個有對地方事務發生責任感的鄉下紳士所能追求的範圍而已。富蘭克林從他父親方面得到的也許是正義感和幽默感。兩者都是公正平衡感的表現。

富蘭克林·D·羅斯福從他父親方面傳得許多特質，這許多特質乃是今日世界所應感謝那位留鬚的，有一對尖利的眼睛，一張善感，幽默的嘴的中年鄉下紳士的地方，這種感謝應該更重於世界對美國今日所給予的物質援助的感謝。

大學第三年完結時，羅斯福已經準備取得歷史和政治學的學位；但是他第四年還是停留在哈佛——一學期中並沒作什麼精淇研究，因為他私自在準備進哥倫比亞大學法律院的工作。無疑地，「緋紅報」，級中主席，以及他自己創立的時事研究會主持人，以及其它種種大學生活中的興趣，使他不忍離開。他在哈佛埋下了深深的根蒂。自從一六

三六年哈佛成立以來，他有很多祖先們和它發生過聯系。

西沃圖·羅斯福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寫道：「我非常愛好哈佛生活，我相信它對我有輔益，但祇限於一般效果方面，因為我真正讀書研究的所得，對我日後的生活很少幫助。」

西沃圖·羅斯福既然參加了表示出身於高等學者的非·貝他·卡巴(Phi Beta Kappa)社，至少他在外表上比沒有加入非·貝他·卡巴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顯得更受過高深學識的陶冶了。無論如何，西沃圖對修辭學的研究，確使他能於晚年寫他的「一八一二年海軍戰爭」了。這書在兩年後一八八二年——出版，使他獲得了史學家的地位。富蘭克林·羅斯福沒有寫過美國海軍史；但是他在哈佛時就開始收藏有關美國海軍的書籍，這類收藏已經成了現在最完備的收藏了。如果富蘭克林·羅斯福寫自傳，他會不會像西沃圖那樣覺得在哈佛的幾年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重要性呢？如果他也如此寫，那倒有點像不知感恩了，因為如果他在這一個多事的世紀的開始四年中不在哈佛而在其它任何學校中，那麼我們很難想像出他今日會有什麼樣的成就了。

有一次，富蘭克林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他總是指揮命令其它孩子們在沙灘上挖造

一座堡壘，他母親怪他不該這樣，他回答道：「媽，要是我不老是發命令指揮，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我們可以想像在「緋紅報」編輯部中的情形和這種情形相同；但是印刷者們覺得他的態度非常動人，因此他們從不反對他許多過大的見解。在哈佛，他一定學會了如何取得各方面的反對者們的調協，這一點對他的未來，也許比優越的學位或者甚至哈佛八級的牛耳地位更為重要。

第三章

一八九七年至一八九八年間聖誕節假期時，富蘭克林·羅斯福將進十六歲，羅斯福家人親戚相聚，有一位才過十三歲的簡樸遲鈍的女孩子（這是據她自己的估量而說的）因爲足踝軟弱，沒能參加冬季的戶外活動，她自己感到腿太長，襯衣太短，不能成一個精巧的舞蹈者。這孩子就是安娜·伊麗諾·羅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是伊利奧特（Elliott）·羅斯福的女兒，伊利奧特是西沃圖的弟弟，是富蘭克林的教父。伊利奧特是最可親的慈父，但是他脾氣逐漸變得古怪，太愛喝酒，因此他妻子死後，家人以爲他不是孩子的美好指導人，這孩子就由他們的祖姨伐冷丁·赫爾（Valentine Hall）夫人照管。伊麗諾的幼年景况正似一般從維多利亞中期轉變到現在情形那一階段中雜亂乏味的情形一樣。這種情形現在想來頗令人覺得恐怖，但它們也有許多足以令人忍受的優點。

在這次聚會中，富蘭克林約伊麗諾和他同舞，伊麗諾那種含有感激性的驚訝已經發

現了她這位青年的堂兄（註）日後一定是個出色人物。在這次同舞不久之後，他計劃投入海軍。他最有力的對敵們一向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長得漂亮而可親；事實上，他們還以這一點來攻擊他。一個人漂亮就不會聰明，成功就不致引起別人的仇意；但是如果他得天助而三者俱備，那麼許多人恨他的惟一理由就是因為他得到自然的幫助太多了。

一八九九年秋天，伊麗諾·羅斯福正十五歲時，被溫拔爾頓公會（Wimbledon Common）派往英國就讀於南田（Southfields）。她在此地受一個英國學校的女校長影響頗深，女校長是法國人，名叫蘇凡斯特（Suyvestre），她是一位不可知論者和自由主義者，在普法戰爭前，曾在巴黎教過伊麗諾一位姨母的書。除了在蘇凡斯特的學校中上課外，她還隨着她在感恩節和聖誕假期中遊歷歐洲大陸。這故事在羅斯福夫人自己寫的傳記中說得很詳細，這是一本婦女寫的最好的自傳（「白宮的夫人」）。伊麗諾和富蘭克林同樣是親波爾人的，這並不是源於任何情感上的作用，這是因為蘇凡斯特在這個女孩子的想像上，給予了一個強烈的愛好民族自由的印像，這種自由的愛好，是她自己不移的信心。

在一個暑假中有個很短的時期裏，她見到了富蘭克林，但是直到他在哈佛三年級，

她已經離開學校時，他們才不是在跳舞的場合上相遇。一九〇四年春季，富蘭克林曾經自哈佛請假兩個月和他的朋友拉斯洛甫·勃朗(Talbot Brown)陪詹姆士·羅斯福夫人到西印度羣島和文尼佐拉去，詹姆士·羅斯福夫人的目的是在閃避她兒子對伊麗諾·羅斯福的興趣，因為她對早婚是不很贊同的。這一次的航遊在富蘭克林的腦海中印上了西印度羣島軍事重要性的印象，但是從她母親觀點上看來這次旅行是失敗的，因為在旅行之後，他告訴了她說在上一年的秋天，他曾經向伊麗諾求過婚。這使詹姆士·羅斯福夫人大吃一驚，她那時祇不過五十歲，在梅迪遜路上租居一屋以便愉快地招呼她那個正在進紐約偉大的哥倫比亞大學法院的兒子。她那位未來的媳婦還祇有十九歲；她的兒子祇有二十二歲。以她寡居的地位，使她非常難於在那樣早的時候放棄她這個摯愛着的獨子。但是，詹姆士·羅斯福夫人對這種意外的婚約的想法原是過份的。對世界史（羅斯福大總統也是它的一部份）中有重要性的乃是他所選擇的這位夫人乃是能有辨別方向的良知的婦女，這種良知使他們駕起了今日世界上第二次的救難方舟，但是一定要渲染這位夫人對他事業的貢獻是非常困難的，這種渲染並不是說這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在向她求婚時已經考慮到他的政治事業了。她是一位在阿伯拉罕·林肯之後的偉大總統的侄女；

但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是一個民主黨人，因此在政治上說，和一個共和黨的總統的侄女結婚是得不到什麼的，他的判斷完全是受愛的驅使，而且認為她將逐漸發展成爲一個偉大的女性的。他母親告訴我們說最使她和她的朋友們吃驚的是在富蘭克林沒有宣佈他們的婚約之前，他從來「不是女人堆中的男子」。她從記不起他曾經談到過女孩子，甚至在他沒有和那位「十九妙齡女郎」訂婚之前，也沒有談到過單獨一個女孩子的時候。伊麗諾·羅斯福自己已經進行所謂社會工作了，雖然現在在英國看來有點「簡陋」（英國的高等婦女們已經受過多年教育，培養起一點體貼貧苦人生活的良知了），在她却早就有一種可以回報給社會的東西，這祇要她獨立處世時就可以表現出來——這並不是僅僅爲了她是一位漂亮，風須十足，有希望的青年政治家的妻子罷了。

「我對生活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她回憶那時情形時如此寫），而且有想經驗婦女生活每一部門的希望。我祇覺得要趕快；毫無節拍或理由的，我急於要投身於生活的洪流之中，因此當一九〇三年秋天，富蘭克林·羅斯福……向我求婚……這像是很自然的事。」

這樣清白的一種結婚動機，倒像是文學作品中的事。

一九〇五年三月四日，西沃圖·羅斯福連任第二任美國大總統。這一對訂了婚的青年男女到華盛頓去寄居在伊麗諾·羅斯福的一位姨母，柯爾士夫人那兒，準備參加就職典禮。

他們聽見大總統發表在今日看來頗似預言性的演詞：

「我們得天獨厚，別人希望於我們的也很厚，我們對別人有責任，對自己也須負責任，我們在雙方面都不能有所閃避。我們已經成了一個大國，由於它的偉大，它不得不和世界上其它國家發生關係，我們必須因為這種形勢而負起這種種責任來行動……如果我們失敗，世界上自由自主政府的主義將根本崩潰，因此我們對自己，對今日的世界，對未來的子子孫孫都負有重大的責任。」

伊麗諾·羅斯福也許記得她叔父說這話時是非常用力的，但她不記得他所說的一切，因為她那時對政治既無所悉，更無興趣可談。在國會議事堂（The Capitol）門前，她和富蘭克林坐在大總統身後的石級上，這是總統家屬中人員有特權坐的地方。後來他們一起在白宮中進午餐，在行列進行時，她不斷地自己提醒自己，說她正在協助完成一件歷史任務。我們可以想像她那時正竭力使自己不去想後二十天就要舉行的婚事。西沃

圖·羅斯福演說時富蘭克林心中怎樣想，這事我們無從得知。一位活力充沛而且對時事已經極有興趣，二十三歲的青年，很可能會夢想日後自己也會站在西沃圖·羅斯福當時站立的地方上的。如果他真那麼想，他像一位聰明的青年人那樣沒有對誰敘述他自己未來的夢想。

富蘭克林和伊麗諾·羅斯福的婚禮於三月十七日在新娘的一位堂姐，亨利·派麗虛夫人的家中——東七十六街六至八號——舉行。婚禮在私人家中舉行，因為大總統要嫁他的侄女和教女，恐怕紐約不會有容下很多觀禮人衆的教堂，因此恐怕要警察預先佈置必須的防備也太困難了。那天有許多人來看總統坐着敞頂馬車來臨，竟須七十五名警察來維持交通。結婚進行曲的音樂和在第五大路上慶祝聖柏屈立克日（St. Patrick's Day）的希伯尼安古行列表的『綠色的穿戴』（The Wearing of the Green）的音樂交響着。婚禮由格魯頓學校校長庇包台（Peabody）博士主持；拉斯洛甫·勃朗任男僮相，大總統的大女兒阿麗斯·羅斯福那時才二十一歲，任女僮相。詹姆士·羅斯福夫人回憶當時情景，說庇包台博士，新郎和男僮相『洋洋有味的談着在格羅頓時的種種生活』，幾乎沒有及時到達禮壇。婚禮舉行後，賓客們紛紛向新夫婦致賀，大總統退入圖書室中休

息去了。這時有很多的賓客急忙跟了過去，沒有人再注意新娘新郎了。「孩子們忍受了一段驚扭的時間，賓客們跟着羅斯福先生後面，紛紛和他握手，幾乎沒人理會這對孩子了」，這是詹姆士·羅斯福夫人回憶時說的。

作者在此要像其他參加婚禮的賓客們一樣地趁機會把注意轉移到西沃圖·羅斯福身上，西沃圖的事業和富蘭克林的事業之間有不少相同之處使許多人相信富蘭克林是以西沃圖作自己的模型的。一位傳記作家妬忌他自己討論的題目，硬說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事業並不受他這位出色的堂兄的榜樣的影響，說他的雄心並沒有受過這種榜樣的鼓勵，（這未免過份），認為西沃圖·羅斯福對富蘭克林·羅斯福有影響的這種信念，因為羅斯福家系中這第二位大總統常常引用第一位大總統的話來說明自己的論點，更加使人確信無疑了。但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堅持說這兩位偉大美國人的事業之間很多相同之點大半純粹是因爲環境之偶然而造成的；爲求仔細起見，最好記取一句拉丁格言：（*Nil simile est icem*）相似之物並不相同，然後記取在這兩位人物之間的不同是根源於氣質和風格上的深刻不同點之上的。我們說西沃圖的利他主義乃是他那種出衆的自我主義的成果，而富蘭克林在自身方面的自我主義乃是由他的利他主義強勉加在他身上的，這樣

的雙重矛盾說法似乎太不足奇了；但是它却隱蔽了它們之間的不同之點。

西沃圖是約翰尼斯·羅斯福（生於一六八九年）第五世後代，富蘭克林是約翰尼斯的兄弟——傑哥伯斯·羅斯福（生於一六九二年）的第五世後代，事實上富蘭克林的父親生於一八二八年，在中年時再度結婚，因此使他比他的第五代堂兄（註）西沃圖（他父親生於一八三一年，而他自己則生於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晚了一輩。我們在以前已經注意到較老一支羅斯福家系中荷蘭血統比和英國血統相混雜的較為年輕的那支羅斯福家系中的的荷蘭血統濃厚。西沃圖的祖父是位銀行家和頗有財富的玻璃進口商，他的兒子也叫西沃圖，和馬莎·布洛趣（Martha Bulloch）結婚，她是一個老喬治亞家族的一員，她的兩個兄弟為邦聯（Confederacy）而努力作戰，以致沒有受到當局的大赦，其中一位一直流亡在利物浦。老西沃圖·羅斯福是熱心而積極擁護聯合（Union）的，他和家中的傳統決絕，加入共和黨，因為當時他們所謂的聯合民主者（Union Democrats）似乎也受了一點叛變的喧染，在紐約東二十街二十八號中有一度一定有很難渡過；但是多虧這對夫婦之間的摯愛，使他們的家庭不致破裂。小西沃圖·羅斯福非常聰明，三歲左右就能知道他家中有兩種絕對不同，非常堅決的觀點存在着，有一天晚

上，他正在母親膝旁祈禱，趁機祈告上帝保佑聯合的主義，使他母親好好地懲罰了他一頓。

西沃圖從嬰兒時期就染了嚴重的喘息病，他在青年期中的全部意志集中在如何治療這種疾病。這一點，在他進哈佛時總算完成了，他完成這一點時所需的那種智力的體力上的毅力，在六十年後，由另一位羅斯福充分地重演過了。西沃圖在哈佛讀書時死了父親，於是他在二十一歲時就成了一位富有而獨立的人了。他和愛麗絲·李 (Alice Lee) 訂婚，在一八八〇年他二十二歲生辰時結婚。他同時參加了政治活動，這在當時看來，並不是紐約紳士所該從事的事業。他同時研究法律，繼續探究海軍史，除了許多體育遊戲之外，更玩着狩獵和馬球，曾經一度和 G·P·浦德南 (Putnam) 的兒子們的公司合作進行出版事業。那位老大人物，喬治·浦德南少校常說西沃圖的出版事業中，包括的大多是一些古怪得使公司中其它人們退避三舍的計劃。一八八一年，他才二十三歲時，被選為紐約州會區 (Assembly District of N.Y.) 第二十一屆的議員 (Assemblyman) ，五個月之後，他在州會中要求彈劾法官惠斯特勃洛克，因為這位法官和傑·高爾特串同受賄。若干年之後，在他自己寫的自傳中宣稱他之參加政治，並沒有意識到其它人

們的利益，他完全是爲了要保全自己在一個自主政府中應有的權利，這種權利是任何人都有。他堅決認爲統治的人們該統治而不該被統治於紐約城的政治老板們。這位政治家的利他主義見解是非常忠實公開的。

起初，紐約城中共和黨的老板們很瞧不起這位譴責他們的青年；但是他之努力攻擊他們，確如他之攻擊喘息病，一天又一天地高呼彈劾。民衆都擁護他。第八天，州會同意組織調查委員會，雖然一切證明那位法官無罪，西沃圖·羅斯福却出名了。在一八八二年和一八八三年之間，他努力進行許多改良工作，其中一件就是通過一條法案，禁止在污濁擁擠的小屋中製造雪茄。法案通過了；但是控訴院（Court of Appeal）宣稱此法案不合憲法，此地不妨摘錄原來判詞：強迫雪茄製造商離開家庭以及放棄其貧乏之設備，放棄一切有利之影響，以求其在他處推進業務，此種法案殆不能改良雪茄製造商之健康或其道德。

這是富蘭克林·羅斯福還祇三歲時，那污濁的小屋子所引起法院中的好感。他在五十年之後，也和法院發生糾紛，但是他會原諒十九世紀那種可咒的，法律上的虛偽作風的。

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二日，西沃圖·羅斯福的母親逝世了，二十四小時之後，他的妻子生女兒後逝世，遺下的女兒就是一九〇五年聖柏特立克日爲伊麗諾·羅斯福作女傭相的那位小姐。

傷心已極的西沃圖當時希望退休於北達柯他 (North Dakota)，他在那片準州 (Territory) 上買了一點地，但是他雖然拒絕代表州會，却同意作爲紐約州四位代表之一，參加一八八四年在紐約州舉行的共和黨推舉總統候選人典禮。那時，自內戰以後沒有一點裂痕的共和黨已經開始有點腐化了，這一點可以從它之企圖推詹姆士·G·白菜因 (James G. Blaine) 爲候選人的事情中看到，白菜因是出名的貪取賄財的人。羅斯福竭力協助上議員艾德蒙 (Edmunds) 競選，艾德蒙被紐約太陽報的台那 (Dana) 稱爲『超然人物』 (Mugwumps)。白菜因被命爲候選人。羅斯福不願共和黨中前進份子們的忿懣，宣稱他仍舊要投共和黨的票。他知道白菜因不好，但是他相信那怕在一個壞的領袖之下，國家一切情形在共和黨治下總比在民主黨治下好些。那年，民主黨方面有位好候選人，能幹的紐約州長格魯伐·克利夫蘭 (Grover Cleveland)，他得到『超然人物』們的幫助被選爲總統。於是，羅斯福在大選後退在艾克角牧場 (Elkhorn Ranch

），過了兩年鄉村生活。

有一天，那是一八八六年九月，西沃圖·羅斯福在鄉居中讀報知道了他被一個獨立黨（Independents）的團體推為紐約市市長候選人，他立刻東下進行競爭。民主黨方面的候選人是位老實人，丹默乃·霍爾（Tammany Hall）那時作風很好，另一位是聯合工黨（United Labour Party）的候選人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也是位老實人。勞工黨的突然出現使紐約的財主們大為吃驚，共和黨因此和獨立黨密切合作，但結果民主黨候選人當選，西沃圖·羅斯福居第三位。選舉之後，西沃圖渡大西洋，在聖喬治，哈奴伐廣場和紐約的艾迪絲·卡羅（Edith Carow）小姐結婚。她是他兒時的好友。一八六九年他還是個孩子時，和雙親到巴黎去，曾經有這樣一段日記：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媽把艾迪絲·卡羅的像片給我看，她的面容使我對永遠不會再回來的過去滋生一重悵惘和懷戀。

西沃圖對一個女孩子所生的欽慕，早於窩蘭克林，不過他在和她結合前，曾經和另一位女子結過婚。

一八八九年，西沃圖被哈立遜總統（Harrison）任命為文官課（Civil-Service Co-

mmisen) 一員。彼時革新目的之一即爲不再使文官職務完全成爲勝利黨之「怪物」，而文官課之目的即在摒棄一切不稱職者於官廳之外。一八九二年，克利夫蘭再度被選時，他再任命羅斯福任該職，羅斯福努力工作，使共和黨政府中官員不致讓位於民主黨人。一八九五年，一位革新派的紐約市長當選，西沃圖·羅斯福被選爲警務局主席，使他得以發揮革新的精力，此地值得注意的就是在羅斯福任此職期內，柏林方面傳來的德國反猶太主義在此地激引起反對猶太人的情結。猶太居民區大受這種主義的熱心先鋒的糾擾，有人請求他禁止舉行公共集會的權利。但是羅斯福却有更好的辦法，他允許德國人舉行會議，但是却派了四十名猶太警察去保衛會堂，要他們維持秩序。那位德國人以老好的德國方式咆哮了一頓反猶太人的話，聽衆中沒人噤口一句。德國人的十字軍無聲無息地倒了台，全紐約的人們都在笑話他。

一八九六年，共和黨重執政權，麥克金萊總統任命西沃圖·羅斯福爲海軍助理部長。他那時三十八歲。富蘭克林任此職時比他更小七歲，打破了他的紀錄。西班牙戰爭爆發時，西沃圖·羅斯福的精力不屑受拘於公文生活之中，因此他組織了「怒潮騎士」在古巴參加了實際戰役。他和該師團駐在孟塔克時，被邀爲共和黨紐約州長候選人，他就

任紐約州長使大商業者們深感恐怖，一九〇〇年乃選他爲副總統以去掉他。他看清了對方的目的，決心再度任州長。但是共和黨の後台老板們設法鼓起絕大的熱狂，表現在菲拉台爾菲亞選舉會之中，使西沃圖無法推辭副總統之選。一九〇一年四月，他對副總統那種不積極的職權非常感到乏味，使他竟至於問日後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懷德 (Whites) 如果他入華盛頓法律學院，是不是不致和法規抵觸。懷德法官認爲此舉對一位美國副總統而言，似乎有失尊嚴，不過允許他在來秋以私人資格入學。那年夏天，麥克金萊總統在勃法羅 (Buffalo) 被刺。九月中西沃圖·羅斯福就美國第二十六任大總統。他那時差一個月就是四十三歲了。富蘭克林宣誓就大總統位時已經五十一歲。

一九〇四年，西沃圖聯任大總統。一九〇五年三月中他爲富蘭克林和伊麗諾·羅斯福主持婚事時，心中却在盤算如何爲自己本國之利益以調停俄國和日本間的爭執。一九〇二年，大不列顛畏懼俄國及法國在華之勢力影響它的商業利益，深恐俄國染指印度之企圖，同時對德國亦不信任，乃與日本締結同盟，此舉深得彼時被選爲奧爾特亨保守派代表之溫斯登·邱吉爾之讚許。由於此舉之協助，日本乃得在經濟上深入朝鮮。日俄開戰後，羅斯福立即警告法國及德國，謂如彼等支助俄國，則彼將『即刻協助日本作戰到

底。」羅斯福並不急於使任何一方獲得勝利，因為勝利者將統制中國北部。當兩交戰國均瀕於破產，而戰局未來還不能測見時，支助戰爭雙方的美，英，法三國銀行家們拒絕再付任何款項，日本請求羅斯福的幫助，一九〇五年夏天，他將召請日俄雙方代表到新半球的樸資茅斯（Portsmouth），由他担任調解人。而且，他將開始和英國及日本進行秘密談判，要日本承認美國在菲列賓的統治權，而美國總統將協助日本完成對朝鮮之統治，必要時且將予以武力之幫助。東京方面之日本首相得到西沃圖的密使的保證說：「美國政府對於日本和大不列顛所允諾之行動，將確切實行，一如此行動為條約所規定者然。」這實在是一種秘密的三國同盟。西沃圖·羅斯福說他樂於進行公開的同盟，但是他認為要使參議院讚同此舉，無異於「水中撈月」。直到一九二四年，這秘密同盟還是秘密的。

現在，羅斯福總統心中懷着這種計劃，正被參加婚禮的賀客們所包圍着，我們不妨趁這時轉過來瞧瞧被冷淡了的新娘和新郎吧。

第四章

窩蘭克林和伊麗諾·羅斯福結婚之後，住在西四十街的一家紐約公寓中，那時他還繼續在哥倫比亞法律學院研讀。那年暑假中他們到歐洲去渡那較長的蜜月，那位妻子在這次旅行中寫了不少幽默深刻的文字。

從歐洲回國後，這一對新婚夫婦住在東三十六街的一間小屋中。他們的女兒出世了。一九〇七年羅斯福修完哥倫比亞法律學院的功課。他被允入審判院（The Bar），加入了建立已久，聲名鼎盛的卡德，雷霞德，和梅爾朋的法律事務所，成爲市政判案的主管書記，以後專理海軍法律事務。無疑的，如果命運註定他當一名律師，他一定會成爲優良，成功的大律師的。但是，這種假想是徒然的。在大西洋兩岸，法律事務乃是沒有決定一生要做些什麼，而且有充分的個人手段以避免作任何決定的人們所能擔當的最佳職業。西沃圖·羅斯福甚至以爲這事務是他作副總統時可以藉以排遣時間的事務。這一對新婚夫婦在西沃圖·羅斯福任大總統時，對他已有密切的觀察。他們常常住在華盛

頓，和大總統的姐妹柯爾斯夫人在白宮中生活。無疑的，這位一表堂堂的紐約律師時常注意看他叔丈的政治信仰的。

『同樣一個人可能同時注意在家事和政治事務上，因此凡是盡精力於商業上者，並不忽略政治，因為我們很特殊地不以不參予公共事務之人為可親的虛無之物，而以他們為無用之雄蜂；因為我們……為自己而決定事務，並不因代表之方法而決定之。』

這是貝利格爾斯 (Pericles) 所說的話，在兩千五百年後，極易出諸西沃圖·羅斯福之口。他之進入政治圈中，不是為了要保持他自己在自治政府下的特權嗎？

富蘭克林·羅斯福也許早就決意參加政治生活了，如果他有某些決定，他一定是在等待着有希望的機會。同時，他又如他父親那樣地在荷蘭州處理他的種種地方事件。他同時也享受種種作樂，大半是在假日中航行他的『半月』號。

他們又生了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在七個月時就夭亡了。羅斯福夫婦從東三十六街遷居到東六十五街的兩幢屋子中的一幢之中，這兩幢屋子是詹姆士·羅斯福夫人為她自己和她們而造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夫人並不像一般在一個兒子的婆

婆手下當媳婦的青年太太們那樣感到有點不大如意。她不喜歡住在不是自己的屋子中過不能代表她的生活方式。一年之後，她爲了死去的男孩子，深深地責怪自己。

「我年青無知，應該痛苦地責備自己沒有好好地照顧那個孩子……我甚至覺得自己太不留意他了，那年冬季，我帶給自己和周圍的人們不快。我對我可憐的青年丈夫也不時地顯得有點使他感到苦楚，他常常使我看到我是如何愚蠢地行爲着。」

在羅斯福夫人的自傳中，初婚年月中的生活是多麼生動呵！但是我們最好讀讀她的原作。如果單讀這幾頁也許會損害了全部，而且對現在還快活地一起生活着的夫婦，將成爲一種冒瀆的解釋。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陸軍部長威廉·H·塔虎特（Taft）以得票衆多擊敗了三次競選中的民主黨候選人W·J·白萊恩。一九〇九年三月四日總統就任時華盛頓正降大風雪。除了前任那位總統之外，沒有人會更深切地知道：前任總統在國內出面對他後繼者將成爲莫大的障礙，因此就職典禮之後，他就脫離了美國公衆生活。前任總統常常要陪他的後繼人到白宮去。西沃圖·羅斯福却上了火車到紐約，幾天之後航行到非洲去。那冬天的氣候正象徵了被西沃圖·羅斯福遺留在風雨中的孤苦孩子——共和黨的未來命

運。西沃圖·羅斯福在非洲作了大狩獵之後，又到歐洲和他所訪問的各國領袖們同作狩獵之戲。他那種生氣躍躍的個性，被歐洲人民視爲真正的美國精神的表現。在英王愛德華七世葬禮中，他代表塔虎特總統參加。他被推選爲倫敦市的自由人，在吉爾特會堂中對聽衆們發表了一篇紀念性的演詞，說如果英國要建立一個大帝國，他們必須學習如何統治它。這在當時引起了小小的忿慨，但誰能說它不是我們所需的警告呢？西沃圖·羅斯福對當時已經很明顯的自由貿易有一點不耐，對英國人民想依所得的肥油水而生活的意向也很爲不平。西沃圖·羅斯福訪英的最高潮，當推牛津大學授他以名譽學位之時，寇松爵士在演說中說他是：一切偉大帝王的同僚，戰爭的調停者，惡怪的消除人，但也是非常人性的人，和我我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一九一〇年六月十八日，西沃圖·羅斯福回到紐約，受同胞們最熱烈的歡迎。他（並不以黨的方面說）是一位世界上出色的民主主義者；他回國後發現自己的黨附庸於財閥政治之利益而予民主政治很多打擊，他認爲對高級財政，投資利潤以及政治上的貪污腐敗等情形的攻擊，必須再度開始。

此地，我們必須對美國兩大政黨作一點膚淺的認識。獨立成功之後第一次的分化是

在共和黨人中出現的，以湯麥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為領袖，主張各州都應保持自由，另一派是聯邦主義者（Federalists），以亞力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為領袖。傑佛遜代表南方農業者們的利益，漢彌爾頓代表東方財政人物的利益。當時人們常以為聯邦主義者們有着親英的情緒而且還一度計劃過廢棄獨立。一八二八年，經過和對敵方面的報紙上的誹謗（一世紀之後，羅斯福夫婦也同樣地受敵對報紙的攻訐）作過有力的舌戰之後，安德羅·傑克遜（Andrew Jackson）當選為大總統，於是舊共和黨乃變成了民主黨，聯邦黨乃成為灰格黨（Whig Party）。一八五四年，灰格黨因為對奴隸問題意見不一而瓦解，一八五六年，它以共和黨之名而重生。這新共和黨的力量乃是基於工業化的北部和東部的；民主黨的力量則以南部之農業為基礎。共和黨建議要提高賦稅，民主黨要求自由貿易。最後，它發展為內戰時的區域鬥爭，南方乃由聯合而成為聯邦各邦。然而在北方和東方依然存在着不少聯合民主主義者。這時，西沃圖·羅斯福（那位西沃圖大總統的父親）放棄了羅斯福家系中民主黨的傳統而成了共和黨人。和他同時的堂兄弟詹姆士·羅斯福（富蘭克林的父親）則仍屬於聯合民主黨。內戰之後一直到一八八四年格魯伐·克利夫蘭當選大總統時為止，民主黨一向在

灰暗時期之中。克利夫蘭先任勃法羅市長，後任紐約州長，顯示出頗能不受政治上後台老板們的操縱。

民主黨就全國而論雖然處於灰暗之境，但是在州的政治中它還是保有着偉大的權力。在東部，所有愛爾蘭血統的人們全是民主黨人。「老板」這個名目乃是在荷蘭統治下時一直傳下來的，不過把這橙黃色的字染成綠色的却是愛爾蘭人。政治老板乃是黨機構中的經理人，凡是州以上的官吏由一政黨更換入另一政黨手中時，在那種政治競爭之後，老板們有全權支配「贓物」(Spoils)的勢力。八十年代中的鬥爭之一就是要使文官職務不受分贓制(Spoils System)的限制。青年州議員時代的西沃圖·羅斯福是和分贓制鬥爭的出色人物。

英國人往往把共和黨和民主黨比作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其實並不如此。事實上，共和黨對投資利潤的保護以及對大商業的忠貞，都頗似保守黨，但是除此以外，他們並不比來自喬治亞或卡洛林那的保守的民主黨人更爲保守些。西沃圖·羅斯福本人就是一位前進的共和黨人，有點像英國的托爾民主黨人(Tory Democrat)，富蘭克林·羅斯福則是一位前進的民主黨人(Progressive Democrat)，因此，他努力使民主黨十足地

代表出自由主義；因此，他獲得不少前進的共和黨人們的附和。一般說來，南方還是十足民主黨的勢力，東方主要是共和黨的天下，西方和中西部則不時變換於兩者影響之下。最後，我們可以說共和黨和民主黨在意識上並沒有什麼可以見到的區別，它們之間的區別乃是地理、傳統和經濟上的混合物。這可以說是一種真正政治上的區別，而且，儘管世人對美國的政治多所非難，在世界上却祇有美國的『政治』(Politics)才較近於制定這一名稱的海倫尼斯(Hellenes)的原意。

美國政治的活潑生氣，一半也是爲了總統任期短促的故，總統每四年選舉一次。衆議院每兩年選舉一次。一九一〇年時，參議員仍舊由各州的立法機構選出。不論人口多少，每一州選兩位參議員加入國會。參議員每六年選舉一次可得聯任，但是三分之一每二年即告退休，因此舊人員總比新人員多二倍，使參議院中的意見比衆議院中的意見顯得平穩。除了組成了國會的參議院和衆議院之外，還有州立法院(State Legislature)包括有州參議員和州衆議員(state Assemblyman)或州代表。每一州的首領是州長(Governor)原是憲法上襲用殖民時代的名稱而產生的。他的任期自一年至四年，各州不同。在紐約，以前二年一選，現在改爲四年。大體上說，州長之和州的關係，正如總統

之和合衆國的關相係似。

一九一〇年，有一件改革案使前進共和黨人和前進民主黨人們都深深震動，這就是修正憲法，規定州立法院投票選舉國家參議員，不再由民衆投票。兩黨的後台老板們一致反對這種修正，因為它削弱了他們的勢力。一九一〇年西沃圖·羅斯福回來時，四年以來努力和兩黨在紐約的保守勢力作鬥爭的州長却爾斯·E·霍甫士(Charles E. Houghes)已經辭職改任最高法院的法官。西沃圖·羅斯福決心要保全紐約州長這個位置給不受政黨老板們左右的人，在沙拉吐迦的共和黨州選大會中，他竭力促成推舉亨利·L·史汀生出任州長，同時提出了進步性的方案，史汀生在富蘭克林第二第三任大總統任內，担任了陸軍部長。

民主黨州選大會在羅乞斯特舉行，民主黨人預感到他們敵對黨中的內爭情形，乃推約翰·A·狄克斯(John A. Dix)為州長候選人，以為必操勝券。這次大選會中，富蘭克林·D·羅斯福任荷蘭郡代表。這是他第一次參加積極政治活動之始。

沿赫德遜河的各郡都是共和黨勢力，情形正如英格蘭東南農村區全是保守黨勢力一樣，但是在赫德遜或包甫凱撥西之類的城市中，頗不乏支持民主黨的力，而在包甫凱撥

西，這種力量之強大，甚至可以在最後決選中，爲荷蘭郡舉出一位民主黨的議員來。市長沙迦（Sagon），包甫凱撥西的民主黨市長，以爲富蘭克林·羅斯福是優良的競選人，同時人們建議另一位民主黨鄉下紳士路易士·史都繼巽地·錢勒（Charler）應該放棄在州議會中的位置而參加二十六參議員區中的競選，在這競選中荷蘭郡要和哥倫比亞和包特南郡週旋。錢勒對這種建議的回答是：「不，多蒙分神」。自一八五六年以來，除了八八四年中有一位受三面攻擊的民主黨人被選之外，民主黨人從沒有被選參加二十六參議員區競選過。因此，人們把這建議提給羅斯福，他當時也許以爲自己非待下屆選舉時，不能被選爲荷蘭郡州議會區候選人，同時他個人在包甫凱撥西的聲望使他自覺頗有勝利的把握，因此他接受了這種建議。他在紐約的事務所以及他的家人們都以爲他發癡了。當然，包甫凱撥西方面地方政黨的首領們也這樣地想着。

在舉行地方選舉前三天，他照當地民主黨領袖們之召，禿着頭，穿着馬袴和長統皮靴，走進荷蘭郡主席的辦公室中去。

「你該脫去那雙黃皮靴，換上一條正正式式的褲子」，主席很仔細地看着他說道。

三天之後，十月六日，富蘭克林·D·羅斯福由區代理人邁克擴舉命名，邁克對聽

衆們歷舉以前這位青年人的各種成就。他是哈佛同年級的永久主席，紐約牛乳業委員會的一員，海員公會的受託人。

在那天晚上的宴會上，羅斯福說：「我以絕對獨立的立場接受這次的候選。我不向任何人起誓，也不受任何特殊利益的影響；以後我也將如此。如果我當選，我一定以全部時間爲本區的人民服務。」

包甫凱撥西的「鷹」報上說羅斯福先生在這次競選中至少納了四位以上數字的競選基金，而參議員史哥羅利不致因爲他的競選而受很大的糾擾。

羅斯福所作的唯一貢獻就是他不敢助於黨方面基金的支援而完全自己開銷一切競選費用。黨方面絕不會斥資來支助爭取一個根本沒希望取得的位置的。羅斯福進行競選不過一個月，他決定把個人的呼籲對象完全集中在鄉村農民身上，把城市中的競選工作完全託付給黨方面的組織去進行。當時要藉匹馬單車去走遍三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坐一部汽車去。這舉動被認爲非常愚蠢，因爲在一九一〇年時，農民們依然認爲汽車是魔鬼的發明品，它是傳染疫病給農民的。羅斯福坐的是一輛鮮紅的汽車，同車的是李加圖·E·康乃爾，他十年來總在試着爭取第二十一區的衆議員一席，這一區包括荷蘭郡，包

特南，哥倫比亞，及赫德遜西岸另一個郡。康乃爾想對小學生們演說。他以為當小學生的長大之後可能選他為眾議員的。

羅斯福夫人祇能參加一次集會：因為第四個孩子快出世了。她回憶她第一次聽她丈夫演說時的情形，當時她非常不安，因為他說得很慢，有時停頓了半響，使她害怕，以為他會中斷了的。

「他那時看來很瘦，很高，非常嚴肅，有時很局促不安。皮膚白皙，頭髮金黃，深深的一對藍眼，態度俐落。他臉上沒有一點縐紋，但是有時看看他的下頷使人覺得這位機警的青年在服裝和外表上頗能流露出力量和荷蘭的固執氣派。」

羅斯福在那次競選中被選並不是因為他善於詞令；而是因為他能在一握手之中就和農民們成了朋友，同時因為他洪亮的笑和對鄉村常識的淵博。十一月八日，羅斯福當選為二十六區州參議員，康乃爾當選國會代表，那年秋天，民主黨全獲大勝；但是羅斯福在他自己區內所得的擁護者，人數比在競選州長時壓到史汀生的狄克思多。共和黨的老板們已經對西沃圖·羅斯福上校宣戰了。

羅斯福非常希望能被選任為紐約州參議員的意圖，從他將妻子們一起遷居在近阿爾

巴奈議事堂的國家路上一座住宅中的舉止上可以看出來。

『在阿爾巴奈』，有一天羅斯福夫人這樣寫：『我開始了我一生的兩重性的生活。從此之後，無論我丈夫是否在政府中工作，社交公衆生活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了。在他，這是他全神所注的事業。』他也許在那時還不能像今日這樣組織起他自己的政治哲學，但對是政府科學是有趣的，而且人民，了解人民的能力，在他們的個性中表揚自己的個性，這些都引起他孜孜研究的興趣。』

除了勞合·喬治之外，這一世紀中有沒有把人民當作人民看，和羅斯福一樣地對他們發生興趣的重要政治家，這是一個問題。一般政治家在試圖了解人民時總認爲人民不過是投票人罷了。這並不是說羅斯福在今日不能算一個深刻地把人民當作投票者來了解他們的出色人物；不過對研究他事業的人，我們該說他所具有的乃是一種創造性的了解，而不是單純的利用主義的了解。

那時，羅斯福夫人還寫道：『我以我該作什麼的觀點來看每一件事物，而很少從我要作什麼的立場出發……因此我對政治發生了興趣。』

羅斯福夫人進入實際政治頗有一點戲劇性。州立法會第一件要務是要選出一位參議

員來接替一九一一年三月中任期屆滿的共和黨人瓊賽·地庇奧的。由於明年大總統競選時民主黨的希望很大，民主黨從州選勝利中獲得的新參議員也因此受人注意。丹默乃·霍爾的老闆毛菲（Murphy）所選定的是勃法羅的『藍眼』皮萊·薛漢。對薛漢外界並沒什麼不滿之意，不過他爲紐約方面許多公務公司及所牽累，爲了民主黨競選化了很多錢，是互求利用的黨機構中典型的產品。

前進民主黨人並不以爲他足以代表他們要昭示全國的那種精神，於是另外舉出一位候選人艾德華·M·薛派德，他是羅斯福所擁護的。民主黨還沒有集會舉行候選人命名禮前數日，毛菲方面傳來了消息說薛漢爲坦瑪奈所選。羅斯福獨自在阿爾巴奈散步，他必須決定要屈服於毛菲脚下呢，還是要高趾闊步地和黨機構作對。西沃圖·羅斯福二十三歲任議員時爲了要彈劾法官惠斯特勃洛克而不惜得罪別人。我們可以假想這一個榜樣正可以在一世代後一位二十九歲的州參議員身上找到。他在格羅頓時就以不顧一切高踢足球聞名。薛漢不該作民主黨候選人。爲了要使他得選，黨方面須有一〇一票；他們可能有一一四張票，一切安排得很好。羅斯福現在的目的就在不使他得到這一〇一票，他勸服了十八位民主黨議員和自己一起不參加預選會，因而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們發表了

一個宣言，聲稱他們爲了黨的利益不能參加這集會。

因爲他們相信足以代表人民的人們所投的票，不該在會中被阻抑住，他們以爲人民該知道他們的代表如何不受任何預選行動的限制來進行投票；使人民知道任何候選人所得到的羣衆乃是由立法會中代表的推舉而非該團體以外的人所左右的。

另外有兩位立法者加入了這次的反叛，戰鬥於是開始了。

反叛者們的年紀有老有少——其中一位已過七十——各種人物都有。統一大家意志的就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他們之中如果有一個人脫逃，這小小的黨團立刻就會破裂。立法會每天開會選舉參議員，每天又必須因選不出參議員而宣佈延展會期。反叛者們每天早晨九點鐘時，常在國家路羅斯福家中聚會，一起到議事堂去，紀錄下他們妨礙議事進行的選票，然後在羅斯福家中的圖書室裏吸吸煙，話語天，一直到下午兩點鐘。這種廉價雪茄的煙沖到二樓的嬰兒室中，於是嬰兒室遷到三樓去了。反叛者們不停地吸着煙。羅斯福很有木領使這一切看來像是開玩笑似的。

種種壓力被加在他們身上，要使他們屈服。全州各種會團委員會等都傳出對薛漢有利的決議。郡中報紙編者們也立論支持薛漢。有地位的商人們被邀到議事堂中來警告

反叛者們說如果他們不支持薛漢，他們的政治生涯即將告終。甚至銀行方面也突然要起抵押品來了，羅斯福因此不得不各處奔走，爲他同道反叛者募集資金。

但是反叛者們堅持下去。正月過去了。二月過去了。三月二十九日議事堂起火，立法會不得不暫時在搖擠的小房間中開會。懸學已久的議員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他們通知毛菲說他們將在阿爾巴奈選出任何一個人來。最後，毛菲放棄了原來意見，於是州最高法院的詹姆士·A·沃戈曼（O'Gorman）法官被選出來代替了薛漢。羅斯福爲了急於想擊破外界傳說他們所以堅決反對，是因爲反對天主教的流言，所以又選了一位天主教徒。除了天主教以外，沃戈曼別無缺憾。這次選擇很得當，反叛者們就接受了。在六十四次票選時，他被選爲美國參議員。反叛者們送他們的領袖一隻銀杯。

這十個禮拜的長期戰，使人民公開投票推選參議員的運動因而展開。次年，國會中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該決議；一九一三年五月由各州立法會之請求，憲法修正案第十七條中乃正式規定該議，並付諸實施。

坦瑪奈方面對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意見，可以由「大丁姆」蘇立文的話中表達出來，蘇立文在看到新立法會議員名單時說道：

「好，要是我們抓住了一個羅斯福，最好是把他拉下來丟到水裏去。羅斯福是善於變化的，這孩子將來對我們的情形，當如那位上校對共和黨的情形一樣，他會使黨分裂的。」

（註）西沃圖和富蘭克林的五世祖是兄弟，但富蘭克林的父親續弦生富蘭克林從母親方面算來，富蘭克林又比西沃圖低了一輩，而和西沃圖的侄女伊麗諾同輩了。

第五 章

一個人的性情如何，可以從他所喜歡的牌戲中看出來。羅斯福最愛玩清雅的「匹奎特」(Piquet)一種雙人玩的三十二張紙牌戲)。玩「匹奎特」技巧高明的人常常使人以為他最後得勝是憑幸運的：羅斯福被認為是一位幸運的人。他的政治生涯正似一局大的「匹奎特」戲；他如果犯了錯誤，那些錯誤正如一位「匹奎特」戲者輕忽了他心愛的遊戲所授給他的智巧，因而造成了錯誤一樣。

本書中不能詳細敘述羅斯福作州參議員時活動的情形；不過他當時是全心傾意地進行這一任務的，他在三十以前就發現了他所求於生活者就是政治：不是為政治而政治，而是把政治作為政治家的武備。他在參議院中曾經因為「拒絕一支對他區內有利的費用」而引起物議，「兩黨中所有參議員們對這位青年叛徒所作的犧牲都覺得有點不解。」參議員羅斯福爭論說預定劃歸荷蘭羣修築橋樑的費用是不必要的，應該歸還給國庫。這在政治上當然是一個新的角度。也許這是一種早熟的政治家作風的表現。

他的職務之一就是任參議院中森林漁獵委員會的主席。那時通過了一條將森林漁獵委員會，森林購買局，州區用水供應處合併爲一個新的保護委員會。這使他對於費用保護方面得到不少學識，他在這一方面得到當時協助過西沃圖、羅斯福執行這類工作的吉福特·平柯特很多的幫助。二十年後的農業調整法案和泰尼賽河谷權利案的通過，實有賴於當時在阿爾巴奈議事堂中的委員會。

最後值得注意的就是他投票贊成民主黨所反對的婦女有選舉權的決議。這一票之投，是他夫人所能記起的他在州參議員任內所完成的唯一工作。

一九一一年秋天，參議會重選，民主黨老板們決定要對反對丹默乃的那些反叛者們進行報復。他們不願重選反對者而情願讓共和黨得票，他們成功了。但是反對者們的領袖還有一年的參議員任期。因此他可以在全州中掀起反老板主義的巨浪。

這裏我們且摘錄那年十一月中羅斯福在勃佛羅所作演詞的片段如下：

「上星期奎恩斯的卡山台悄悄溜走了。在勃羅克冷，麥克考埃懸掛在他自己齒牙的皮層上。勃隆克斯被擱於毛菲的圈外。阿爾巴奈的麥卡貝在春季中將由一位能擊敗巴尼斯老板的共和黨機構的青年民主黨人所取代。柯尼瓊斯·柯林斯已經失

去了掌握之權。毛菲和他的同類之輩必須被像除草似地，連根帶梗地拔除掉。」這段話在當時恰似在黑暗風暴的深夜中透露出的一絲曙光。

而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那中那種指責一團中的老板毛菲和老板巴尼斯的聲音，正是三十年之後指責世界集體中的老板希特勒和老板墨索里尼的聲音。

羅斯福作這段演說之前不久，曾經去見過烏德羅·威爾遜，威爾遜當時在新澤西任州長，他的事業顯示了在重興偉大的民主黨工作中，他是非常重要的。威爾遜曾經阻制新澤西的民主黨老板選任美國國家參議員。威爾遜設法在新澤西州立法會中通過一條基本直接法來達到這一目的。羅斯福自己和紐約州立法會中前進份子們爲這一同樣的法規而鬥爭時，是一身當前的。

威爾遜問羅斯福如果威爾遜參加總統競選，在明年夏天的民主黨選舉會中他可能從紐約代表方面得到多少票。那位青年政治家保證他能得到代表中四分之三的贊助票，但是根據小組規定這許多票當然是無效的。小組規定中制定代表須支持預選會中多數人選出的候選人，這是老板們手中的有力武器。但是，這次的會晤使羅斯福確信威爾遜是最適當的總統候選人，他回到紐約時，滿懷熱忱，一心要推進這件事。他的企圖因爲有支

持烏德羅·威爾遜的紐約州威爾遜會議的組織而具體化了。

共和黨的陣營是分裂的。原動力充足的西沃圖·羅斯福上校繼參議員拉·福萊特爲所謂「新極端主義」的領袖，一九一二年二月中，他在渥海沃·奧倫坡斯演說，贊同提案權 (Initiative)，根據這種權柄，某定數的投票人可以建議新法案，贊同國民表決權 (Referendum)，根據這種權柄，要決定人民是否贊同在執行中之一法律，必須投票表決；贊同法案撤廢權 (Judicial Recall)，根據這種權柄，大多數之投票人可以要求取消法官所作之一件判決。這一來就似火上加油。一九一二年春季中，塔虎特總統和這位置上校互相詆毀，越來越激烈。四月間塔虎特從他和上校私人信件中摘下了字句，上校對這一舉止回答時咒罵大總統是在「咬喂他飯吃的手」。西沃圖被稱爲牛麋派 (Buff Moose Party)。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調整代表陣容後，自六月十八日起，芝加哥的共和黨競選大會中有不少激烈的場面。接着是一陣寂靜的時期，最後羅斯福方面代表決定拒絕承認共和黨競選會而要自行舉行一個前進的競選會，目的在舉西沃圖·羅斯福來對抗塔虎特。

牛麋派急於要知道六月二十四日在巴爾的摩舉行的民主黨候選大會。結果大半有賴

於上校。如果議會代言人坎普·克拉克被推爲候選人，西沃圖·羅斯福將代表前進派進行競選；如果烏德羅·威爾遜當選爲候選人，則民主黨前進派正得到一個他們所熱烈擁護的人。

富蘭克林·羅斯福爲威爾遜競取候選人，非常出力。他到巴爾的摩去，同行的有一百五十位非官方的擁護威爾遜的代表團，他們的任務是在和南方及西方來的官方代表們打成一起，使他們得到這樣的印象：以爲紐約代表團是爲坎普·克拉克而叫囂，同時在利用毛菲老板對威爾遜的阻抑行爲。在恩派亞州中大部份的投票人都要烏德羅·威爾遜，不要坎普·克拉克，如果威爾遜當選爲候選人，他能爲民主黨戰勝紐約區。羅斯福夫人非常認真地進行她了解政治的工作，她和丈夫一同到巴爾的摩去。他們所租的那間有傢具的房子裏有着非常不舒服的床舖，而且屋主連碟子都不留一個。羅斯福夫人爲了這種混亂情形，非常惶惑，而她那種社交上的自信，更爲出入候選會堂，爲父親的競選而活動的坎普·克拉克的女兒的舉止所搖動了。過了幾天，她決意離開巴爾的摩。她對當時的決定，在回憶中是這樣的情形：

「天特別熱。我對競選烏德羅·威爾遜爲候選人這件事所知道的情形很少。雖

然我知道我丈夫對這件事非常關心，他化費很多時間來爲這件事而努力。最後。我以爲自己很少照料他，孩子們又要到坎普貝羅去，而且他很少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於是決定回家把孩子們帶到坎普貝羅去，在那兒靜候佳音。」

坎普。克拉克開頭就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這種情形一直發展到六月二十九日夜會時爲止，一切都表示出這位受人歡迎的競選人無疑地會在候選中得到必需的三分之二人數的。第二天，富蘭克林·羅斯福得到一點坎普·克拉克的戰略家們擬定的一個計劃，計劃中要一二百個巴爾的摩軍官和他們手下的憲兵們去到會場樓上，守門的人被吩咐了，凡是有克拉克鈕扣的人都可以放進會場中去，因此，富蘭克林·羅斯福從一位在巴的摩政治場中有一點勢力的朋友那兒立刻邀約了一百多個人，再加上他自己從紐約方面來的一百多個人，給他們克拉克鈕扣，叫他們緊跟着克拉克的便衣憲兵們進入候選會場去。在一個信號之下，克拉克的人們搖起旗幟來喊道：「我們要克拉克！」立刻，帶着克拉克鈕扣混入場中的威爾遜方面的人們也同樣地熱烈地喊道：「我們要威爾遜！」這種喊叫成了一種激擾。這一激擾使一個自由的鬥爭在對方的聲音還沒有衝出樓板前，得到一個轉機。

無疑的，決定結果情形的，基本上還是憑W·J·白萊恩對威爾遜的擁護；但是能夠在危急的時機中摧毀坎普·克拉克最後獲得候選人資格的機會，而使形勢轉變，却不得不歸功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小手段。投票贊成推威爾遜的數目迂緩地增加着；直到第四十三次投票時他才得到多數票。最後，在第四十六次投票中，威爾遜以九九九票對克拉克的八十四票，由於坎普·克拉克的經理人的一個舉動，候選乃一致通過。

在坎普貝羅，羅斯福夫人「在威爾遜先生最後勝利時，得到一個狂喜的電報，它說：威爾遜今午被選為候選人，余全部計劃勝利。富蘭克林。」

在候選會之後的一個計劃是到新澤西，西吉特去見烏德羅·威爾遜。

「我在紐約見到克米特，他說：主教正在為克拉克祈禱，」當記者們訪問時，富蘭克林·羅斯福這樣說。克米特的父親，那位上校，聽說烏德羅·威爾遜當選時，心中一定不高興；但是八月五日前進共和黨候選會合法地在芝加哥舉行，他已被推為候選人。在太平洋沿岸，南方及東方各地演說之後，他在十月左右到了中西部。十月十四日在梅爾華基，他從旅館中到市議堂去演說時，被一個瘋人開槍射擊了。子彈進了他的胸膛，如果他的袋子中沒有那個眼鏡盒子，那捲原稿，他的肌肉如果不是那樣結實，這一槍也

許會使他死去。「別傷害那可憐的人」，他說，他不願友人們的勸阻，堅持要換去那件染了血的襯衣，對聽衆們演說。他演說了一小時，直到快結束時才有一點困倦之色。他被送到芝加哥一家醫院中去，醫生們說他的生死未能判定。威爾遜在霍思上校（Colonel House）的建議下宣稱在上校不克競選期內，他不再發表任何競選演說。羅斯福上校對這一點反對道：

「在我沒有被刺之前所宣佈的種種對我以及我們信念攻擊的真理和道理，現在仍舊可以作爲攻擊我的真理和道理，而且應該爲這種原因而繼續說下去；現在所不能宣說的，正是在此之前所不該宣說的。這並不是對任何個人的競爭，這是關於主張原則的鬥爭。」

上校的妻子經過絕大的困難，才算勸他休養了半個月；但是在十月三十日，他又在梅迪遜廣場上對一萬六千人作結束他競選的演說。西沃圖·羅斯福說話時非常安靜深沉，但是却具有非常動人的忠實情緒。他真是個非凡的人呵！

「我非常高興，因爲我是在這種鬥爭中，獻身於鬥爭，能夠以畢身時間來進行鬥爭的許多人中的一個。這是一個爲正義，爲友愛，爲人類幸福而進行的鬥爭。」

西沃圖·羅斯福作這段演說時，富蘭克林·羅斯福正害着傷寒，病臥在紐約。他的妻子也病倒了。而他還要爲紐約第二十六參議員區競選而鬥爭。

這時，政治舞中出現了路易士·麥克亨利·霍威（Louis Mc Henry Howe），在羅斯福夫人看來，他是「一位安靜，有點像小鬼似的，從阿爾巴奈來的矮小新聞記者」。

路易士·霍威是沙拉吐迦溫泉一張地方報紙編者的兒子，他開始新聞生涯時擔任紐約呼聲報的通訊員。他在這種職位上採訪州政治新聞，範圍包括阿爾巴奈的立法會議。他比富蘭克林·羅斯福大十一歲，在對薛漢的鬥爭中，他覺得富蘭克林是非常有前途的，現在，他正在阿爾巴奈和別人以五十元打賭，他說儘管丹默乃如何作難，羅斯福必定再度當選。

「覺得非常可憐，頗有點像勞拔特·路易斯·史蒂文生在梵利馬時神情」的羅斯福要他妻子打電話給霍威。霍威開始擔任爲他推動競選運動。這推動中有一件出色的事，就是赫德遜河流域的競選人第一次在報紙上刊登了全面的廣告，公佈了他對抗公司商人，保護農民的計劃。這是救濟農業的好計劃。這廣告使富蘭克林再度被選爲州長參議員。

，而那位眼光遠大的路易斯·霍威因此得了五十元。

從此，最非凡的合作就開始了。

那時，羅斯福夫人不大喜歡路易斯·霍威，他的香烟有點熏人。

「我覺得他的烟損壞了我丈夫臥室中應有的新鮮空氣，祇要他來報告競選的情形，我心中就老不高興了，我完全沒有看到他是在使競選得勝，而且也不知道在當時沒有他，我的丈夫將更加困苦不堪，而且失敗。我就討厭他的來訪和他的烟。我現在奇怪當時它們如何地使我頭疼。我沒有一點尊視觀念而且在行爲上更顯得非常冷板。」

當富蘭克林·羅斯福再度當選爲紐約州參議員時，烏德羅·威爾遜被選爲美國大總統。西沃圖·羅斯福得票數佔第二位。塔虎特又次之。西沃圖和塔虎特二人得票數合起來，可以綽綽有裕地擊敗威爾遜。共和黨保守派們責備西沃圖，說他分裂了全黨；但合理地計算一下投票數，便可明白分裂共和黨的是他們，不是他。我們說如果西沃圖·羅斯福當選大總統，也許就不會有一九一四年的歐戰，或者說即使歐戰爆發，也不致展延這樣之久，這種說法並不是誇張之詞。

在紐約州，民主黨再度佔取了立法會中的參眾二院。勞拔特·F·華格納（Robert F. Wagner），二十年後提出了全國工業復興法案，在新政（New Deal）中担任要務的人物，在富蘭克林·羅斯福擁護下被選為州參議院主席。阿爾法萊特·恩曼紐爾·史密斯（Alfred Emmanuel Smith）被選為州議會主席。二人都是丹默乃方面的人，都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好朋友。在大西洋彼岸，那年十一月中，一個維也納的漆匠正到慕尼黑去找工作，本尼都·墨索里尼正被選為義大利社會主義黨會議中的一員。在英國下議院中，工會主義者們正在瘋狂地激動着。十一月十三日，主席宣佈議會延期，海軍中新任爵士的溫斯頓·邱吉爾步出議會時，反對者們都向他喊着「耗子！」邱吉爾先生搖搖手巾答覆他們的呼喊，那時一位烏爾斯泰人（Ulsterman）羅納爾德·麥克乃爾先生拿一本厚書，擲向他臉上去。麥克乃爾先生日後被任為克斯漢登爵士。

那年冬天，當州立法會開會期間，羅斯福家人們住在泰恩·埃克旅館中。羅斯福夫人說當時傳說她丈夫被邀參加担任華盛頓方面的行政工作，但是她忙於家中事務，沒有多注意這種傳說。她當時半星期在阿爾巴奈，半星期和她的孩子們在紐約。羅斯福自己為救濟農民而對公司行號進行鬥爭。在這一方面通過了一個法案。他同時建立一個委員

會，專門考慮紐約城中許多罪惡問題，建議組織一個「道德」警察隊以禁閉「罪惡窟」和放蕩的婦女們。也許在一九二一—二三年冬季在西四十區第六街和百老匯之間紐約警察的激烈行爲正是這一委員會所促進的。那時筆者正臥病在紐約旅邸中，還記得當時警察搜索賭窟的情形：那比當時的電影好看得多。

烏德羅·威爾遜就職前三日，富蘭克林·羅斯福從紐約到華盛頓去。在那兒他遇到新行政機關中任財長的威廉·麥克阿圖（William Mc Adoo）。麥克阿圖問他願不願意担任紐約港的收稅官。這是個很好的位置，因爲這意思說他可以在退休前得到很好的進款。這位「匹奎特」牌戲者看一看手中的牌，放棄了這一張愛斯牌。於是麥克阿圖建議要他出任副財長，這是更好的職務；但是這位牌戲者又放棄了這張愛斯牌。那天下午他到未來的海軍部長裘斯夫斯·丹尼爾（Josephus Daniels）那兒去。丹尼爾問他願不願担任海軍助理部長。羅斯福毫不猶疑地允諾了。正如一位好「匹奎特」牌戲者那樣，他爲了要造起自己的分數（這是好牌戲者最初的目標），他情願放棄兩張大牌。

三月十七日，他結婚週年時，辭去了州參議院的職務，宣誓就任。他才三十一歲過兩個月。西沃圖·羅斯福直到三十八歲時才担任了這個位置。

那時，合衆社採訪這次典禮的記者，日後成了F·D·羅斯福總統的助理私人祕書

……

他有一次對一位報人說：「一個國務院中的首領要走完一百碼路到白宮去，竟要化費二十年光陰。」

「呀」，那人回答道：「但是在戰場上，一百碼已是很遠的距離了。」

第六章

裘斯夫斯·丹尼爾提出要富蘭克林·D·羅斯福出任海軍助理部長時說因為他以為富蘭克林是他在華盛頓所碰到的最漂亮的青年人，這好似他僅是爲了好奇而有這種建議；但是這當中也有一點真理存在着。丹尼爾自己是從北卡羅林那來的美以美教徒。他並且是白萊恩一派的和平主義者，而以白萊恩爲國務院首領，以一位勃萊斯巴特里安的長者作白宮主人，更有這樣一位新海軍部長，美國海軍的前途似乎很暗淡。

但是裘斯夫斯是一個機警的——非常機警的人。他在爲威爾遜競選中，負責民主黨一切對外事務。他已經注意到羅斯福受人歡迎的情形了他也許已經注意到這人的名字是戰鬥的代表。他看見羅斯福拒絕了熱中於政治生涯的青年人一定會抓取的兩個肥缺，心中非常感動。他也許還注意到羅斯福對於海軍中各種事務的興趣。最後，他是非常機警地覺得應該有這樣一位青年副手來和他自己所不願也不善於周旋的海軍人物們往來，因爲在這個海軍行政機構中，有不少事情需要清理，而且這機構看來要有十年黯淡時光，

受大商業和政客們的影響很大。

丹尼爾和富蘭克林·D·羅斯福兩個極端會合之舉是異常的成功，就他們兩人相輔相成一點上看來，兩人都值得我們稱道，現在行年八十，作為註墨西哥大使，過着光榮的退休生活的丹尼爾，在三十年前一個春天的下午，選任了這位青年助手，這是舉世所該稱頌的。

伊麗諾·羅斯福專注她家庭中的事務，始終沒有想到華盛頓方面有這種任命的可能性。當她接到丈夫的電報說他就任海軍助理部長的消息時，她立刻跑到那時住在康乃克的克特的姑母柯爾斯夫人那兒去商量。柯爾斯夫人是西沃圖·羅斯福的姐妹，海軍少將齊菲爾特·柯爾斯的夫人。她在華盛頓N街一七三三號有一座住宅，西沃圖就在這住宅中等候麥金萊夫人從白宮搬出來，這住宅以後補稱為「小白宮」。一九〇五年伊麗諾和富蘭克林參加總統就任典禮也就在此地。柯爾斯夫人對她侄女說，作為一位海軍副部長夫人，她的「責任是要澈頭澈尾，隨時隨地注意海軍」，而且要使在華盛頓以小小收入維持地位的青年軍官們的妻子們過愉快的生活。她同時告訴她侄女訪客時的一套：「我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夫人。我丈夫最近被任為海軍助理部長」。

這樣一家又一家地自我介紹之後，羅斯福夫人覺得自己的羞澀慢慢消逝了。這並不
足奇。

那年秋天，羅斯福家人們從貝姨（柯爾斯夫人）手中買了「小白宮」，全家遷去了
。詹姆士·羅斯福夫人幫他們安頓一切，她媳婦就到處去訪客。她說那年冬天，她每下
午都忙着去拜訪。在拜訪中，她還見了那時住在近N街一七三三號附近一家公寓中的路
易斯·霍威夫人。富蘭克林·羅斯福把霍威從阿爾巴奈拉到海軍部去幫他的忙。他以爲
霍威對他將有絕大的幫助；他推測得很對。我們想羅斯福夫人一定很遺憾地認爲這種看
法是對的。那時，她發見霍威夫人沒有汽車，於是她在進行訪客時，常常用車接霍威夫
人和她的男孩子到處去走走。她車中也常坐有自己的一二個孩子。但是，羅斯福夫人真
正喜歡路易斯·霍威，不再討厭他和自己丈夫那種密切交情，却還是幾年以後的事：一
直到一九二〇年副總統競選時才開始的。也許她如果早日和路易斯·霍威做朋友，她能
早日得到真正了解政治的鑰匙；但是在華盛頓那些早期生活的年月中，她成了一個「華
盛頓社會體系的奴隸」，而且，她還要負起照顧一家小孩子的責任。在一九一三——一
四年冬季中，另一個兒子快出世了，而那些拜訪，每天二三十次的拜訪，真是非常麻煩

的。

「禮拜一訪最高法院法官們的太太，禮拜二議會會員；禮拜三；禮拜四參議員夫人們，禮拜五外亦家們；還有其他各種人物；禮拜六及禮拜天照顧孩子們。」

縱着是乘海軍船隻的遠航，這是羅斯福夫人所畏懼的；還有赴各海軍基地和船塢去巡視，必須要經過漫長疲乏的旅程，而且永遠要疲乏地背那一套正確不悞的演詞和動作。海軍中一切儀節問題使羅斯福夫人担心。上軍艦時該她在先還是她丈夫在先呢？他站着敬禮時，她該怎樣呢？她該巡視的是船中的那些部門呢？海軍部長自己在海軍儀節上也常常犯許多錯誤；但是丹尼爾從沒有像海軍助理部長夫人那樣爲這些問題担心。羅斯福自己「似乎坦然地知道一切」，他妻子記錄道：

「我真奇怪他怎麼會得到這麼多的學識，而我却要努力問許許多多的問題。也許他很早就對生活中一切發生好奇之心。在任何情形之下，他總能回答我們許多問題；有時我們以爲這次一定把他難住，使他答錯了，但是一翻百科全書却證明了他

人的。他對自己的學問一點都不誇大，輕描淡寫地，祇有專家們才會覺得他所知是如何地專門——平常人還會以為他祇有一點表面上膚淺的學問而已。他對自己不知道的東西，絕不裝作知道，更壞的是他還不斷指出自己所說的錯誤。他漂亮而有風度。他善於社交，知道如何穿扮。因此他除了因為自己的功績而爬向梯級上去之外，還得到不少社交上的利益。他是非常善於應變的。他還很小的時候曾經告訴他母親說如果他不能立刻至少同時完成兩件事，他覺得應該慚愧。羅斯福的善於應變又成為他顯得膚淺的一種外表了。他會哈哈大笑。這可以說他也許是禁抑不住自己的笑，有人說他欠莊重，也可以說他是用笑來作掩飾，而有人就說這是不誠實的證明。他總是怡然自得，而在別人看來，個性真正深刻，智力堅強的人們對嚴重的責任是不會處之怡然的。政府官員所負的責任一定是很沉重的，人們看一位偉人舉起這沉重的負擔時，總希望見到他們筋肉暴露，汗流滿面。最後，羅斯福有一種吸引個別一個人底堅強信心的能力，這在一個政治家說來也不是好的標記，因為這祇表示出一種吸引別人，以利害相誘的個人野心而已。是的，一切責任是很沉重的，但是羅斯福之能担負起它們。正足以表示出他的人才。

在這兒，我們要知道，美國大總統的閣內人物和英國內閣人物不同，他們沒有集體

担負的責任，而且他們個人在國會中並不佔一個議席。因此當他們中有人發表有關政策的演說或文字時，它不對任何負責，祇對總統個人負責。同樣地，一位海軍助理部長在不使他的上司發生棘手困惑的前提下，可以隨意發表他對政策的意見，這是英國海軍副部長所辦不到的。英國海軍大臣當一九一三——一四年時，在一個和平主義的，一心專注於社會革新的政府之下，會像青年的羅斯福當時在報紙上發表如下的文字，這是不可想像的事：

「我們的國防必須擴展包括全部西半球……爲了要保持巴拿馬運河，阿拉斯加，美洲薩摩亞，關島，報特，里可，康他納摩的海軍基地，菲列賓羣島，我們必須有軍艦。我們要建立一支在戰時非但能保護我們的海岸以及所有土地的海軍，同時要使這支海軍能保護航行到任何地區去的我國商船。」

那時，海軍預算中被減削成二百萬元，海軍大受阻抑，而這位青年海軍助理部長却

能隨意寫出自己的意見，不受譴責或解職：

「我們的海軍是不適於作戰的。我們現在能派到第一綫和敵人有効地作戰的艦

「幾天前我作了一次試驗。我問二十位海軍軍官在戰爭中願意選擇十隻奧立貢級艦，還是一隻約明級艦；指揮十艘奧立貢呢，還是指揮一艘約明。其中十九位回答是情願指揮一艘約明級。餘下一位喜歡奧立貢級。他有運動員的作風，他說約明級可能自由地亂衝。」

我們可以說當時美國人民還是忿恨戰爭的，戰爭使他記起長期的內戰。對西班牙的戰爭爲期很短，據富蘭克林·羅斯福看來，它的影響祇是供作小學教科書中的「癡話」，說「使美國孩子們相信自己能對付十個英國人或十個德國人，美國在每次戰爭中總是光榮勝利的。」筆者記得在一九一二年秋天，看見一隊兵走過印地安那，當時我在從貝德福到法蘭西·立克的街車中聽見有一位老先生非常不滿地在說他從戰爭以來沒有見到過這樣多的士兵，士兵這樣多在他看來是很可羞的。記得有一次，筆者參加一位坦瑪萊世界中很有聲望的人的宴會，他搖頭表示憐憫，因爲父母們今後將不願兒子的物質生活前途而使他們成了職業化的丘八了。這就是爲什麼一年後，若干州的警察法庭法官們竟以判決送男子們進海軍服役爲懲罰的道理。

羅斯福莊嚴地說：

「海軍不是一個革新或懲罪的機關。我們不接受不合格的人員入伍。國內有如藐視美國海軍軍役的法官，這事使我深引為憾。」

和平主義者宣傳中一個根本錯誤就是他們以為如果把戰爭一切外形作為可以藐視的，可笑的，退化的東西看，戰爭便會不銷自滅。

我們不必在此詳細敘述在美國發現自己被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積極行動之前若干年中麥斯夫斯·丹尼爾和他的助理部長合作，如何地改良了美國海軍，也不必詳述羅斯福個人在沿這一方向前進時的成就如何，我們祇舉恩斯特·K·林德萊的話就足以證明一切了：

「羅斯福直接負責指揮海軍文官各人員，海軍港塢，和購進供應品等任務。在此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地說出當時和羅斯福一起工作的海軍高級軍官們非凡的忠誠和敬愛，使我們很難以在作為一位主管人員的他以及各處組主任的工作之間，劃出一條區分的界綫來。和我談過話的人都使人明瞭他們是非常和諧地合作着的，但是他們都說在開始時，他種熱誠的監護反而使他們不知所措。」

「我一生來從沒有這樣密切地受人注視過，」一位海軍少將對我說。「三個月

之後，他決定我是對的，這樣我們很好地合作了六年。他有時會過份地約束我，或者提議一二種改良的地方——他使他最信任的人都不得不常常戰戰兢兢地。」

這是羅斯福沒有就任大總統之前，那位吹毛求疵的林德萊所寫的文字。

羅斯福任務之一就是要使美國海軍恢復它的自信心。他能在三十五歲以前，當他還不過擔當一個並不重要的職位時完成這件事，使他被確認為確是一位有非常天才的青年人，同時我們，也得歸功於裘斯夫斯·丹尼爾。

一九一四年八月，另一個兒子去世了。羅斯福正在坎普貝羅。他被召回華盛頓，因為歐洲情形嚴重。他妻子還沒有起床時，他就按自己的愛好那樣，乘一艘驅逐艦到那島上去，這是他第一次走在橋上，從一條祇有在高潮時才能航船的海峽眺望驅逐艦的時候。

八月十八日，烏德羅·威爾遜發表了他的中立宣言：

「無論在思想或行動上，我們必定要一無偏見，我們必須約束我們的情感，約束任何足以被解釋為一黨在他黨之前捲入這一鬥爭中的行動。」

我們將把這些字句和二十五年後另一個中立宣言相比較。

西沃爾·羅斯福在上年五月中從巴西遊歷回來，他在地圖上畫了一條長六百哩的新

河流，但是他此行耗損了很大的體力，一直都沒能復元。威爾遜發表中立宣言時，這位上校寫了一段文字給「展望」：

「中立也許是保持和平最必需的……但是我們這一舉等於沒收了我們目前爲比利時的和平所該作事的權利，付出爲我們自己、或者在未來也可以說是爲別人的和平而應該付出的科罰金。」

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展望」上又發表一篇文字道：

「我們在這片大陸上的人應該明白我們是如何幸福，因爲在西方世界的我們不必參於在舊世界列強中製造仇恨的過程……當然我們很明顯地希望繼續完全中立，除非有迫切的需要，我們的中立將不致被粉碎，我們也不致參加雙方的任何一面。」

這字句是用來非難他對美國和戰問題的貫徹態度的。那年六月西沃圖·羅斯福在歐洲，在巴黎和倫敦兩度遇到了霍思上校，他知道上校是爲總統進行秘密任務的，因此他估計烏德羅，威爾遜在高唱思想都要中立化時，一定得到了什麼秘密外交報告，事實確是如此，他不願很早就提出行動的要求來使當局爲難，不到幾星期，他證明了威爾遜使美國不捲入戰爭中去的種種努力是根據理論，不是根據事實的，從那時起，他有力的筆

就從不放鬆便利主義一步。西沃圖·羅斯福在戰爭初啓時的看法和大多不列顛大部人們的看法相同，如果德國人不進入比利時，也許英國一直要等公共輿論對德國作戰的令人難忍的方法不能再默忍時才會宣戰。

西沃圖·羅斯福從歐洲回來時，傳說他將接受為紐約州長候選人以使前進派重新回到政治的主流之中，同時，人們勸富蘭克林·羅斯福代表威爾遜民主黨和坦丹默乃想拮抗。富蘭克林認為如果沒有全體前進派人物的支持，他就不願採取這一行動，而當時似乎要有許多幕後行動才能達到全體一致的目的。事實上，兩位羅斯福都沒有接受州長競選；但是民主黨前進派仍舊要和丹默乃進行鬥爭，他們決定和老迦德（Old Guard）拮抗，準備競選美國參議員，羅斯福同意接受這次的候選。這從黨派政治觀點上看來是很重要的機會，因為這是新直接初步法成立後，人民直接票選第一次的候選人選舉。選舉人們應該已經看出了後台老閻們無力反對這種革新。那時却爾斯·F·毛菲作了一次聰明的舉動。他為丹默乃推出一個無瑕可覓的競選人，威爾遜委派駐德大使詹姆士·W·吉拉德·吉拉德接受了。這樣使羅斯福不能使競選成為威爾遜民主和丹默乃民主之間的爭執了。無疑的，羅斯福相信他是以參議員支持政府的威爾遜所同意的人物。南方民

主黨的參議員大半是十足的保守派，在表面上看來像是威爾遜要羅斯福下台的。羅斯福也大爲焦灼困惑。

「我不願意相信毛菲能把一位大使拉來作一張惡劣的候選人名單上的可敬的第一名人物。吉拉德先生會被拉進這個鬥爭之中，這也是我絕對不能相信的事。」

我們可以假定那時還沒滿三十三歲的羅斯福也不願使毛菲安穩而自己引退；因此，他發現吉拉德真要競選時，他立刻向海軍部請假三週，趕到紐約州去到處責罵丹默乃。結果他在候選人競選中雖然得到州中上部各地農村的投票，但却敗於七〇・〇〇〇票的都市投票者手中。當十一月選舉時，吉拉德爲共和黨的詹姆士・W・華思華綏所敗。

這次競爭決定那時的情形，其重要性不及它給予羅斯富的教訓的意義。第一，它給予他的自信以最有力的打擊。直到那時爲止，他短暫的政治生涯還沒有受過一點打擊，如果他的失敗使他略受阻抑，他將更迅速地爭取成功，這失敗對命運注定了他未來應負的重大責任是有利的，對他能對付未來命運爲他安排的更嚴重的打擊，也是一大幫助。這

是他的失敗給他的精神教訓。還有一點實際的教訓，就是說在作迅速推進之前沒有安定自己兩翼方面的局面，在政治上是失策的。威爾遜也許使他下台，但要確使威爾遜不使他下台，却要全靠他自己的安排了。最後，這次失敗使他明白他如果要作一件重要的事，同時就不能讓別的事來阻撓他。參議員競選是在歐洲開戰以前被接受了的，羅斯福一定希望以他在海軍部工作之重要性為理由，收起了他的驕傲，從競爭中退了出來。這看來似乎正是加強渲染這一工作的重要並不在那位駐德大使所作工作之下的好機會，這一點在他表示對吉拉德樂於放棄大使工作的驚訝時，已經流露出來了。

羅斯福夫人要照顧另一個孩子，對這次競選的情形已經不能記起；不過她至今還記得她丈夫常說他不會成功一位良好的美國參議員的。我們懷疑羅斯福也許早就準備好如何克服失敗，使它成為他的勝利。他回到海軍部去，非常熱烈精勤地工作看。

一九一五年春天，羅斯福和威廉·非力浦斯（William Phillips）被委為舊金山博覽會委員。非力浦斯當時是副國務卿，是羅斯福家人的好友。二十七年後他是羅斯福總統駐印度私人代表。羅斯福夫人對他們加利福尼亞之遊作了愉快的記載，但當「路斯他尼亞」被擊沉的消息傳來，在這愉快的一羣中引起了什麼結果，她却沒有提起。威爾遜

大總統對德國提出了嚴厲的照會，他的國務卿白萊恩認為這照會太富於好戰性而辭職了。很多人以為裘斯夫斯·丹尼爾也會辭職的。丹尼爾反而積極整頓海軍以防萬一。他的助理部長對這種決定當然沒有什麼反對的。

羅斯福夫人說起過她的家庭是如何地被「西沃圖·羅斯福和威爾遜總統和他的行政機構之間不同的見解」所擾亂着。她說「我年青的丈夫」和她的叔父——那時已經五十七歲，但還很年輕似的——「都希望能夠從速作一個決定」。

威爾遜的對德照會，並沒有得到德國方面對「路斯他尼亞」號擊沉事件的道歉或任何回答，於是西沃圖·羅斯福撰文說：

「很明顯地，威爾遜總統相信用最卑賤的，中懦怯者們發出的請求——像「呵，好呀，總統使我們免於捲入戰爭！」這一類的話，就能使美國人民永遠忘記死去的人，輕輕忽略了美國的恥辱，作這種請求和辯護的人們顫抖着聲調說他們「站在我們總統後面」。他們真是如此的；很好地站在他的後面。他離身後所依傍的責任和困難越遠，這些人們就更接近他。」

恩斯脫·林德萊說用後備軍艦訓練人民航海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最得意的想法，他

大概和他當時「還是很接近」的西沃圖談過這事的。

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他所有的演說中都呼籲：「我們現在必須大量而且非常繁複地來解決軍火和軍備的問題。」

他非常辛勤的爲海軍工作，突然患了盲腸炎。羅斯福夫人當時已漸漸能獨立經營一切，不再以「帶一小隊人馬」來回於華盛頓，海德公園和坎普貝羅之間爲苦事了，她在島上接到了電報，在火車上聽見有個侍者喊她。那是從路易士·霍威來的電報，報告她入院進行割治十分順利，但是羅斯福夫人當時並不感激霍威，因爲她最恨在許多乘客中使大家注意集中在她身上。她當時還經不起自以爲了不起那種心緒的襲擊。

在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中，羅斯福因感冒喉病很嚴重，不得不請假半月在大西洋城休息，他母親安排好在那兒和他見面。祇有一星期他又回華盛頓辦公去了。當時總統在會中提出要求通過的海軍預算，是美國史上空前的最大數目。羅斯福要辦的事太多了。

一九一六年三月，羅斯福最小的男孩子在華盛頓出世了，但直到初夏舉家遷到海德公園去時才爲他取名。現在一共有五個孩子了——安娜，十歲，詹姆士，九歲，伊立奧

特，五歲，小富蘭克林·台爾阿諾，兩歲，約翰，阿斯賓華爾，從海德公園，羅斯福夫人帶他們到坎普貝羅去，一直住到十月初，她丈夫才來接他們走，羅斯福夫人說那年秋天回華盛頓時，她覺得一切非常嚴重緊張，使她眼界突然爲之開擴。她不再像以前那樣完全以她自己的家庭作中心了。她眼看自己的丈夫在日漸沉重的責任之下成長着。那年夏天，他的上司專注於大總統競選，因此他實際上幾乎以全部時間在處理代理海軍部長的工作。

我們相信如果一九一二年西沃圖·羅斯福被選爲總統，美國可能在一九一四——五年冬季就參戰，而戰爭將相當地縮短了，但這始終是個「如果」的假設。寫歷史的人不會討論一個沒完成的假設事件的。他如果不受一件事實的阻抑，儘可以自由地作各種想像，戰爭的縮短不是惟一可能的結論。如果西沃圖·羅斯福在一九一二年當選大總統，而且如果他使美國在一九一四——一五年冬天參戰，他的國內大眾對被捲入戰爭中而引起的忿恨當能引起嚴重的結果。看來西沃圖·羅斯福自己也明白這一點，因爲在一九一六年夏天共和黨候選人競選會在芝加哥舉行時，他祇得了九十票，而最高法院的霍夫士法官竟得了九百票。如果他相信他有使全國一致擁護美國參戰的能力，他一定會使前進

派推他爲總統候選人，再度發動單獨競選的。霍夫士在共和黨中對外向主和平，正如威爾遜不是一個好戰的民主黨人一樣。這次競選非常激烈，威爾遜所以能戰勝霍夫士，全靠西部和中西部若干區的擁護，他們總以爲威爾遜比霍夫士（西沃圖·羅斯福的軍事支助頗使他棘手）更能使他們不致捲入戰爭之中。威爾遜失去了一半的德籍美人的投票，因爲他對德國採取仇視態度，同時他失去了全部愛爾蘭籍人的投票，因爲他們相信他會親英的。

烏德羅·威爾遜是以一種矯正錯誤的精神來使他那偉大的國家參戰的。美國人民大多相信他們是爲保護世界民主而作戰的，正如英國人民堅信他們作戰是爲要使德國明白弱小國家的權利不是隨使地可以踐害的。如果世界仍然留在虛僞境地中，英國，法國，義大利和美國應該分担這種過咎的，但是他們所保全的虛僞，究竟比被阻抑的自大國家所支持的血污的惟我主義好些。也許我們以爲凡爾賽條約給予德國的待遇，正如十八世紀中給瘋人們的待遇一樣，不是治療，而是懲罰；但這種說法正有利於一位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而不是美國總統）發給一個瘋人一張安全證明書，把他趕出瘋人院去。

烏德羅·威爾遜被作了歷史上的一隻贖罪之羊。也許在目前的現代戰爭之後，世界

的優秀感覺已經失去，而不得不轉向一個不斷尋求理想的解決的人身上，而在他的名譽的尸骨上，又開起一度萎枯的，作爲人道的新春象徵的萎糜的花朵。人們罵威爾遜是個空談，虛榮，不幽默，固執，善妒的汗儒。也許他是這樣的，但是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末的一個黎明晚上，激動地召請一個朋友來問他戰爭是否會有轉變，像這樣的人當時已經很清楚地看到戰爭會把什麼帶給他的國家的。它將結束影響很大的不偏的意見；沒有這種意見，這一戰爭的勝利者怎樣能以他們的勝利來保衛世界不再有戰爭，怎樣會不因勝利的機會來迅速奪取利潤呢。威爾遜也深恐戰爭的破壞力量將影響到美國人民在國內的自由。它燃起的經濟病痛將不斷地干擾個人的生活。於是他又回顧自己。他預知似地見到一個短暫的諂媚時期，那時人民沉緬於誇大的宣傳中所述的戰爭將帶來的較好的世界，而在人民對這種希望的憧憬被粉碎時，他看到人民一定會輕視他的。

「他低吟道：如果有什麼變化，爲了上帝，讓我們參於這種變化吧。」

但是威爾遜沒能看出什麼變化，他就在半信半疑的情緒下要求國會決定要不要對德國宣戰。

攻擊威爾遜最方的是天主教徒，筆者想提醒天主教徒一句話，他們用以責備威爾遜

對戰爭態度的話，正是清教徒用以責備教皇貝尼迪克十五世對戰爭的態度的話，而且威爾遜乃是莊重宣稱在歐洲地圖上，必須恢復一個「統一，獨立，自主的波蘭」的第一位政治家。這話是他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距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前大約十五日在參議院演說中所提到的。在今日看來，說威爾遜不是一個能把理想帶給全世界的大人物，簡直是無賴之談了。然而他的理想，對一位智力堅強的青年，一位一心注意許多實際工作的青年確是很有影響的。如果，像他的贊仰者們所期望的那樣，羅斯福大總統能完成威爾遜所沒能完成的事業，他一定會承認他曾從那位前驅者那兒得到一切，至少從他的錯誤中得知所趨。那時，歷史將不再以烏德羅·威爾遜為犧牲之羊，而要把他安入牧人的行伍中去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日美國對德斷絕外交關係時，羅斯福正騎着馬在海地島上檢閱美國海軍陸戰隊。他奉電搭附近港口的一艘驅逐艦回任。回到華盛頓，他立刻如他夫人所說「埋頭緊張工作」。他非常困難地爲他夫人取得一個坐位去聽總統在四月六日對國會宣佈的正式宣戰詞：

「引導這偉大和平的人民進入戰爭，進入最可怖，最有毀壞性的戰爭中去，造

是很可怕的事，文明本身都在受權衡了。但是正義比和平更可貴，我們要為我們最貼心的東西——爲了民主，爲了能在自己的政府中說話的權利，爲了弱小國家的權利和自由，爲了要把和平安全帶給一切民族，而使世界永遠自由的自由人民們能獲得正義統治一切的地步——而作戰。我們爲了這一任務，驕傲地得知了美國爲了她所寶貴，給予她生命和愉快，和平的種種原則而必須流血出力的時日來了的時候，願意貢獻出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幸福，貢獻出我們的一切一切。上帝幫助她，她沒有別的路可走。」

羅斯福夫人屏息地聽完這些話，回利他們在R街二一三一號的新居去，安娜和詹姆士正在屋後花園中玩球，「對突然的變故還不大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羅斯福在海軍部中工作着，紐約評論報的拉爾夫，勃洛克記述他當時的神情說：

「他板着臉，非常堅毅，很有自信的表情。高高的前額上隱約有幾條縐紋。深藍的雙眼藏在光的陰影中。堅毅的薄嘴很快地開了，明朗放縱地笑着。他聲音洪亮，說話不含混一點……他年輕，是個精力充沛，有肯定見解，有一定目標，對人可以慷慨仁慈，對自己的信仰不肯放鬆一點的青年……他不睜眼，但並不顯揚，但是

他顯然非常有能力，甚至使你奇怪爲什麼在機會均等的民主之下，竟仍使他在目前處於附屬的地位中……」

在大西洋彼岸，勞合·喬治正在這樣地想邱吉爾，他想是在要探探人民的輿論，從戰場中把邱吉爾召回來任軍火部長。那年秋天，他決定做「他很久以來就希望做的事」了。

第七章

宣戰後不到幾天，羅斯福奉召見總統。他在白宮辦公室中見到總統和陸軍參謀總長史高德少將。總統莊重而輕俏地對他說：「部長先生，我非常抱歉，但是你把供應品的市場壟斷了。你該和陸軍方面均分一下呀。」

在戰爭以來，羅斯福盡力工作，為美國海軍裝配一切必須有的物資，使它不致有所缺乏，這種情形寫起來很費紙張。他像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中那些發展北美大陸上的商業潛在力的大財政家們一樣，以非常努力取利的精神來辦理這件事。那時日後在租借法案中出現的羅斯福，已經在不顧一切傳統的障礙，拚命工作着了。

事實上他得到了他上司的允可派一位海軍武官到瑞士去，因為祇有這樣，他才能獲得他所要的一座引擎；但是國務院對海軍方面的事務非常含糊，一直都沒有注意這件小事，到後來，他請求邀請瑞士政府派一艘瑞士戰艦來參加舊金山博覽會的典禮。由於路易斯·霍威獲取特殊情報的能力，他確知智利政府保有它儲用的硝酸鈉，他決定以公平

的代價購進二萬噸以供海軍彈藥工廠之用。海軍方面特別需用這種性質的原料，情形非常迫切，但是夠得上標準的鈉都被一家要高價才肯出售的廠家囤積住了。羅斯福認為智利政府自己積存的鈉質地一定很好，他就利用這個機會了。因為和一國政府談這種事情，必須由國務院來出面，而羅斯福擔心外交上交往的迂緩，派路易斯·霍威作他私人的代表和商業屬員，直接和智利政府辦交涉。霍威到智利大使館去為美國政府定購二萬噸硝酸鈉。智利大使對這種專門的要求有一點担愁，他們竟知道得那樣的準確。霍威叫他不用担愁，美國政府絕對信任智利政府。美國政府所要的就不過是智利政府自認為很好的鈉罷了。美國海軍專家們聽說羅斯福有這種舉動時，開始担心，怕來貨品質不佳；但是當它們運到諾福克時，却被認為是從沒有運入美國過的，最佳的鈉。無疑的，這批貨色使很多德國軍隊消影滅蹟了。

像這類例子很多，足以證明當時時間非常重要時，羅斯福常願個人負起責任來爭取時間。當對德外交關係破裂，在國會尚未通過這項用度之前數週，他已經命令用八百萬鎊購備大砲，軍火，深水炸彈和其它武器。他勸服了商人們自動擔負起重大工作，並且甚至政府在還沒有在合同上簽署之前，使他們執行合同上的工作。他非但願以自己的事業

冒險，並且能勸別人以資財來冒險。

徵發又一度引起糾紛。一九一七年時，祇有很少的老年人們還約略記起林肯怎樣獨斷地來實行這件事，而徵發在他們看來總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新政。羅斯福竟像克勞地·多伐爾在大路上攔劫似地，非常不客氣地執行着這件事。他和路易士·霍威從菲拉台爾菲亞火車上徵發了一部發電機送到製造驅逐艦的一家工廠中，原來定用這部發電機的紐約一家旅館，因此遲了三個月不能開門；但是旅館方面的人對此舉很表愉快。羅斯福有使愛國主義中所需的這些令人不快的犧牲，變成了一種友誼的高爾夫球戲的工夫。一九一七年二月，這位助理海長對代表造船利潤的人們呼籲，要他們組織一個有七百五十艘艦隻的海防軍力。造船主們不想和他玩這個高爾夫球戲。因此，他在四月中，煽動了國會，允許授權徵發所有遊艇及小汽艇。

「適於供作防海巡弋用的船隻的主人們，如果不能得到一隻新船的價錢加上兩年所得稅數，再加上可觀的利潤數字的代價，絕對不願把他們的船隻買給海軍部的。國家必須徵用這些船隻，但是我們不能實行劫奪。」

五月中，國會授權允許徵發。羅斯福爲了立榜樣計，出售了他自己的五十二呎帆船

半月號。凡是有好船有好馬的人，要他們割愛是很不容易的。羅斯福夫人失去了半月號，有如失去了愛子：小半月號是她丈夫娛樂之艇，它上面滿裝了他們愉快的回憶。

除了積極武裝海軍備戰外，羅斯福自己無時不在盼望能夠穿起武裝來。西沃圖·羅斯福當官戰後立刻到華盛頓向總統提出請求，要由他組領一師人到前綫去。他和他的長女尼古拉斯·郎華斯夫人住在一起，富蘭克林和伊麗諾都去看他。正如羅斯福夫人所說那樣，他對他們總是很仁慈的，但是他那時一心專注在他積極參加戰役的希望上，對威爾遜的冷淡態度很為掃興。最後，大總統駁下了西沃圖·羅斯福的呈請。按渣與將軍（General Pershing）和陸軍部的意見，認為組織一支傑出的師團來號招衆人，把其它師團中所需的優良軍官完全搜羅去，這不是一個聰明的辦法。上校對這個拒絕始終記在心頭，而這一拒絕實際上也是一個錯誤，因為在一九一七年早秋時分，如果西沃圖·羅斯福率領這師人在法國登陸，對士氣確是極大的鼓勵。西沃圖又回到沙迦摩去過他退休生活，削尖了筆來批評行政當局。

一九一七年六月，陸軍部長牛頓·信格發表談話，它正似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許多英國政治家所常說的話一樣：

「我們參入此次戰爭時，和我們的敵人不同，我們一無準備，非常擔心，毫無防備，並沒有料到它的來臨。我們習於和平，毫沒一點準備。」

而在十月中，他宣佈說：「我們很完善地走向戰場去。」

西沃圖·羅斯福爆發了。

「爲了和這種軍事行動求比較之故，」他寫道：「我們必須回到遠古的時日中去。美國在戰爭中應該以二十世紀的標準速度進行；一個人不該自滿，更不該自傲於紀元前七世紀時的標準。」

西沃圖的四個兒子和他的女婿，李嘉圖·杜巴博士都到前綫去了。小西沃圖成了中校，卡密特和亞契貝爾特成了上尉，最小的奎恩丁成了空軍中的中尉，後來在戰鬥中殉國。奎恩丁入伍時，伊麗諾的兄弟，那時在通用電氣公司中作事的霍爾·羅斯福也和他一起入伍。爲了他要脫離的是軍火生產事業部門，因此按規定他祇能加入空軍。他們兩人都相當近視，因此羅斯福夫人想他們在驗眼前，一定先把驗眼表上的符號全盤記住了的。

霍爾·羅斯福在七月中被召赴伊沙卡空軍學校中去時，他的祖母，霍爾夫人以爲他沒有離開妻和幼子們的理由。那位老太太問羅斯福夫人說他爲什麼不買個人頂替呢。羅

斯福夫人說她從沒聽說過頂替這種事。「她那雙老眼驚訝地望着我，她說：「在內戰時代很多紳士們都買人頂替。這是該做的事呀。」」

羅斯福夫人生氣地回答說一位紳士和其它美國公民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而且要別人爲自己冒生命之險，這是非常可恥的事情。據她說。這乃是她第一次到她生長於斯的环境中，所認爲合理的水準作的口頭抗議；她認爲她的觀點的改變若不是由於她丈夫的影響，就是由於她開始想到自己的能力之故。一九一七年秋天回到華盛頓「開始熱烈進行真正的工作了，我的工作能，向來多少是被壓抑着的，現在完全安放在工作中了。」

然而，富蘭克林·羅斯福雖然也在積極發展他的工作精力，但他還念念不忘於從軍。他請求調爲海軍現役軍官，但他的請求被拒絕了。他在一八九八年沒有成功的事，現在也沒法成功。想起當年作海軍助理部長的西沃圖·羅斯福比他年齡大，還能脫去便服穿上軍裝去參戰，這事很使他梗梗於心。

種種增加生產的號召，使人們要求將望遠鏡減爲一塊錢一付的舉措，增加訓練營，醫療處等等，都很可以表現出他辦事的能力，但是他還年輕，他並不以爲投向辦公室一切事務中的深水炸彈，比投向敵人潛水艇的炸彈更令人興奮。

幸而有一件事足以略爲安慰他一下，那就是當北海佈魚雷計劃決定後，他有了間接參加這行動的機會，這計劃是大西洋兩岸海軍專家們所反對的。如果在開始時沒有羅斯福熱烈的支持，這一計劃很難實現。

這一偉大事業的價值如何，始終還是一個論爭之點，因爲直到停戰協定快簽訂之前，它才完全完工，因此它在潛水艇戰役中發生的效果如何是無從估計的；但是在那短短的時期中，它充分證明了它的效力而使人認爲保守的海軍專家們的反對，使它的工程因之延緩，這實在令人遺憾。

這時期中，丹默乃·霍爾非常注意着羅斯福在華盛頓的活動。一九一七年，該組織約他作七月四日的演說，他接受了。一九一八年六月查爾斯·毛菲提出以羅斯福爲紐約州長候選人。但是羅斯福却一心在打算穿上作戰的制服，他並不以爲紐約州長的位置就可以代替了制服上的金邊。如果他沒法參加作戰，他以爲他該留在海軍部中辦公。他拒絕了這次的提名，而提請阿爾法萊德·E·史密斯爲民主黨候選人。現在是排除宗教上的分歧而加強黨的統一的時機。

自從在阿爾巴奈發生之辭漢事件，阿爾·史密斯作了毛菲的外交代表，在丹默乃和

那時那羣背叛者們之間諷解那時起，史密斯和羅斯福就成了至交。他是天主教徒，在紐約從卑微困窮中鬥爭出來。他年輕時就一直爲毛菲所推動，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他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五年間任紐約議會議員，且任該議會主席若干年。此後他曾任紐約郡執行長官（Sheriff），又任大紐約市參議會主席。有聲名的律師威廉·邱區·烏斯朋在薛漢之役中是和羅斯福合作的，他現在正和史密斯競爭着；但是羅斯福的擁護，使烏斯朋候選的機會完全消滅了。

史密斯被選爲候選人後，羅斯福寫信給他說道：

「我知道你是被稱爲「最有能力對付這一工作的人」。我該說這話非但千真萬確，而且全州的人民將發現它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以事實爲根據的。我十二分相信你在州長任內非但要表示出你處理州中事務的特出才能，而且還要表示出你爲全州的自由和前進的利益而執行這種事務的決心。」

那年秋天，國會議席選舉在全國舉行，都是對共和黨有利的。一九一二年美國的氣氛是隨和着一九〇六年英國的氣氛的。一九一八年美國的情況又預示出一九二二年英國的情況；它們都是對世界不利的。

但是，阿爾·史密斯並沒有和民主黨共同退却；他正準備擊敗州長却爾斯·S·灰特門而進入一個前進的統治時期，這時期的工作，使他在一九二八年中得到總統候選人的地位。那時他是四十五歲。

如果我們能確知當時羅斯福是以拒任州長為餌以達到參加戰爭的目的，那倒是很有趣的事。不論怎樣，他不久之後就被命渡過大西洋去考察並報告美國在歐洲方面海軍和航空的需要情形，並且允許他在完成這一工作之後，可以回到法國，在勃隆克德海軍上將的十四吋大砲鐵道砲隊中任中尉司令官。

七月九日，他受了祕密命令坐了當時新落成、參加護送運兵船的驅逐艦「台雅」號出發了。她妻子說她的婆婆不能送他上船，心中很難過，『因為他是她生存的中心』。但是，詹姆斯·羅斯福夫人正在照顧在海德公園中的孫兒女們，而富蘭克林·羅斯福夫人又得回到華盛頓的炎熱空氣中，每天在軍人餐室中服務十六到十七個小時。

羅斯福自己在那艘驅逐艦上過得很好，他始終是個很好的通訊員：

七月十一日

雖然有了食具架，我們還是沒法吃東西——我們得緊張地坐在欄干間，一手捧

碟子，一手抓東西吃。三位軍官很不舒服，但是我却很好——正在作着記錄。

七月十三日

在操練大砲時，一位初出茅廬的青年人拉着船首大砲的拉繩，這砲是瞄準着很遠很遠的地方的。麥克考萊和我正站在砲邊的艦橋上，當我們頭後面轟然一聲，一顆四吋的砲彈在離我們不到幾呎的地方飛了過去，我們想這一下完了。包梯德上尉覺得很不安。

七月十四日

告訴安娜和詹姆斯們在地圖上找找這些阿佐斯等地名。

七月十九日

在比斯開灣外：這是我第二次赤腳穿睡衣走到艦橋上去的時候。我下來時對包梯特道歉，但是他說祇要海軍助理部長不打算換上舊式長睡衣和氈拖鞋，赤腳着睡

裝倒是很好的制服。

如果你想起什麼媽媽或孩子們要的小東西，請你寫信告訴我。我也願爲你辦這件事，但是我怕你會要我帶桌布或者羽毛拂塵的。如果你能想起什麼，我在倫敦或巴黎也許可以替你找到的。

替我吻吻孩子們，告訴他們說我艙中還有着他們的照片。我時常想起你們。世界太平之後我們一定得到這兒來，但是雖然我非常喜歡這種生活，我却不希望你們也坐驅逐艦來。

在比斯開灣中寫的這封信所表現出這位人物的性格，是任何傳記家要耗費十幾章文字才能分析清楚的。

那年夏天，羅斯福在英國和法國會見各色人物，觀光種種事物，過得非常好。他和巴爾福同餐，他問義大利在大蘭多停泊了一年多的艦隊會不會出來。他告訴米爾納說德國人在三月中的攻擊使美國全國人士非常激動。他會見了勞合·喬治，對他的偉大活力

的印象很深刻。他和埃立克·吉地斯爵士一起渡過愛爾蘭海，看到爵士暈船而他自己並沒有什麼不舒服，心裏很高興。他還謁見過英皇喬治五世——他當時和羅斯福一樣，因為不能直接參加海軍戰爭而很為遺憾。

然後他到法國去和普因加，克里孟梭，和其它部長們討論海軍戰爭中的情形。他特別地去拜見福煦討論到十四吋海軍砲的問題。陸軍方面說它們不能用作移動的砲隊。羅斯福說它們一定可以的。最後，它們被裝配好了送到法國去，羅斯福就因為這些大砲而想參加戰爭。他到前綫去和戴高德將軍同餐。

訪問法國之後，羅斯福抱着非常的樂觀到羅馬去，打算勸義大利政府派艦隊出來作戰。美國人們正在計劃遠征以遮斷伸入巴爾幹的沿海鐵路線。美國海軍已經準備進行登陸。要勸義大利艦隊出海來，是羅斯福所難以辦到的：那時義大利的海軍如果祇能享用義大利陸戰隊今日所得到的計口分糧，他們一定會餓死的。

從法國回來之後，羅斯福巡視了不少基地，巡視了英國和比利時前綫，然後回到英國，他在那兒巡視了不少一百呎的潛艇驅逐艇的基站，他認為這種功勞該歸諸專家們的。他還檢閱了『大艦隊』，在英伐戈奪看北海砲戰演習。後者的成功給予他很深的印象。

，他打電報給華盛頓要他們在奧蘭多海峽裏面也建立起同樣的砲火網。它們也許要沿亞得里亞海逐岸地伸展開去：義大利艦隊不須要自由的通路。

九月中，羅斯福上了在白里斯德的「立維丹」號。他和同艦很多乘客和水手們都害了流行性感冒，他的病演變成了兩肺炎。他到紐約時，救護車把他送到他母親的屋子裏。到十月中旬，他又去辦公了，到月底，他寫完了報告，正打算着起中尉司令官的制服到十四吋砲隊中去。那時消息傳來，說德國人願意商討和平條件了。

流行性感冒傳到華盛頓了。羅斯福又傳染了它，他的五個孩子還有三個用人也染上了。羅斯福夫人和她的廚司除了每天忙着照料病人們之外，還要送食品到她支持着的一個紅十字會去。她覺得「家庭中這許多緊急事件倒是很好的訓練」，而且逐漸地知道了「凡是一個人要做的事往往是能做的事」。羅斯福夫人從心神不定進步而爲心平氣靜的成功，正和她丈夫由州上議員進展而任大總統一樣的令人側目，無疑的，那怕現在，她都會否認她自己有着那種使她出人頭地的心平氣靜的氣質。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日，羅斯福家人們乘喬治·華盛頓號到歐洲去。助理海軍部長被派出去盡可能地售出美國海軍在海外囤積的物資和工廠。他們出航四日後聽到了西沃圖

·羅斯福逝世的消息。西沃圖在停戰日那天，因為害發急性風濕麻痺症被送進醫院去，聖誕節那天似乎有點起色，但祇允回到沙迦摩爾去過節，他心中很高興。一月五日，他看了一遍關於野鷄的書籍，寫了一篇給美國國防會開會的文字。十一點鐘，他上床對他的用人說：『請你熄燈吧』，這就是他有力的聲音所吐出的最後的語言。

「死神請他睡眠了」，副總統馬歇爾說：『因為如果羅斯福醒着，就會同它發生鬥爭的。』

他那時才六十一歲，祇比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非州進行西沃圖做夢都沒有想到的大事時的年紀稍大一點。他之所以不支持凡爾賽和約和國際聯盟的原因也許是因為他對威爾遜的行政當局不滿，不信任，而且如果不經過一番激烈鬥爭，他絕不會讓華倫·甘末萊·哈定作一九二〇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如果，如果，如果……這種種假設祇會使偉大的精神被混擾不清，造成錯誤的看法。命運已經召回了一個羅斯福而注意了另一位羅斯福了。

近和平會議時，富蘭克林和伊麗諾·羅斯福到了巴黎。烏德羅·威爾遜剛週遊各盟國回來。各國的人民們都滿懷着希望慶祝着。他們並沒有發見會議桌的一邊坐着的一位

是老虎式的法國人，他手套中的尖爪並沒有顯露出來，他想清算五十年來的仇恨；他們更沒有發見在大洋的那一邊有着一羣上議員們正決定了威爾遜忽視了他們在憲法上的權利的過失，他們沒有想到這種忿慨將使世界遭受什麼樣的損失。

羅斯福很幹練地辦着他到法國來辦理的事情。這些工作中的成就，包括了收入二千二百萬法郎把美國海軍在包都克斯附近建立的大拉飛無線電台出賣給法國政府之舉在內。其間也包括和羅斯福夫人回到前綫去觀光之行。羅斯福常常把工作和愉快混在一起，在這次，因為事實上婦女不能到前綫去觀光，他更可以盡興快樂一番了。

二月十六日，羅斯福夫婦乘喬治，華盛頓號從勃立斯特到波士頓。威爾遜總統和夫人也在這船上。威爾遜不善於把工作和愉快合在一起。他成天坐在船中的桌子邊草擬國際聯盟的第一草案。他被請去看幾次空賽，但是他推說自己不愛拳鬥，而且沒有時間去看比賽。最後，經過了絕大困難，他被請去看船員們演出的戲劇。有一個穿紅裙紅襪的歌唱者，在總統走過他身邊時，抿着嘴笑着。這使他受不了。但是，總統回艙之後立刻吩咐千萬不能處罰那個人。威爾遜總統在這種情形下作出錯誤的行動和語言來激動人民的能力，是由於他教授式的氣質養成的。而羅斯福在合適的地方作合適的言行那種非

凡之才，却是犧牲了學者氣息而假政治作用來激動人民的。威爾遜的敵人們說他是個老實的笨人，羅斯福的仇敵們說他是個不老實的無賴，而且很蠢。

在航行中，威爾遜常常召羅斯福去討論國際聯盟的事情。這位青年人當時一定已經感到人間事務的繁複。人們說國際聯盟失敗了，因此說威爾遜是個空想家。如果康士坦丁大帝沒有用帝王的權力來支持基督教之前，我們說基督教失敗了，這實在是欠缺理知的。但是不論如何，我們在這兒還祇能攪攪湯，因為美國拒絕和世界上其它的人同坐下來進餐，而其它來賓們都相信英國和法國在上每一道菜時總想先分一份，而且，更壞的是他們還不肯供給一點原料來給幫他們製造食物的人們另外製造可吃的東西。威爾遜在就任大總統前祇有兩年真正的政治經驗：羅斯福却有二十二年的經驗。而且，這兩個人根本性質上也不相同。可是，羅斯福現在正坐在威爾遜的辦公桌上，如果他繼承前人事業得到成功，那麼威爾遜昔日所寫的東西，在歷史上必定會重放光采的。

當筆者寫到這裏時，適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正在大西洋彼岸，在威爾遜生辰紀念會席上發表廣播演說，要他的國人和世界人士明白威爾遜是對的，他們却錯了；他說在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的和平，必須是一切國家

自由，平等，安全，統一的和平；同時他保證他自己的強大祖國在建立並維持這種和平時，要成爲積極活動的一員。

一九一九年二月，當那艘喬治·華盛頓號泊在波士頓碼頭時，一切似乎都很有希望。排列在街邊的人衆們，狂熱地用玫瑰向威爾遜拋擲着。在行列中排在第五輛的汽車中坐着羅斯福夫婦，他們可以望見大總統在歡呼聲中頻頻起立揮手作答的情形。

麻省州長卡爾文·柯立芝請總統和夫人午餐，但是他們因爲下午要在機械大禮堂中演說，不打算參於任何社交集會，於是柯立芝最後約了羅斯福夫婦。羅斯福夫人第一次經驗到卡爾文，柯立芝沉默寡言的脾氣，以爲這是他沒請到威爾遜夫人心中不快的原故。聽衆們聽了威爾遜關於國際聯盟的演說，非常激動，那確是很好的見地。卡爾文·柯立芝都說「人民一定會支持大總統的」。聽見這種說法，我們覺得可以作爲原宥威爾遜錯佔了公共輿論的藉口了。

到華盛頓的每一站上都站滿了歡呼的人羣。這是羅斯福夫人第一次的經驗，她認爲這情形很動人，因爲「似乎人民都了解威爾遜的理想。」當允許婦女選舉權的第十九條修正案修正之前，羅斯福夫人頗受她對子們的抑鬱，這似乎是她作爲「一位熱忱的公

民」事業的開始。一九一九年夏天，她祖母霍爾夫人逝世之後，她就堅決地走出了十九世紀的生活而進入了二十世紀生活的緊張局面中去。十月中，她第一次和對婦女工作情形注意的婦女組織發生往還。

當他自己的長官假期缺勤時，羅斯福在華盛頓更親切地見到大總統的一切，當然他也聽說過國會中的緊張局面。三月初，威爾遜又赴法國，此行使國會中領袖們可以自由地造成反對他的情緒。

羅斯福在海軍部的工作還是非常多，但他試作了幾次有關國際聯盟的演說。他顯然懷疑國聯是否能消弭戰爭，但是他聲稱這是各國所要求的一種嘗試，十三年後，他將說「新政」也是一種嘗試。他始終不怕按嘗試——過失——改正的規律來行事，而他這種舉動似乎時常變成了將武器交給對手一樣，而對手們却時常發現這武器對他們自己有害，對他却一無所損。他要人們不去研究孕育國聯組織的各種公文，而要他們讚同那一般的計劃，而且他警告同胞們說如果美國不參加，國際聯盟將成爲一個歐洲協約的新形式。「但是如果我們參加，我相信國聯絕不會提出美國所不贊同的要求的。我這樣相信，因爲我想他們都是有點常識的。」

這種猜測，在他看來，當這次戰爭過去後，不必再來提醒人民的。

經驗過戰時行政工作的人們，沒有不熱烈贊成中央集權的。除了推進美國參加國聯的工作之外，羅斯福更渲染建立聯邦預算制度的必要。他已經發現時間是在變換的，他努力勸同胞們也順時轉變。羅斯福的進展是非常堅定的；他從孩提時代起就一直照這個方向行進。他走了很長的一段路，當美國必須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又想起美國必須參加國際聯盟這件事，他在這條路上走得並不遠，當複雜的聯邦行動使「新政」必須出現的時候，他不想起了聯邦預算制度改良的必要。

一九一〇年上議員競選結束後，包甫凱撥西一位花卉師的兒子，湯麥士，蘭區相信羅斯福所走的路是通向白宮去的。在禁酒的前夜，蘭區買了兩瓶香檳，放在一邊，要等富蘭克林·D·羅斯福任總統候選人時開飲。這兩瓶酒在一九三二年，在芝加哥被打開了，候選人用紙杯喝着，接受慶祝者的祝賀。如果大家都有像蘭區這樣遠大的眼光，我們該有多麼偉大的民主政治呵！

一九一九年七月威爾遜總統回來，國會一致反對他在反映出人類虛榮的鏡宮（Hall of Mirrors）中簽字的條約修正文字。九月中，他赴全國各地演說。那月末了時，他站在公共講台上流下眼淚了，這失敗乃是他的公共生活真正的結束。

第八章

一九二〇年六月，共和黨在芝加哥候選人推舉大會上已經推出沃海奧的華倫·甘末萊·哈定作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他獲得這種資格，正表示了民主（不是民主黨）困乏了，要上床休息的呵欠聲。這位人物接受命名時這樣說：

「當專權主義將一個世界性的實驗的夢想當作一個世界理想解釋的時候，上議院之重新執行它的權威，卻拯救了我們的共和國和它獨立的民族性。共和黨的上議員阻止了以美國獨立的優越和勢力去換取世界政府中惡劣而不平等的地位這種交易。我們的政黨要保持美國國格使它無所偏向，也不可屈服。」

民主黨全國候選大會於六月底舉行於舊金山。羅斯福和從紐約來的三十位州上議員都在那兒，他們決定要選一位堅持威爾遜政策的人作總統候選人。他成功地消滅了單位的規定，而和他同道的代表們因此可以不必依紐約代表團多數來決定自己的選擇了。

在城中，民主黨組織都受威爾遜領導，他們想轉變這種情形，以便在十一月中阻抑共和黨的勢力。

候選大會第一天，康乃克的克特的荷默，史蒂爾，肯明斯(Homer Stille Cummings)在「新政」中任第一任總代理人，當時他是大會的主席，在開會詞中他滔滔地讚美了烏德羅·威爾遜的功績，結束時又出現了一大張這位被打墮的大總統的油畫像。這是很動人的場面，代表團們深深地感動了，舉起他們各州的標記站起來，沿着候選會場遊行。祇有紐約代表團坐着不動。羅斯福走過去問老板毛菲爲什麼不命令紐約加入行動。他回來告訴同道的州代表們說毛菲告訴他，叫他等待信號。全會場中高呼「紐約，起來！」聲音壓倒了歡呼之聲。羅斯福瞧着毛菲，等待信號。紐約代表們沒有站起來。「起來，紐約！起來，紐約！」其它代表團有點忿怒了。丹默乃的一位大代表傑里米阿·馬霍奈緊抓着州的標旗坐着。羅斯福跑過去用力推擊那標旗，把馬霍奈推倒在走廊中。州代表們幫助羅斯福，丹默乃的人們幫助馬霍奈，但是羅斯福奪得了標旗，竟自率領了三十名代表加到了行列之中去。

最後，沃海奧的州長詹姆士·M·考克斯(James M. Cox)被推爲候選人。考克

斯既不代表威爾遜的政策，也不代表威爾遜的政府，作爲對威爾遜擁護者們讓步的表示，副總統候選人就由他們選擇。這選擇落在羅斯福身上。

裘斯夫斯·丹尼斯打電報給羅斯福夫人，報告羅斯福被推爲副總統候選人的情形：

「富蘭克林今天被一致熱烈地推爲副總統候選人當時的情形，你見了一定會高興的。請接受我的祝賀。我不知道他母親的地址，請代爲轉致祝賀之意。」

這是海軍部長對他七年前選擇的助理部長那種眼光的自許。這電報對這兩位人物都添了不少光榮。

考克斯州長和羅斯福回到華盛頓去見遭打擊的大總統。考克斯從來沒有見過他。兩位候選人共同商量競選事宜。考克斯不公然支持國際聯盟；羅斯福一直爲它辯護。這已經是從乾枯的根上生長的民主黨的最弱的一枝。它是不是應該完全裁去呢？在白宮南面一間屋子中，烏德羅·威爾遜披了一件外套，坐在有輪子的坐椅中，這是一個痛苦的會見。當兩位客人離去時，考克斯很謙恭地說：「總統先生，我對您的爲國際聯盟而作的鬥爭，衷心十分佩服。」

這話的效果很大。那雙灰暗的眼睛又閃亮着生命之光。低下去的頭又沉重地抬了起

來。

「考克斯先生，這鬥爭還可以取勝的，」那聲音這樣迴響着。

考克斯雙眼滿是淚水。當他和他的同伴走出白宮時，他們相互望着。

「羅斯福，我們要為國際聯盟鬥爭。」

看來總統競選的失敗，並不是突然有這種決定轉變的結果。民主黨在那次競選前沒有作過一次演說時，已經被擊敗了。而那年夏天，華盛頓一位人物的陰影所激發起的決心，對未來人類的命運却有着重大的關係。如果一九二〇年羅斯福動搖而將國聯之爭棄置一邊，他也許在二十年後，將美國的統治權完全拋棄。一九二〇年的決心也許並不是一九四〇年使他聯任第三任大總統的原因，但是如果他放棄了國際聯盟的見解，就等於承認美國加入戰爭是一種錯誤，也許將因此動搖他對自己的信仰，因而喪失了全國對他的信仰。

羅斯福在海德公園一個大集會中發表他接受候選人的演說。替他作一切安排的，乃是日後作他的財政部長，而當時是他的鄰居的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unior）。羅斯福夫人非常同情地婆婆看到草場上擠滿了那麼許多人時的心境；詹姆斯

·羅斯福夫人却很坦然地在「全國性政治場合」中出現，而且「很完滿地作了一些必須的調度。」

一九二〇年八月九日羅新福對海德公園與會大眾說的話，是他日後時常說的。羅斯福的持續不變的習性是可以驚人的，這主要是因為他對美國的能力有基本的信仰，美國以為祇要它完全了解自己，對世界所負的責任的重大意義，它一定有領導世界的能力。

「我們反對全國生活在昏睡時期中，」他那天這樣說過。

美國婦女有了選舉權，但在最初舉行選舉時，正值一個昏睡時期，這是件不幸之事。從前推搖籃的手，現在來推搖惰性的世界了。而最困難的就是反對婦女有選舉權最力的對手，就是那些認為這種舉止會加強了革命紅手力量的反革命者們。

羅斯福夫人和一般婦女比起來，有着非凡的人格，但是她又具有一般婦女很多習性，因此我們值得注意她對自治權爭取的責任感是如何突然增速的，因為她在政治上所作的事是一般婦女都能做到的。

羅斯福夫人送她的長子詹姆士到格魯頓去——他那時十三歲還差三個月，比他父親進格魯頓時的年紀小兩歲——然後，在九月末，和她丈夫一起出去作競選的四週演說，

遠涉洛拉考圖。在火車中，她是唯一的女性。羅斯福已經作了一次長途旅行，他那種爭取前進者們的投票手段，使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大感困惑。在西部，很多人相信他是西沃圖的兒子，他們以爲小西沃圖·羅斯福上校是出來改變改變外界對他的印象呢。

和新政府中的海軍助理部長相形之下顯得很黯淡的西沃圖·羅斯福，從前在雪立登遇見富蘭克林·D·羅斯福時，曾經說：「富蘭克林·D·羅斯福像個古怪傢伙——他沒有我們家系中的習性。」

伊麗諾那時沒有對這種政治有關的話作什麼回答。但是四年之後，阿爾法萊德·E·史密斯州長競選時，她却說：「當然史密斯會勝利的。共和黨大會全力支持他，他怎麼能不勝利呢？」

在那四週旅行中，她是火車中惟一的女性，她開始了政治上的「緊張教育」。她和她兒子詹姆士一樣進了學校，路易斯·霍威作了校長。很久以來就發現了羅斯福夫人潛在才能的霍威，有意來教育她。他知道她那時還很討厭他，他知道她討厭他和她丈夫日夜地談論各種事情，知道她討厭他們玩牌時的樣子。

霍威有時敲敲她房門，問她願不願意和他討論一段演詞。這使她高興了，不久之後

，她覺得自己已經在談論各種問題了。他解釋新聞人員的任務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使她可以漸漸地以友好態度對他。他告訴她候選人夫人該有的安排，該如何裝作愉快地去歡迎完全陌生的客人，該如何坐在月台上傾耳聽那聽了好多次的演說。他教她如何看新的事情，爲她解釋新的環境的意義。他和羅斯福一樣，常識非常豐富。

一九二〇年副總統競選中還有許多人參加執行工作，他們日後都和白宮取得密切交往。肯塔基的馬文·麥克因泰 (Marvin Macintyre) 是安排車輛和旅行日程的。他比羅斯福大三歲，任海軍部宣傳處特派助理時和羅斯福結識了。浮琪尼亞的史蒂文·歐雷 (Stephen Early) 是合衆社駐海陸軍部的記者，曾經報導了助理部長羅斯福的活動，他是麥克阿瑟將軍的好友，戰爭爆發時到國外去，回來時在後備軍中任少校。在副總統競選中，他是先行的宣傳人。包甫凱攔西的湯麥士·蘭區是收支員。在紐約總部中還有瑪格麗·雷·漢德小姐，競選完畢後羅斯福夫人曾約她到海德公園中住了幾星期，清理一切信件。這幾星期一直就展延了好多年，因爲她任了維斯福的私人祕書。

競選結束，正如意料中地大爲失敗，羅斯福送了隨從人員中的男子們每人一付金袖扣，袖扣一粒上刻着收受人的縮寫姓名，另一粒上刻着：F·D·R·字樣。這就是「

袖扣會』(Cuff-link Club)的起源，它表示了對羅斯福個人以及互相之間的忠誠。它日後被名爲『白宮黨』(White House Gang)。

這次競選中，羅斯福作了一千多次的演說，走遍了以前沒有任何候選人走過的那樣長的路途。考克斯州長和羅斯福沒有因爲要多得選票而放棄國際聯盟的信仰，而且羅斯福的演說，和他以後年月中所作各次演說，全沒有一點互相矛盾的地方。

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那時是反着羣衆情緒而行的；現在他們都是跑在公共輿論之前的人物。羅斯福一直爲要走上這一條路而鬥爭着。他沒有離遠了一步。他一點不含糊。他在大風中駕起扁舟，冒着狂風直往前衝。他的船當然被打壞了；但是他爬上了岸，救起了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當時趕上了狂風，他的船會同樣地被打壞，而且他自己也許會沉入海中去的。

選舉結果分曉後，羅斯福打了一個祝電給他勝利的對手卡爾文·柯立芝。

新年開始時，羅斯福積極參加了一個法律事務組織，接受了梵·李爾·勃萊克公司的約請，任該公司紐約辦事處的副主任。他也是哈佛監督人，他開始從事調整紐約童子軍組織的工作，並沒有成功。

羅斯福夫婦帶了兩個最小的孩子在紐約住在詹姆斯·羅斯福夫人的房子裏；他們自己的房子已經租出去了。安娜和伊利奧德由一位導師照顧，留在海德公園中。伊麗諾沒有家務可做，非常的不安，而且對冬天的社交生活，也略感倦意。因此她就從她以前的廚司那邊學習如何烹飪，她每星期替以前的廚司一家人作兩次便餐。她同時在紐約住的四天中，到一個商業學校中去學打字和速記——她週末就和安娜，伊利奧特在海德公園同住。

但是她還要做更多的事情，因此當紐約婦人選舉同盟的主席范德立夫人（Mrs. Vanderlip）約她加入該會担負全國制法工作時，她立刻答應了，不過她預先說明自己雖然在華盛頓有點工作經驗，而且聽見周圍人物們談論過制法的問題，但她對此道純粹外行。范立德夫人答應約一位優良的女律師作她的助手，羅斯福夫人乃以一種「謙卑，自己覺得不配担任這種工作」的情緒開始她的工作。她到底真正對政治發生興趣了。那時，詹姆斯·羅斯福夫人有點不樂了，因為她從沒有見過她媳婦担任這許多不同的職業。於是她又加入詹姆斯·羅斯福夫人所加入的星期一縫紉班，這樣，他們每星期有一定的會面機會了。

一九二一年八月。富蘭克林·D·羅斯福距四十歲還有六個月。他七年來沒有一點休息，在假期中都有很多事要辦。羅斯福夫人和孩子們在坎普貝羅，羅斯福自己在紐約，準備在八月中旬回家去過半個月。

梵·李爾·勃萊克駕了遊艇到紐約來約他同遊。羅斯福說遊艇得將他送到坎普貝羅去。沿海灣上行，天氣很潮濕，羅斯福一直在把着舵。他們釣了一兩天的魚，然後勃萊克駕遊艇離開了坎普貝羅。

羅斯福一家駕起了「維里奧」（一艘在「半月」號賣給政府作戰時用度後所新買的小帆船）。羅斯福希望孩子們在「維里奧」上練習成精練的水手。有一天他們駕船返家時，瞧見陸地上的林中起了大火，羅斯福父子們都有那種精力和社會責任心，他們趕上岸去救火。這次緊張工作後，他們回家去，「一直幾天來說覺得倦怠」的羅斯福，以為在島對面灣內的格蘭·史維恩湖中洗一下就會好的。大孩子也喜歡這種說法，他們一起去洗過澡，跑了兩哩路回到家中。於是，覺得稍稍舒服了一點的羅斯福，決定到芳台灣冰冷的水中去游泳。他跑回家，游泳衣還沒全乾，就坐下來看信件。他立刻覺得混身發冷，晚飯前就上床去了。二十四小時之後，他想起床，發現左腿已經麻痺，溫度很高。

這一家人的朋友貝奈特醫師從魯貝克趕來說這是嚴重的惡寒症。羅斯福夫人把孩子們遣出去參加三天露營。她丈夫在孩子們回來時該痊可了。但是他並沒有好。孩子們回來發見父親的兩腿麻木了。另外請來一位醫師，他因為沒有見過這種的麻痺，拒絕診治。大家心中都在問着這個可怕的問題。這是小兒麻痺症嗎？那時紐約正傳染着這種病症。這可能是小兒麻痺症嗎？這可能是五歲以下兒童才能害的病症嗎？當然，疲乏過度，在大熱天中突然洗冷水澡被認為是誘病之因，但是在醫藥記載中，一位近四十的人害這種病，是很罕有的。最後，羅斯福夫人焦急地伺候她丈夫過了幾天，又從紐堡請了小兒麻痺症專家羅維德醫師來診治。大家所想到的可怕的問題得到一個回答了。這不是惡寒。也不是風濕或骨炎。這正是小兒麻痺症。

有希望治好沒有呢？麻痺症初期可以延展到一個多月。第二期又可以延展一個月。然後，在六個月以後，麻痺逐漸消失，而在身體某部份它會繼續存在。最後是一個漫長期，這時期中症狀不能發作；雖然可以有一點改進，但是收縮和抽搐的情形會日益發展，沒法治癒！這句話，在副總統競選失敗後，從報紙上得知民主黨在加入國際聯盟這張上失敗後，世界上將發生的劇化結果的羅斯福頭腦中聽來比芳台的冷水冷得多。一沒

「法治！」這話的意思是說他如果在未來清除世界的工作中要做一點事情，他必須先從事爲自己健康而作最困難的鬥爭，而無論他如何勇敢，無論他如何堅決，無論他如何懷着熱望，他眼前的希望是暗淡的。

世界在腐化了……一九二一年夏天；真有一點腐化的現象了，在戰爭中所犧牲的那麼許多生命、自由、快樂和財富，似乎還不夠給人類一點教訓。美國人民們正選出了一個宣稱要回到「常態」去的大總統，他所謂「常態」，意思無非是說從四年戰爭的恐怖和壓力中恢復元氣後，回到一種足以造成另一個戰爭的狀態中去。烏德羅·威爾遜傷心地漸漸死去，而他見到的那位可能拋棄他的學院氣，承受他的意志的人物，却在開始時就被不能治癒的病症控扼住了。

世界在腐化了……在俄國，無數百萬的人死於飢饉，史大林偉大的聲名祇傳佈在布爾雪維克內部。波蘭和德國正因爲上塞爾西亞問題爭執着；一個奧國的粉刷匠正在那時突然進入瘋狂生活之中，像成千萬德國的人民們那樣把他們的可憐情形，歸罪別人，而以爲自己是很對的。那年夏天，就是和這個小奧國人在一起的人們，在黑森林（Black Forest）中暗殺了歐茲拔格（Hitzberger），歐茲拔格是勸他同胞們接受凡爾賽和約的

一位人物。在義大利，那聲音粗濁，有一對烏黑閃亮的眼睛，下巴突出的本尼多，羅索里尼正在煽動不滿的法西斯蒂起來暴動；但是那時並沒人把他看成時代的不祥之兆。

祇有溫斯頓·邱吉爾在那時已成了舉世知名的人物。一九二一年九月，這位當時任殖民大臣的人物在蘇格蘭發表演說，他認為那時沸騰了全世界的情緒，該由兩方面的和平合作來平抑：要由英法和德國合作以建立歐洲的繁榮，要由美英和日本合作來保持太平洋上的和平。這種非常簡單的話原沒有什麼問題，不過英國在愛爾蘭所採的政策，却使世界其它文明人類們在那幾年中懷疑英國對和平與繁榮的見解中，究竟包含着什麼意思。世界正有點腐敗了……

當然，在邱吉爾，希特勒，史大林，墨索里尼他們一生中有許多絕望的時期，但那種絕望的情形，總沒有富蘭克林·D·羅斯福才四十歲時，那位醫藥專家所給他的證明更使他覺得可怕而絕望的。那位人物竟能克服這種絕望的情緒，這正是保證世界獲得解放的開始。

還有三種事實存在：他的生命危殆；他幾個月之內要感受真正的痛苦；在一九二一年那時的醫藥學問所知的範圍中，像他那樣年紀害了小兒麻痺症，可能的治療祇是一種

意志的力量和另一種超乎常人的忍耐心。任何政治上的前途，在那時看來都變成一種聊以自慰的空想了。

但是這病症在二十年代腐化時期中，祇在若干時期內使他不能發揮積極的政治活動力量。它使他的翩翩外表，溫和性情，豐富收入以及古老家庭得到平衡。它使他的性情深刻化，使他更富於慈悲心。它使他有時間和機會來作更深艱的考慮。它使他在年富力壯時不致浪費精力於物質享受生活中。它迫使他那位對政治真正開始感到興趣的妻子，在丈夫病中不得不繼續密切留意政治，因此使她日後能在命定由他負起的重大工作中給他很大的輔助。它使他在精神，智力甚至身體上都成了更堅強的人，因為麻痺症使其它受影響的肌肉發生了補充的作用。而且，它給予他那種非凡的沉靜，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他面前顯得非常渺小與可笑。

第九章

新行政組織成立後，路易斯·霍威留在華盛頓幾個月，來清理海軍部的供應品過剩問題。辦完這事後，他正打算接受一個良好的貿易任務。當羅斯福病倒時，他留在坎普貝羅，爲羅斯福照料許多私人事務。霍威夫人和她的男孩子也在島上，羅斯福夫人因爲他和她自己的孩子們，感到很「麻煩」。羅維德醫師向她保證說：如果他們要傳染上這種病症，他們早該傳染上了。霍威到那兒看到這種情形時，立刻決心放棄自己的新職業，爲羅斯福未來而努力。前次羅斯福害傷寒時曾經再度被選爲州參議員，這次在麻痺症的掌握中，他還要爲總統競選而努力。在那時看來該是多麼神話性的夢境呵！但是霍威並不聽當時種種批評來認爲他們這種措置是不可能實現的。他所採取的第一步就是竭最大可能阻止一切有關羅斯福害病的消息透露出去：報紙上祇說那是一種惡寒症，那時到歐洲去的詹姆斯·羅斯福夫人也不十分詳細地知道自己兒子的病狀。他們不使她急忙回家，免得外界猜測病況的嚴重情形。

祇有住在小島上的人們才知道要使一個人的行動不爲外界所知道，該是多麼困難的事。在小島對岸大陸中的紐堡特(Newport)人們都知道羅斯福在害病，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不驚動鎮上人們，把病人送到火車站去。最初，從屋子裏到一個臨時担架上，再經過險峻的路，抬下海灘，這真是一段痛苦萬分的路程。然後，還要躺在汽船的底層中，經過兩哩水路到港口。然後，還要用担架抬着走完碼頭上一段長長的路，任上面擠滿的人們觀望。霍威決意避免這種情形，汽船停在港口附近的地方，担架由小路抬到運送行李的路中，看熱鬧的人正在遠處侍候着。這樣，羅斯福上了一節專車中的臥車上，鎮上的人和報館中派來的人還不知道他已經登陸了的消息。

「當世界日報通訊員見到羅斯福先生時，羅斯福先生正在悠閒地吸着烟，告訴通訊員說他的胃口很好。他說自己雖然起不了床，但是却很舒服。」

在紐約，羅斯福先生進了柏立斯巴特里安醫院，喬治·德拉柏醫師替他診治了幾個禮拜。這時必須對外界發表一點報告，德拉柏醫師宣稱：「我不能斷言羅斯福先生什麼時候可以出院，但你們可以堅決相信他不致殘廢。這種病症不致造成永久的殘傷。」

這在很多人看來似乎太樂觀；但是羅斯福夫人和霍威，還有病人自己却堅決相信醫

師的話。九月底，詹姆斯·羅斯福夫人從歐洲回來，她弟弟把這消息告訴她，她認爲富蘭克林出院後應該住在海德公園。他在此地將因恬靜生活而恢復健康，如果他放棄未來積極活動的希望，他可以在此地開始『他早就想寫的書』。

詹姆斯·羅斯福夫人並不讚成她兒子在聖誕節以前回到東六十五街的住所去。他出院後到那兒去時，她以爲是她媳婦要病人住在那兒，好使朋友們可以去看他，她以爲霍威並沒有鼓勵他假裝成可以從事任何工作的樣子。

伊麗諾·羅斯福承認那是她一生中最難過的一個冬天。她是一個護士照顧她丈夫。他的腿上包上了石膏，每天還得割去一點肌肉，這使他非常難受。『他毫無怨言地忍受着，從發病後他一直是忍受着的』。

屋子並不太大，路易斯·霍威在一個星期中至少有五六天佔住一個房間，安娜現在已經十五歲了，她以爲別人對待她不公平，因爲路易斯·霍威佔住了三層樓的一間大房間，而她却住四層樓後面一間小房間。羅斯福夫人住在間壁她婆婆家中一間孩子們的房間裏，要上很高的樓梯，化粧要在她丈夫洗澡間中進行。和她婆婆討論病人的照料事宜最爲困難，因爲老太太總以爲她對她兒子的情形，要比醫生對他的情形熟悉些。伊麗諾·羅

斯福認爲『如果你要醫生治一個病人，你至少得執行他的吩咐。』而家庭中很多人員都認爲他們有批評她治家種種措置的必要，這使東六十五街屋中的日常生活變得很繁複了。

最後，在一九二二年春天一個下午，羅斯福夫人經過了一個冬季的過份疲勞，終於跌倒了。他那時正在讀書給小富蘭克林·台爾阿諾和約翰·阿斯賓華爾聽，她突然啜泣起來。她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哭，又爲什麼沒法抑制自己。伊利奧特從學校中來看了他母親一眼就逃走了。路易斯·霍威想研究她爲什麼哭，但毫無結果。那兩個孩子上床去了，他們的母親坐在沙發中自顧啜泣着。她沒有能下樓去吃飯，最後，她發現她婆婆回到海德公園去了，她自己孤單地留在屋子中一間空房間裏。她鎖上門，用浸透了冷水的毛巾擦過自己的臉，然後聚精會神的鎮靜下來。這是羅斯福夫人一生中惟一的，最感無法抑制自己的一刹那。

羅斯福夫人這樣放縱感情，並不是由於對她丈夫病症有所恐懼，它正表示出她對她未來的焦慮。羅斯福從沒有爲自己的命運而悲傷。他休養時期中，羅斯福夫人祇有一次看見他流露一點沮喪的神情，那是一九二一——二二年冬天之後很久，當『他討論到是否要化相當的金錢來從事某一件工作時，他說他以爲最好還是用錢來使一個無助的人得

到再生的機會」。又有一次，家人提議旅行，他說坐船比坐車對他更舒服些。

范·李爾·勃萊克仍舊爲羅斯福設立着瑪麗爾方面的公司，羅斯福臥病中就由霍威代理。但是霍威並不願意從商。他要使羅斯福回到政治中去。羅斯福夫人對他這種希望却表示懷疑。霍威說她必須使她丈夫對政治的興趣不變，而且勸她也積極從事政治活動。一九二二年，她遇到一位專心於婦女工作條件改進工作的青年婦女瑪麗翁·狄克曼，通過她的關係，羅斯福夫人加入了對政治有非常關切和影響的婦女工會聯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經過狄克曼小姐介紹，她結識了南茜·柯克小姐，後者請她在一次民主黨州選會資金募集宴會中作主席。因此，她第一次在「相當多的人衆」中發表演說。由於和狄克曼小姐及柯克小姐的交情，她結識了不少人，因此和紐約州許多民主黨婦女們交往。她作了多次演說，霍威時常坐在聽衆席中，事後給她一些批評。她往往會沒事而神經質地笑了起來。他學她的笑，學得很像，常常笑給她聽，使她知道這種笑法是很沒有意思的。「他的忠告是：『你有什麼要說的，說出來，然後坐下去。』」

但是除了政治之外，她還訓練自己作其它工作，使自已有利於病中的丈夫……

她學會了開汽車，學會了游泳……

一九二二年夏天，在海德公園，羅斯福已經支着杖走動了。他不斷地勉強作許多事情，藉以增加他的自信力，擴展他的活動範圍；但那時他每試作一件新事，身體總會受一點不快的影響。

那年秋天，伊利奧特到格魯頓去了，全家人回到紐約時，也不須再用看護了，安娜也可以有那間她所喜歡的屋子了。經過青春期中種種困難之後，她和她母親相處得非常好了。羅斯福夫人已經成了婦女民主黨州委員會的財政主席，因而她可以如霍威所希望地參與種種政治交往。選舉時她駕車送人們去投票。她開始在小地方研究黨的政策，覺得它很「健全」。第二年，她在民主黨州選會中担任「半職業化」的工作，協助辦一張油印的「婦女民主新聞」，不時受霍威的指示。日後，這報改用鉛印，羅斯福夫人從他那兒學會了編排，廣告，推銷等知識。一九二二——二三年以及一九二三——二四年冬季，她和在南方養病的丈夫在一起。他們有一隻船，船上可以起居作息，他們駕船在佛洛麗達河中遨遊。她覺得起風時，船中生活有點「可怕」。她以為釣魚對人有很大的作用。一九二四年時，她已經有充分的政治學識，可以綽綽有餘地担任委員會的主席了。從巴爾的摩之後十二年來，她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了。

至於羅斯福自己，這一向都在與健康以及事業掙扎着。一九二二年秋天，他每天到辦公室中去一次。到一九二三年時，他在這個辦公室和他的法律事務所中工作，每天自上午十時半起，一直到下午五時。但是他還是帶着扶杖的。一九二四年七月大熱天中，他參加民主黨全國大會時，還是扶着手杖去的。如果他被病魔壓倒了，民主黨將因日漸退化而有崩毀之虞；當羅斯福爲自己的健康而鬥爭時，他正在計劃如何恢復政黨的健康策略。在這一點上，他的病對他是非常有利的，因爲別人不致懷疑他熱心從事各種行動是爲了個人的動機，除了路易斯·霍威之外，大家都以爲他已經退出政治圈了。羅斯福自己却有機會過七年恬靜生活，在精力充沛揚溢的年代中回憶起他自己豐富的生活經驗，以一個有世界眼光的頭腦來考慮宇宙間的景物。他富於創造力的想像不斷地活躍着，同時他又積儲起大量的精力，活躍的情緒，使他在四十七歲再參與積極政治生活中的時候，生氣勃勃，祇像才滿四十歲的人；奪取了他七年光陰的殘酷命運，似乎又把這七年光陰原封地還給他了。

羅斯福相信民主黨的未來是和前進及自由的意見相一致的，它的未來決定於它是否有和這種意見一致的能力。據他看來，共和黨那種反動的財政政策和腐化的社會政策，

必定會使他們黨中的前進份子日漸和黨疏遠；民主黨應該起來代表全國前進的意見。這在羅斯福看來是很正確的目標。牛廐黨的崩潰正是個好例子，它證明凡是沒經過共和黨或民主黨建立並維持了若干年的政黨，是不可能存在的。

一九二〇年失敗之後，民主黨中間的裂痕已經顯見，如果不加以修繕，這些裂痕會日漸擴大。這個政黨分裂成三部份——南方的農業保守派，東北方面天主教派的工業人口，和西方農業的威爾遜前進份子。這種裂痕不致立刻威脅民主黨，使它完全瓦解，但是民主黨當時的統一祇是一種表面現象，要憑它來在一九二四年總統競選中擊敗共和黨是毫無希望的。那時龐大的共和黨在全國聲勢非常浩大，但它却似一個慣賊，與繳來時就會出去犯一次案的。事實上，哈定總統幕內已經有一位幾乎犯了許多罪事，還有兩位由柯立芝總統保留下來的人，也被迫辭職了。財政上不斷地傾注許多金錢到歐洲去，但是這種從美國民眾手中集來的錢，到歐洲人手中，歐洲並沒有還出一分一文來過。華爾街上的金融波浪日漸擴大，使人們目眩心驚，一切都顯得非常古怪。六月中，在克利夫蘭，共和黨又推柯立芝大總統為候選人，而和他競爭的同伴陶威（Dowe）將軍，却因為作了貸款給德國使德國完全屈服的計劃而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金。

當陶威將軍帶了作爲和平保證的金言到歐洲時，墨索里尼在早幾個月中已經打破了義大利海軍在大戰中保持和平的紀錄，派它們到不設防的科發島去，用砲轟死了一些阿美尼安難民，而在慕尼黑，那位奧國油漆匠正發動了一次反威瑪共和國的武裝暴動，有一張照片中拍出他那時穿了一件雨衣，肚子貼地，爬近維持法律和治安的武裝部隊去時的情形。我們在此不妨引用一九二四年「紀事」上的一段話：

「審判希特勒在慕尼黑舉行……變成了對「種族主義者」或國家社會主義黨的英雄們的表揚……他們採取的表記是卍，這被認爲是「亞里安」的表記，在德國模糊地被認爲是歷史性的合理表記似地，受着很多人的歡迎。它（指國社黨）從事於對一切「國際力量」——妥協派、馬克斯主義者，猶太人，天主教會，資本以及議會組織——進行積極而有力的鬥爭。」

在德國國外，沒有人對這些古怪的納粹十分注意。在美國，人們注意的倒是克·克魯克斯·克蘭（卽三K黨）的各種活動。這一祕密社團從內戰以來，在南部一直很有勢力，它對天主教徒，猶太人，以及尼格魯人宣戰，並且和地方上的唐·裘安（Don Juans）——以及小鎮上的風流寡婦們作對。在南加羅林那州，規定了一條支付恩俸給內戰時曾經作

「忠心奴隸」的尼格魯人，南方各州當時正在重新喚起人民注意，擁護物種天創說，反對達爾文主義。無疑的，如果民主黨勢力雄厚的南方各州中都斤斤計較這些問題，深思的民主黨人一定會擔心他們一黨的前途的。

二月三日烏德羅·威爾遜逝世，那時德國駐美大使爲了怕激起國內國家主義者們的反感，竟沒有掛半旗誌哀，這一點已經可以看到德國的實際情形。舉行殯禮那天，一羣退伍士兵們把星條國旗釘在德國大使館門上，高唱起「花旗歌」。德國國旗降懸在半旗桿上，德國大使倉皇失措地辭職了。

那一個月中，威爾遜的女婿兼他任內的財長W·G·麥卡圖（Macadoo）成了民主黨擁護的總統候選人了。麥卡圖是喬治亞人，從一九二〇年以來一直生活在加利福尼亞；但是他在紐約有不少有錢有勢的朋友，也許可以得到東部若干擁護。三K也擁護他，他也能得到西部前進份子們的票。一九一六年威爾遜再度當選，完全得力於南部和西部

的擁護。

照理說，作爲威爾遜主義前進份子的羅斯福，在一九二〇年時因爲堅持威爾遜主義而在副總統競選中失敗了，他一定會支持麥卡圖的。唯一的，民主黨中另一位可能被推

爲總統候選人的就是紐約州長阿爾法萊德·E·史密斯。史密斯在一九一八年被選爲州長後，成績優越，一九二〇年民主黨總退却時他雖然失敗，但在一九二二年時他已經大有起色了。早在二月中，羅斯福和夫人就表示他們擁護史密斯爲候選人，那年春天，羅斯福夫人在民主黨州選舉會中決議在全國選舉會中担保紐約代表團擁護史密斯。那時他任民主黨婦女委員會主席，對有關婦女的法案作了不少攻擊。我們要解說一九二四年羅斯福支持史密斯的原因，必須摒棄一切私人友誼觀點來探求更深刻的原因。這很明顯的是因爲他那使民主黨再行團結，重新活躍的戰略計劃中有着很遠大深刻的動機。他自己是一位農村中的民主黨員和清教徒，他的支助一位城市中的舊教徒史密斯乃是對南部許多反動傾向的一個答覆，作爲一位前進的民主黨員，他支助一位前進的州長史密斯乃是保證西部自由趨勢可以存在，同時，這一舉又使東部民主黨保守份子們放心，因爲他們以爲史密斯不致不合理地使商業受到糾紛。

羅斯福的支助史密斯，立刻有更進一步的表現。毛菲逝世，史密斯的友人們請羅斯福出任他的競選委員會的主席。霍威決意要羅斯福回到積極政治活動中去的希望得到圓滿報答了。羅斯福接受了這種請求，這一來他使南部和西部人們都發見麥卡圖必須爲競

取候選人而作有力的鬥爭了。

出乎那些祇想用羅斯福來作櫥窗中樣品的史密斯的友人們意料之外，羅斯福要求積極作爲經理人而努力活動。一直到一九三二年，還有人傳說羅斯福當時是被用作樣品的。當然這是因爲他相貌堂堂——麻痺症並沒損壞他的外表。

五月一日，羅斯福接受了競選經理事務。「路易斯非常興奮，很仔細地計劃着每一步驟」，這是羅斯福夫人日後所說的。

最後，史密斯請羅斯福在梅迪生廣場公園中發表競選演說，這是一位競選經理所不常辦的事，但是除了羅斯福之外，似乎沒人能担任這件工作。

全國候選人選舉大會大都是在仲夏時分舉行，那時天氣非常炎熱。一九一二年的熱氣使羅斯福夫人不得不離開巴爾的摩，但是十二年之後，她却忍熱一直留在紐約。

羅斯福扶着拐杖出來發表一篇空前的競選演說，這在當時出席人心中留下了一個不可忘却的印象。作爲一個小書童的詹姆斯，那時才十六歲，在大會中一直在父親身邊。

羅斯福夫人發現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中婦女的舉止並不關重要。「在一切重要會議中，她們總是站在門外等待着。我雖然已經遞進了我的決議，但她們作何考慮却還是個問

投票在炎熱中一天天地進行着，神經一天天地激動着。

「我坐着結毛繩，天熱得難受，我一心希望競選早日結束」，羅斯福夫人說。

有一天，惠爾·羅吉斯在會場中徘徊，他問她是不是在爲要上絞台的犯人結毛繩。

她告訴這位電影諧劇明星說她「正想罵那些使這次大會不能結束的人們」。

公園中擺了一百〇三隻票櫃，競爭在非常熱烈的情形中進行着。羅斯福拄杖走來走去，非常愉快。但是他並沒能使他演說中會這樣描敘的人物充任總統候選人：

「這是位快樂的戰士，他

是武裝人士們所盼望的人。」

最後雙方同意調解。麥卡圖和史密斯的名字都取銷了，在威爾遜任內曾任駐英大使的約翰·W·台維斯被舉爲候選人。

民主黨已經知道卡爾文·柯立芝在一九二九年之前是不會離開白宮的。代表們使紐約區情形更加渙散了。羅斯福統一民主黨的企圖也許沒有成功；但他個人的聲名却更蒸蒸日上了。

世界晚報說：

「富蘭克林·D·羅斯福像是一九二四年民主黨全黨大會的真正英雄。

拂逆的環境，使他不浮沉於爭吵，宗教偏見，個人野心的衝突以及瑣屑的小成見之中。這使他成爲各地代表所尊敬讚仰的領袖……如果不是他臉上浮現的那種含
有勇氣的笑容，羅斯福也許是一位淡漠，悲劇式的人物。」

羅斯福被邀出任紐約州長。他拒絕了。他在不能放下拐杖時，絕不担任公務。可是羅斯福夫人現在却非常重視政治，在秋季中她正熱心爲州競選努力着。顯然地，她不能容忍婦女在全國性的選舉會中那種不關切的情形。

現在，機會（如果我們否認命運的話）使羅斯福表揚出他作爲民主黨未來領袖的其它代表條件來了。早在一九二四年，羅維德醫師已經告訴過他說在溫泉中浴泳可以治好麻痺。那年夏天，紐約銀行家兼慈善家G·E·庇包台告訴羅斯福說他在西喬治亞溫泉區買了一個療養別墅，該處的池水對治麻痺症是很有益的。竭盡種種可能去發現治療方法的羅斯福，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決定去試一試溫泉治療了。他在青山和松林的附近，找到了一座三層用木頭建造的旅館和一些小農舍，還有溫度在八十九度左右的溫泉。他在

這兒住了六個禮拜，這六個禮拜等於他治療三年的工夫。該地沒有冬季旅居設備，因此他回紐約，和巴賽爾·奧孔奴合作辦一個法律事務所。

一九二五年四月，羅斯福重返溫泉，繼續治療，那時全國來此治麻痺症的一共有十個人。上年秋天大西洋州一家報館記者前來訪問羅斯福，打聽總統競選的事，却發現他在游泳，這位記者寫了一篇題作『游向健康』的報導，在很多報紙上刊登出來。羅斯福看見這情形大吃一驚，因為溫泉的設備即使在夏天也無法容納這麼許多人。羅斯福告訴當地醫師以病人在地上和水中該作的種種運動。病人都大有起色，羅斯福決心要使這種溫泉治療方法得到當局的採納。

當時羅斯福還沒有注意到經濟革命的範圍。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他將近五十六歲生辰時，却這樣寫道：

我得非常誠實地承認在二十年代時，我和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們相同，在開始時並沒有看到那一時期的影響，也沒有看到一個永久的經濟制度所必需的巨大的運動。我們知道專賣實踐中許多變化，以及統制少數人掌握中的財富的舉措——這是西沃蘭·羅斯福和烏德羅·威爾遜所努力爭取的變更——已經被

歷延很久了。但我們並沒有真正了解這一問題的深度。

那時幾乎全部的經濟家們都認定了一個理由，認為生產的貨物越多，國家的財富越多。這種輕鬆簡單的原理沒有注意到一九二八年的事實，那時生產增加，失業的人數也增加。

同時，他又這樣寫，「那十年可以說是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冬眠時期——但，也許它是任何恢復及維持民主政治的偉大行動所必須的時期」

他在那時期的生活確和這些話語相一致的。

一九二六年春天，羅斯福把他的溫泉治療法提供給終形治療協會（Orthopedic Association），協會立刻派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去調查研究。報告證實了羅斯福的提議。

於是羅斯福從庇包台中買了溫泉，旅館，農舍和周圍近一千二百英畝的地。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創設喬治亞溫泉基金，開辦不求營利的機構，耗去自己三分之二的資產。「溫泉簡直成了富爾克林第二家庭了」，他母親這樣寫道。他自己建造了一座荷蘭式的農舍，叫它小白宮，「豈不是表示未來的希望」，他母親說，「這完全因為沒有比這更能確當地形容它的詞兒了。」她還說：「正因為他對土地發生興趣，因此他愛好生長在土地

上的房屋。他常打算買這塊或那塊土地，常常計劃建造新房屋或者翻造舊房屋。」

因此，他從事農事是不足奇的，從養豬到種桃，從牧牛到植棉，他都做過。也許這樣化費他不少錢，但是從經驗中他得知了喬治亞區和赫德遜流域之間在農事上的差別，對他未來有很大利益。羅斯福家系中沒有南部的血液；但是溫泉的水非常濃厚，它竟使羅斯福成了喬治亞的寵兒，有一度傳說人們還要推他出任州長，這是北部人士難得的尊敬。在政治上，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間，羅斯福始終努力在說服南部民主黨人們來支助史密斯州長，他雖然未能克復南部堅強的反天主教的成見，但却沒有因為擁護史密斯任大總統而引起別人對他的反感。相反地，他在溫泉方面促進了它的發展（正如促進他自己健康的發展一樣），使許多人並不因為他是全民主黨的標準代表而有所歧視。溫泉非但使他放下了支架改一根手杖走路，非但教他南方困難複雜的農事，非但使他能再度開駛汽車，非但使他能不斷地受到別人的信仰、同情和感激——這有時表現在一些小行動中，據他母親說「常常在大門台階上，很神祕地」擺作一些作為饋贈的蜂蜜或者野草莓——而且還教給他日後他自己要說出來的教訓：

「如果作為個別單獨的人的我們不能認清自己對世界上其餘的人們所負的責任

以及對他們的依賴，我們的文明將無法繼續。因為我們可以說所謂「自給自足」的男女已經像石器時代的人們一樣地絕跡了。沒有其餘的千萬人的幫助，我們將陷於死亡、凍餒的厄運中。」

但是我們不能以為在那二十年代的時日中，羅斯福祇是坐在他那間西望阿拉巴馬州，建立在松嶺坡上的農舍中，含有哲學氣息似地做着傑佛遜式的夢。他除了積極在民主黨中進行調解妥協工作外，更任法律事務工作。他是瑪麗蘭信託公司及美國券務公司紐約辦事處的副理。他是美國建築會主席。是大紐約童子軍主席，集資在蘇立凡郡建立一萬畝地的露營處。他是募集一千萬基金建立紐約聖約翰教堂的全國主席。他是美國集體保險基金紐約支部主席。是他孔尼克州公園委員會主席。他是伐沙學院理事。是威爾遜基金執行委員之一。同時在從事將溫泉建立為治療麻痺病人之永久療養地。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共和黨全國大會在肯薩斯州舉行，赫拔特·胡佛被舉為總統候選人。六月二十二日，民主黨會於羅斯頓選舉候選人。羅斯福到泰克薩斯去為史密斯作競選演說。在梅迪生廣場公園中，他支着拐杖作演說。在羅斯頓，他一手攜手杖，一手扶着次子伊利奧特步進全國大會會堂。他受到極大的注意。出席大會之後他回到溫

泉去，他打算過幾個月以結束他的休養，因為醫師們相信如果他再休養幾個月，一定可以進步到不用手杖也可以步行的。當時在溫泉找冬天住宅還不可能，不過當地情形已經大加改良，當年已經造好了一座室內水池，這是福特夫婦捐助建立的，有了它，冬天也可以作溫泉治療了。

那年九月中，羅斯福在喬治亞作了兩次擁護史密斯競選的演說。他在九月二十六日在阿特蘭達作過演說之後三天，梅爾華基方面來了一個長途電話。那是從西部競選回來的史密斯特地來問他在夏季中願不願接受紐約州長的競選。羅斯福說抱歉得很。他想要在真正治療疾病後再覓進取機會。

史密斯在十月一日回羅乞斯特的辛尼卡旅館時，看到這一通電報：

前接電話，茲更有欲言者，余頗願能參與本年州長之選，蓋深知此舉或能有助於君也，但有二事爲余所深慮者：

第一，君之治紐約州，成績卓著，該區選民自當投票選君任總統，余之競選州長，固不足影響君在紐約所得票數也。

其次，余之醫師等咸信余之健康能否改善，全賴余之避免寒冷氣候，以

及保持冬季中在溫泉之運動。余或能因此於明年冬季不必再用腿架，但如余滯留於阿爾巴奈，即將無法求痊。余今行年方四十六，余深覺爲余家庭及余自身計，必須繼續目前之調養。余因此深致歉疚，表示余不能接受提名競選之盛意，余知君定能曲諒下衷也。

宮蘭克林·D·羅斯福

人們要羅斯福夫人幫忙，但是她不肯出面干涉這件事。這是她丈夫的決定，祇有他才能作這種決定。可是，我們看到那年十月中羅斯福夫人在羅乞斯特一心努力於領導史密斯競選婦女委員會中的工作，可以知道她實在是很希望她丈夫參於這次州長競選的。那時，羅斯福在溫泉第一次不用手杖的支助走了幾步路——這是他七年來第一次不靠一切自己步行的開始。

州中的首領們又舉行會議，提出了很多人作州長候選人，但沒有一個令他們滿意的。他們覺得羅斯福是紐約所需要的人。

史密斯決心在十月二日，星期二那天再作一次嘗試。羅斯福那天正計劃出去舉行野餐。晚上他要到離溫泉最近的曼徹斯特一個集會中去演說。當他正在池中作運動時，旅館中的侍者跑來說史密斯州長從羅乞斯特打電話來了。羅斯福告訴侍者說叫他告訴史密斯

斯說他到外面去野餐了，整天不會回來，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道。

羅斯福野餐回來之後，看到了那一天中來的不少電報，還有幾次電話，他的女兒安娜這時年二十二歲，已經嫁給了寇蒂斯·B·達爾先生，她打電報來說：「請接受此項競選」。她父親打回電去說：「你真該打」，在羅乞斯特，羅斯福夫人深深担心，怕她丈夫的拒絕會使史密斯失敗而令她丈夫引為遺憾，同時也担心即使總統競選勝利，民主黨或許會在八年的成功功績之後，失去了紐約州的治權，因此她允許史密斯和羅斯福交談。他到底又進入政治的掌握中去了。被推舉為副州長候選人的赫拔特·李曼上校，打了一下午又一晚上的電話，在喬治亞各處找羅斯福，都沒有找到他。包甫凱撥西的湯姆·蘭區認為羅斯福夫人應該使她丈夫知道他的拒絕對政黨的影響。政治……政治……

羅斯福那晚上正坐在曼徹斯特學校禮堂的講台上聽當地一位人士在他之前為史密斯競選作的講演。有人來說史密斯州長自己打電話到街角上一家藥店裏來了。禮堂中擠滿了人，羅斯福無法出去。過了半小時之後，送信人又擠進人叢過來說史密斯州長還在電話邊等待着。這時羅斯福自己正在演說中讚揚着在藥店的電話中等他去談話的人。主席俯耳低聲說他不去接話，紐約的電話綫將始終被佔着。羅斯福停下來又講了半小時才下

台到藥店中去。那邊說話的是羅斯福夫人，她沒工夫來問寒暖，因為她已經快要不能趕上到紐約去的火車了，她明天必須到紐約都亨特女子學校去講每週一次的歷史課。天主教徒的富翁約翰·拉斯可那時被史密斯約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他來說話時，綫路不通了。機務員說要把這次電話接到溫泉旅館中去，羅斯福想這一下就解決了，因為通溫泉的電話綫向來很壞。但是當他拿起受話筒的時候，從羅乞斯特打來的電話中，拉斯可的聲音可以聽得很清楚，就像在隔壁談話一樣。羅斯福仍舊堅持主張。除了健康之外，他還有別的許多理由。還有溫泉基金，他必須使它有個辦法。拉斯可說他和他的朋友們會照顧這個基金的，然後史密斯又來說話了。他說紐約州長是個清閑差使。它不致耽誤他的治療。李曼也來說話了。他說如果他當副州長，不論什麼時候，祇要找他，他可以完全代理他處理一切。史密斯又來說話，算使事情轉成對他自己有利了。羅斯福說他很少成功的把握。最後史密斯問羅斯福能不能趕到參加第二天的提名。

羅斯福稍一遲疑，史密斯掛斷了電話。

第二天，羅斯福被提名為州長候選人了。他夫人從報上得知了這個消息。

詹姆斯·羅斯福夫人說：

「小白宮：：倒像在舉行葬禮。滿屋淒涼，賀電迭來，但是農舍中沒有人。最後，我聽人講，羅斯福興高采烈地說：好吧，如果我必須要競選州長，我討厭它也沒什麼用處！」

紐約共和黨的報紙故作兔死狐悲的態度。呼聲論壇報認為這次提名對羅斯福以及紐約州都是不公平的。晚郵報說拖羅斯福出來是一種無情的舉動，它攻擊史密斯說他「爲完成自己的野心，犧牲了友誼。」

黨全國代表大會後，史密斯到阿爾巴奈，在火車中對記者會會議中說：「州長的工作是用腦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是坐在桌子邊完成的。」

十月五日，羅斯福作了一篇公告：

我聽說外間有人努力鼓吹說我被史密斯州長「犧牲」了，來從事對他競選有利的工作，並且說我的友人們應該投票來阻止這種「犧牲」；這使我非常驚奇。

我得在此說明：我並不是被州長硬架出來的，相反地，他完全了解我當初推却之意，他願意放棄自己的意見，因爲他生怕我作候選人不是我自己所願意的。我之被推荐出來，原因是因爲我黨的首領們認爲我常常表示自己對

史密斯州長種種政策的信仰，他們覺得我之爲候選人，是對投票人們表示這些政策必將持續的最好的保證。

我之接受這次提名，因爲我黨首領們和我自己都感到史密斯州長所建立的州政府以及它對人民所作的服務都瀕於危境了。紐約必須保持它在行政效率以及民主政治領導上作各州先驅的光榮。這些重大的事，使人不得不忽視了一己的小小顧慮。我之參加此次競爭，並非爲個人的光榮，而是爲了要執行史密斯州長的種種政策。

我不相信向我個人的友人們呼籲會影響選舉的。如果我要作任何呼籲，它該是：『我非但要友人們選我——如果他們是我的真朋友——我還要他們多拉許多人來投票選我。』

我相信這段話可以使競選開始時所發生的荒謬傳說消除。

那天晚上，他在喬治亞的哥倫布爲史密斯演說。第二天晚上他在沃海奧的克利芙蘭演說。十月十二日他在麻省的波士頓演說。十月十五日他在紐約演說。十月十六日他正式接受提名，十月十七日他在紐約的平漢頓發表第一次的競選演說。事實上這已經是第

七次了——因爲那天他沒有到平漢頓之前已經作了六次演說了。仁慈而同情的敵人們以爲這位病人會受不了的。但是，競選進行中，這位病人却越來越顯得精力充沛。他滔滔地駁斥那些想把宗教編見引入爭論之中的企圖。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羅斯福在楊格斯作的演說是後代子孫們認爲他確是在人類受難時有領導世界才能的人，他說：

「在最後分析下，無論在全國或一州的競選中，最大的爭執是在於反對我的朋友胡佛先生的基本信仰，他以爲一班公民羣衆是無思想及創造能力的。在全國大選中，紐約州的偉大州長正是反對這種信仰所可以實際舉出的活生生的例子。

而在這一州的選舉中，也發生了同樣的爭執點，因爲共和黨在一州中的領導，也是以胡佛先生這種信仰作基礎的。我和民主黨都否認在這一州中投票選舉的男女們是沒有思想和創造能力的。我認爲投票人是有思想，有推動力，有創造力的，我之競選州長，就以這一基本信仰作基礎。」

這是羅斯福對胡佛所著：「美國的個人主義」一書的回答，在那本書裏，胡佛曾說

：「導向進步的行動和事實乃是天賦給個別思想中的，它們並不存在於羣衆思想中的。羣衆祇有感覺，它沒有可以進行計劃的理想。羣衆祇會摧毀，忿恨，它不會創造。個人在羣衆中沒有思想，祇有感覺，這是心理學上最深刻的真理。」

胡佛這種信仰自然可以引伸到希特勒實際用以達到成功的地步，羅斯福的信仰却抑止這種信仰。如果美國失敗，希特勒建立永久世界秩序的狂論將被認為非常正確了。

至於羅斯福個人方面，他對投票人思想能力的信仰在一九二八年並沒有落空。他以二五、五六四的多數票擊敗了共和黨對手阿爾拔特·奧丁格。在另一方面，史密斯以一〇三、四八一票失去了紐約，以六、四二三、六一二票失去了美國。四十八州中共和黨把持了四十州。內戰後，南部五州第一次投票選共和黨人。胡佛可以滿意地相信自己之當選大總統乃是因為羣衆覺得選一位天主教徒是不智之舉。魔鬼將立刻使他的感覺得到較好的判斷。因為經濟難關，距他當選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不過祇有十二個月。

第十章

直到那時爲止，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進展非常簡單，就似舊式戲劇中「善人得善果」那樣的典型。他在格魯頓，在哈佛，作紐約州議員，作海軍助理部長，害麻痺病等時期中爲什麼做這件事或那件事，這一點不必在人類心理動機上覓取原因，因爲物質生活的發展，使幹練的心理學家毫無疑慮地找出了這一問題的原由。一切都可以從個人的美德，從不屈的決心，從非凡的生活力和與它同來的青年氣息，從他歡愉的笑以及反省的耐性，從他的熱情以及堅決的自信心中得到解釋。要解釋希特勒何以能引起別人的信仰，這是很困難的，我們對這問題不得不歸咎於希特勒身邊的親近人物們，因爲希特勒能夠得人信仰，原是根源於這些人們卑下的動機。在另一方面，要了解羅斯福何以會引起別人敬仰，這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我們發現他同樣地會引起別人的忿恨時，不覺爲之驚訝了。

羅斯福努力控制財力量與消除特權勢力，並不足解釋他引起忿恨的全部理由。一

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他發表就職演說時，已經引起了許多仇敵者們的評議，他們說他的獲選爲州長，是一種有計劃的狡滑手段，犧牲前任者來提高他自己的地位。我們如果想起早在一九一八年羅斯福拒絕出任州長，以及一九二四年他再度拒絕出任州長的情形，不難想到一九二八年他的競選是非常容易的。除了腦筋沒被政治上的起伏風波所困乏的人們所想像的一位腿才康復，要繼友人當權的人所自然發生的希望之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年中，羅斯福放棄了他在民主黨會議中所處的顧問地位（他自己對此並不感興趣），這一舉措在他自己看來是不是合宜，還是一個問題。他不能確定預估史密斯能被選任爲總統：這是最樂觀的人都無法預言的。他也許還以爲自己競選州長是不會成功的，不過他以爲如果有一天他進行總統競選，他早期的州長競選失敗對他不致有什麼妨礙的。一九二八年時，霍威是反對羅斯福參加州長競選的，因爲他相信胡佛會得到紐約，羅斯福將在民主黨的瓦解中失敗。他決認爲羅斯福應該作大總統，不過他計劃中規定完成這一點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六年，不是一九三二年。

有人以爲那年十一月中史密斯把紐約州的事務交給他提出來的候選人，要這人來比他自己更完善地執行這一賤役，但是我們不能單純地以爲這是一時的反響。這是一種妬

忌，而當一些渺小，滿懷妬忌的人們用不滿的毒素來滋養它時，這種妬忌似乎逐漸地滋長不已。或者把妬忌放在一邊，我們可以說這位年事較長的人頭腦中，逐漸發現那位青年人的政治信仰和自己相抵觸。環境遷異後的人往往會變得很頑固，史密斯正從貧困變為富有，從東城冷僻地區遷到恩派亞國家大樓的熱鬧區去。這樣一位轉變了的，沉緬於舒適之中的革命紳士，很容易犧牲別人來求達到自己的野心的。那年一月一日在阿爾巴奈議事堂中，這位卸任的州長阻礙了正式舉行中的就職典禮，對比他年輕的後繼人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是有所含蓄的。「富蘭克林，我恭賀你。我希望你能將你聰明的頭腦，用來處理這一州中的各種問題。」

而繼任史密斯州長的羅斯福說以下一段話時也是很有意義的：

「我確認為在積極改良我們的州政府，聰明，有效而光榮地處理州的事務，以及明瞭所謂「紐約州人民」這一主權所希望和需要的一切，在這種功績上看來，本州的長久歷史上，沒有比他更偉大的。」

對這位真正偉大的公僕阿爾法萊德·E·史密斯，我代表我們的公民表示熱誠的祝福。祝他健康，祝上帝在未來的年月中庇護他……

你們選我代這位偉大的州長，在他領導之下，我們通過州的組織，對善意的男女們——由於他們的努力使我們有光明的未來——願意供出，接受，並且協助一切。」

但是羅斯福並不專門注意細微而虛偽的自貶。史密斯是一位偉大的州長。紐約州的人民選他的是代他。他也準備——如果紐約州人民們盡他們的責守——做一位偉大的州長。他這樣表白了自己的態度：

「我們必須認清我們非但該注意我們同州人民的一切，並且要注意州政府本身。你們必須負起普遍的責任，看看在阿爾巴奈有什麼設施沒有辦到，完成了些什麼。你們必須明白在州立法會中所爭論的一切，並且留意州長所提出的案件，由你們自己來判斷它們是否正確。」

無疑的，這位新州長急於推動紐約州人民使用他們的權利，已經在這段話中明白表示出他的決心，他非但要使人民們發展水力發電事業，並且還反對在共和黨勢力下的州立法會底保守作風，嚴格限制私人企業來干涉電力分配問題。

無線電播音日漸普遍了，羅斯福是以正直的精神，正當的程序，利用它作對人民演說利器的第一位煽動家。美國人不像英國人當初那樣錯誤地禁止以無線電作民用廣播演說。因此，羅斯福可以自由地藉無線電建立起他和紐約選民間的關係。他並不必竭盡一切力量來引起人民對阻抑一位前進州長的敵對州立法會發生忿慨。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他可以安靜地坐在播音器前，這樣說：

「這是對本州人民報告一九二九年立法會議議結果的第一次廣播。作為全州選任的官員，我深感自己有使人民明瞭州政府一切進展情形的顯著責任，而且我深知自己不僅是民主黨的，而且還是共和黨，以及本州全體公民的州長。因此，這一次以及我預計中在下星期發表的談話在性質上說來是無黨派的。我祇打算報導事實，由州中人民們自己來下結論……」

於是，他以非常動人的語調繼續對每一選民解釋阿爾巴奈共和黨立法會和公共妨礙物之間很容易看出共同點來。

廣播演說家是天生的，不是訓練出來的；一位詩人很能從經驗中學得不少東西，一位廣播演說家自然能學得更多的東西。有天賦的羅斯福學會了如何運用它。

羅斯福在天空中翩然有如輕巧的燕子，他那種善於操縱廣播的能力，使他能操縱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的注意力。他在廣播中從沒有激動聽衆的情感。有時候表示出的忿慨，就像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批評隔壁鄰人的愚蠢行徑一樣。無疑地，在準備這許多爐邊談話時，其中蘊藏了非常成功的技巧；但是如果我們以爲羅斯福是藉唸一篇事先仔細準備好的稿子，以此來和聽衆們建立起密切關係，這種看法是很可笑的。也許在最初他並不是親自寫全篇演詞的。也許在作他一生傳記的研究的人們時常發現他有這句或那句話是別人寫的，但如果真是這樣，羅斯福還不失爲一位非常優良的演員，因爲他說的每一句話，就完完全全像羅斯福自己的話一樣。這是一位讀過了六千餘頁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演說集」的人所說的。不過，「爐邊閒話」這名詞並不是羅斯福創始的。這是一張報紙上用的名詞，他用這名詞來稱呼「我對全國人民——」即使是在盛夏的黃昏時分——所作的廣播報告」。他一直到宣誓就大總統職之後八天，對人民演說時才正式用這個名詞。那時以後，他所作的若干「爐邊閒話」也許還顯示他和聽衆們都坐在灼熱的火山上呢。

如果我們說羅斯福大半依賴廣播，我們也該知道他並沒有忽略報紙，報紙就大體上

說來是對他採取敵對態度的，但這祇是由於各報所有者的成見，而羅斯福自己和報人們却保持着很好的友誼。

爲了節省篇幅起見，我們在此不必詳述羅斯福兩任紐約州長時期中的情形，我們祇須說他在州長任內的一切措施，正預示他日後任大總統的一切措施。

他在「演說集」第一集的序言中說：

『我們要知道和聯邦政府比較之下，州政府的活動是非常有限的。農業的復興，勞工的保護，公用事業的維持，經濟安全的維持，投資者及銀行存款的保護……這種種由州方採取的行動的範圍自然是由該州的疆域以及它隣近各州是否予以協助等種種情形來決定的。』

『任何一州中所採取之限制商業、工業以及財政上之措置，不得妨礙其鄰州之商業、工業及財政。在這一方面的注意以及尊視，有時可以趨於不必要的極端化。事實上，革新措置的對手們已經走在前面……他們認爲稍稍離開自由競爭的原則，將使他們那一州的工商業失敗而轉入別的方向去。』

『我常懷疑爲什麼在紐約州提前實行社會立法時，沒有大量的商人們把自己

的組織遷出紐約州去。但是却有少許人在其它地區內設法壓迫賤價勞工，不顧人道，來到紐約和別人競爭……

『在這一箇集中，敘述了我在州長任內如何完成老病保險，水力發電，公用事業登記，藉公共事務解決失業，失業保險，勞動時及工資規定，輔助農業，土地計劃及運用，盲人及殘廢兒童等等之援助，以及其它爲進步之政府所應採各種措置之設施經過。經過這種州中的措置發展而爲新政，乃是非常自然的步驟……

『在紐約，以及日後在國內，我所以能完成革新及進展，完全因爲人們準備接受它們，需要它們，而且樂於協助我來執行人民的意志。作爲州長，我時常必須呼籲人民的支助來對付州立法會，有時還須對付報紙上一致的反對。有幾次，立法會通過的乃是人民加壓力於共和黨領袖們身上而得到的結果，人民的意見在必要時，會毫不遲疑地表白出來，而且有方法來表白。

『那時我用無線電非但直接向人民呼籲，並且還詳細敘述了立法情形，這些是我的報紙報告中所沒有的，也是我在總統任內運用無線電的開始。……廣播

被證明爲與人民直接發生聯系的工具，在我之前祇有兩位總統能得利用它。它是接近羣衆最有價值的工具，我相信在未來它也有無窮的價值。」

無線電使一九三〇年羅斯福州長獲得七二五、〇〇一的多數票聯任紐約州長。

史密斯州長以三八五、〇〇〇票當選紐約州長時，得票之多，打破了以前紀錄。現在，就在一九二九年秋天的大難之後，竟有人造成了兩倍於前人的紀錄了。

從那時起，在一九三二年有提名爲總統候選人的十幾個人中，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是受人歡迎的。「阻止羅斯福」運動開始了。仁慈，溫和，漂亮的溫泉病人奇格爾醫師（史蒂文生小說：化身博士中的主角）一晚上就在沙德公園中變成了怕人的哈德先生了。阻止運動者們讀了華爾特·李普曼的政治論文，說他是一位溫文紳士，沒有作總統的條件，心中都暗自告慰。但是它正如一九二九年十月中證券交易所外的風潮（它搖撼了美國財政基礎）一樣地不可思議。自由之神像在震動了。

第十一章

當羅斯福再度被選爲紐約州長時，「阻止羅斯福」運動立刻由代表都市市民的民主黨人發起，繼續演進着，在這一爭執中，我們可以見到不少非常壞的人物。

一九三二年六月底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舉行，在這以前幾個月中，東部的政治鬥爭非常出奇，讀者既難以全體來推斷個別情形，作者也難個別研討。不過有一個事實是必須認清的：在這十八個月之中，羅斯福在政治的拳鬥技術中，充分顯示了他的精巧，幾度使世人明白他是當時政治的重量拳鬥中出色的人物。現在他正在參加世界拳鬥錦標賽，我們該記住當時的事。

羅斯福在政治拳鬥中的精湛技術，使他在芝加哥候競取提名時獲勝，但是決定他在候選競爭勝利後一定可以進入白宮的，却是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七日的一篇廣播演說。

羅斯福四月七日的演說，是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催下，在阿爾巴奈發表的，它意在向共和黨挑戰；但它也似乎是對民主黨挑戰，因爲那時他還沒有被舉爲總統候選人。

它是一篇短短的演詞，大部份在批評高稅制度，批評農民購買力之減削，批評聯邦政府犧牲小商業而討好大銀行，鐵道等組織。

但是使他獲選爲大總統的却是這篇演詞中的四段話：

「十五年以前，我的職務使我在一個國家緊急時期——世界大戰——中積極參加工作。那時的成功是由於一位領袖，他罷斥了胆怯的姿態派送了一百五十萬精兵和正規海軍去援助我們的盟國。當時全國爲戰爭動員起來，經濟，工業，社會，軍事，各種資源集成一個龐大的單位，使千百萬人能有一萬萬一千萬人的支助而作戰。那是個偉大的計劃，因爲它是從下至上，而不是從上至下地建立起來的。

我冷靜地判斷：認爲國家今日所遇的困難，比一九一七年時更爲嚴重。

「據說拿破崙在滑鐵盧所以戰敗，是因爲他忘記了他的步兵——他太倚賴於比較好看而並不實際的騎兵了。目前華盛頓政府的情形正和它相似。它不是忘記，就一定是不想記起我們經濟軍中的步兵們。

「這個不愉快的時期，需要有人已被忘却，沒有組織起來，但是又是經濟力量

中不可少的單位作基礎的種種計劃，需要有像一九一七年那樣從下至上，而不是從上至下的計劃，需要當局再把信仰寄託在形成經濟金字塔底層的那些被忘却了的人們身上。」

這是在希特勒過四十三歲生辰前兩星期所說的話。三天之後，希特勒把興登堡拉向德國總統座上去，心中知道他勝利之時已經不遠了。

這演說給「阻止羅斯福」運動一種刺激。半月之後，在華盛頓一個傑佛遜日的宴會上，阿爾法萊德·E·史密斯宣稱他要和任何引起階級鬥爭的人一見高低。他沒有提起富蘭克林的名字，但是麻省，新澤西，康乃克的克以及匿的島方面人士，都知道他的意思；如果史密斯說羅斯福不好，他一定被認為不好。在競選前一天晚上，麻省派到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馬丁·路馬賽聲稱羅斯福是個貴族，煽動者，欺詐者，他中了麻痺之毒，想用它來引人同情。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麻省民主黨人到票場中去選舉三十六位代表，他們全擁護阿爾法萊德·史密斯。

一星期前，在明尼蘇打的聖保羅，羅斯福參加傑佛遜宴會，曾經說過：

「傑佛遜的路易斯安那購買案使這一個國家的區域大為擴展，人民因此得到很大利益。但是它同時使指導管理這一個國家的人士們，担負起嚴重的責任。在平時，我們像是生活在區域主義的孤立狀態中。全國成了各種社團形成的散漫組織，沒有共同的思想，不知道相互依賴的重要。」

「這種情形使我想起乞斯德頓關於不列顛帝國的話。他說這些帝國各份子就像在一部公共汽車中的乘客。祇有在發生意外時，他們才相互認識起來……」

「兩禮拜以前，我說過我們今天面對的局勢比上次大戰時更嚴重。這話，我今晚要在此地複述一次……」

「我以為對全國人民所作的呼籲，應該是這樣的：『如果三年來我們是坐了一輛老要修理的破車，任它兩輪着地，滾下山去的話，我們現在應該改乘一輛新車，四輪着地，向山上開去。』」

霍斯上校說羅斯福由於在各地的生活經驗，成了一個美國地理學者，這話是對的。

六月十六日，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默默地芝加哥舉胡佛聯任為總統候選人。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共和黨使全國情形混亂不堪。大商業和金融界無法使胡佛在直截的競

爭中得勝。阻止羅斯福的唯一途徑祇有分裂民主黨——就似一九一二年西沃圖·羅斯福分裂共和黨那樣。大商業和金融界的希望集中在史密斯以及東部富有民主黨人們身上。他們的計劃是以史密斯在新英格爾以及紐約的六十餘票（該州二十八張票是一定歸羅斯福的）阻止羅斯福，使另一位牛頓·D·倍格為候選人。西部擁護羅斯福的票數將被『壓抑』，民主黨的選票為羅斯福及倍格二人平分，民主黨分裂，胡佛可以當選。這種結果可能造成全國流血的糾紛，那是大商業和金融界們所要取得的機會。

牛頓·倍格是一位和平主義者的律師，一九一六年曾被威爾遜委為陸軍部長。直到一九二〇年為止，他一向支持理想主義，該主義失敗後，他投身於大商業懷抱中去了。自然，倍格從沒說他要接受候選競爭。如果有人舉他，他出於單純的愛國心，也願接受。公平地說來，史密斯承認羅斯福是最根本的威脅，如果他自己競選總統失敗，祇要見到比他年輕的對手也失敗，他就很高興了。

六月底，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繼共和黨之後在芝加哥舉行。早二十年的六月中，牛頓派也是在芝加哥發難而在八月中舉西沃圖·羅斯福為總統候選人的。一切是有點像歷史的重演。

大會中第一個鬥爭是關於禁酒問題。撤銷第十八條法案該列爲民主黨競選政綱之一嗎？赫爾先站起來說話了，當史密斯駁赫爾的話之後，他以爲自己已有把握當選爲總統候選人了。新英格蘭方面擁護史密斯的人們聲勢自然是很浩大的，但是與會的二萬五千芝加哥當地人士（這對史密斯是很不幸的）沒有投票，這是一種鼓勵的呼聲。將廢除禁酒令列爲政綱之一的議決案乃以三十五對十七票通過。

羅斯福選了約翰·E·馬克爲他作競爭演說。馬克一向是羅斯福作各種競選時的介紹演說人。一九三二年，他說：

「生於美國，愛美國的這位人物的全部政治生活乃是一本公開的書。他的聲名卓絕，品性毫無玷瑕……無論作一位青年，作一位學生，作一位律師，作人子，爲人夫，爲人父，作一位立法者，作一位行政者，他都配得上美國人格的各種傳統。」

馬克更進而指出：

「目前在他旗幟下的姐妹州有：華盛頓，奧立貢，尼伐達，阿里佐那，伊達荷，烏打，新墨西哥，考羅拉圖，約明，蒙他那，北達柯達，南達柯達，尼勃拉

斯加，坎薩斯，明尼蘇打，伊沃華，阿堪薩斯，路易斯安那，威斯康辛，坎泰基，泰尼斯，密西失比，阿拉巴馬，喬治亞，佛洛麗達，南卡羅里那，北卡羅里那，西浮琪尼亞，本尼雪維尼亞，密支根，伐蒙特，新亨勃西亞，梅茵，以及地拉瓦。更加上阿拉斯加，哥倫比亞區，夏威夷，浦托·里加，浮琴島以及巴拿馬運河區。」

麻省州長埃萊現在步上播音機前發表他爲史密斯作的滔滔的競選詞，這是史密斯正在芝加哥旅館中聽廣播，羅斯福州長也在阿爾巴奈行政廳中聽廣播傳來的演說：

「在他失敗後誰來重組黨機構的？誰來進行鬥爭的？誰來決定局勢趨向的？有頭腦，有力量，有領袖能力，有親切心，有組織力。爲什麼停留？爲什麼遲疑呢？」

「難道有什麼遠年的鬼在這會場中操縱了你們的頭腦，心思，和良知了嗎？難道恐懼的鬼怪抓住你們了嗎？……」

「我爲麻省的公民說話……我相信自己是代表工業化東部的情感的，我們清教徒的祖先們反對將政府委託給宗教觀念不同的人們，這種偏見，由於我們從這

位人物身上得到的經驗上，證明我們可以完全放棄它而很安全地將政府委託給這樣的一位人物。

「我們必須結束可以懷疑的政府；我們要建立一個有決斷，有行動，進步的政府。爲了民主黨，爲了美國，爲了人類的需要，我向大會提出阿爾法萊德·E·史密斯的名字。」

在熱烈情緒中，從前宣稱効忠史密斯的各州都把旗幟舉了起來。麻省，康乃克的克，新澤西，匿的烏，以及菲律賓準州，還有三分之二的紐約代表（比任何最大州的代表人數還要多），都走入史密斯行列中了。

其它的候選人名也逐一被提了出來——浮琪尼亞的白爾德州長；瑪麗蘭的瑞啓州長；沃海奧，奧克拉瑪，米蘇里等州所擁護的人物；其中更爲重要的有參議院議長約翰·南斯·迦納，除了泰克薩斯本州的四十六票外，他還得了由麥卡圖領導下的加利福尼亞州的四十四票。

在沉悶的整夜開會之後，經過了三次投票，羅斯福已經得了六百八十二票。他須要

再有八十六票，即可得到爲候選人所必須有的票數，但是史密斯方面似乎沒有後退的表示。

羅斯福的競選經理人大詹姆斯·A·法萊（他是從紐約來的禁酒而並非絕不沾酒的天主教徒）和路易斯·霍威都非常焦急。他們不要一個長久相持的鬥爭，因爲長久鬥爭結果，縱使羅斯福得勝，對他總統競選時仍是不利的。它將使黨中分化。而且還有牛頓·倍格在一旁伺候，史密斯之反對羅斯福，正給予另一位候選人大好機會。在密西失比，伊沃華，阿拉巴馬及考羅拉圖方面，有人正在散言要支助倍格。沃海奧可能立刻轉向另一位它所擁護的人那邊去。如果第四次投票還沒有結果，立刻會發生分裂。泰克薩斯和利福尼亞爲什麼捏緊那可貴的九十張票不放手呢？

六月三十日，波斯頓市長詹姆士·M·寇雷（他自始至終是擁護羅斯福，爲他在麻省進行競選的）打電話給在加利福尼亞的報紙鉅子威廉·倫道爾夫·赫斯特，後者是支持迦納的。

「迦納先生不能被舉爲總統候選人了」，寇雷市長告訴赫斯特說道：「但是如果你改而支持羅斯福先生的話，我可以保證迦納可以被推爲副總統候選人。事實上，我已經

準備爲他而進行鬥爭。」

赫斯特對羅斯福的態度是否因爲這一次電話即改變，這是我們所不敢斷言的。我們可以確言的是那晚赫斯特打電話給在芝加哥旅館中的麥卡圖，麥卡圖又打電話給在華盛頓的迦納議長。第二天，輪到加利福尼亞宣佈的時候，麥卡圖修長的身姿出現在講台上了。

「說響一點，」會場中大家喊道。

「我要說得更響一點，」他說：「加利福尼亞到此地來推選美國總統候選人。它不是來使這次大會瀕於死境，也不是來使一九二四年的情形再度演出的。全國的利益最好是能在有力的時機被拯救過來。如果在此地的競爭延長，結果徒然引起不少疑慮。當一個人帶了近七百多的票數來參加一個全國代表大會時……」

這時，示威運動進行了半小時，阻撓了麥卡圖的話。支持羅斯福的人們知道這話的意思，十分欣喜。全場沉靜下來時，麥卡圖說：

「加利福尼亞，四十四票，讚成羅斯福。」

投票繼續進行。

芝加哥市長安童·施馬克說：

「伊利諾斯，三十八票，贊成羅斯福。」伊利諾斯五十八票中還有少數支助史密斯的。

輪到梅茵了：

「梅茵到那裏，工會也到那裏。梅茵，十二票，贊成羅斯福。」

歡呼聲更高了。瑞啓州長把瑪麗蘭的十六票投出贊助羅斯福了。

埃萊州長上了台：

「麻省，三十六票，贊成史密斯。」

大會中給他這種固執以一陣歡呼。

於是，輪到新亨勃西亞了：

「新亨勃西亞是決定勝者的第一州。新亨勃西亞，八票，贊成羅斯福。」這裏我們要知道那時新亨勃西亞方面共和黨的州長是約翰·G·魏南特。

「新澤西，三十二票，贊成史密斯。」

「匿的島，十票，史密斯。」

「麥克羅斯。四十六票。羅斯福。」

僵局打破了。富蘭克林·D·羅斯福以九四五票對阿爾法萊德·E·史密斯的一九〇。五票被舉為總統候選人。但是，那時史密斯方面還是不使全國一致。

史密斯自己在旅館中聽着經過情形，麥卡圖說話時，他知道已無希望。他回身吩咐隨從人員們收拾行李。他不作一語，回到紐約去。

在總統競選中，阿爾·史密斯作了一二次擁護羅斯福的演說；但是他絕對不相信羅斯福是危難時期中的適當人物，不久之後，他協助建立美國自由協會，目的在保護個人對付政府。

羅斯福從紐約定了飛機趕到全國大會中去接受提名，這種態度一半是由一時的熱情，一半是由想把一切顯得戲劇化的企圖所激發起來的。他一定真正希望儘快地推進加在他身上的工作。由於一陣暴風雨（這是當時全局的象徵），他在七月二日黃昏到芝加哥，較預計時間遲了許多。

「主席華爾希先生，一九三二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朋友們，我對各位在六天的辛勞後仍願留在此地的情意，深致欣感。我知道各位和我一樣，一直沒有

好好睡過。我來遲了，衷心十分歉疚，不過我沒法操縱風雲，而祇能感謝我所受過的海軍訓練了。

「全國代表大會提舉的總統候選人親自出席大會，聽候正式宣佈當選，這是空前而非常的事。但是現在正是一個空前而非常的時期。我打破了已往候選人常守的不通習慣——對幾星期以前發生的事，在沒有正式通知以前，裝作不聞不知的樣子——，這就是我開始了面前工作的第一步……」

「從今天起，本黨應以破除無意義的傳統為任務。讓那些善於失信的共和黨領袖們再失一次信……」

「現在，我在此地對那些名列共和黨，在良心上不能隨他們領袖們亂撞而陷於失敗中去的人們，表示歡迎他們和我們攜手；而同時，我以同樣的態度警告念於過去而無視於未來的，那些不明瞭新時代所給予他們的責任的掛名民主黨們，他們已經不能和黨取同一的步調了……」

「共和黨領袖們告訴我們說經濟法規——神聖，不可犯，不可變的——所引起的痛苦是不可防制的。但是他們大談經濟法規時，無數男男女女正在饑饉之中

，我們必須認清經濟法規並非天然制定的。它們是人類所造成的……

「我要各位和我自己保證爲美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政。讓我們在此聚會的人都成爲勇敢而勝任的新秩序的先知者，這不僅是一個政治競選；這是一種戰鬥的號召。幫助我，非但要贏得選票，並且要在這次討伐中得勝，把美國交還給它自己的人民。」

當羅斯福提出新政的諾言時（這新政一詞，是他在阿爾巴奈行政廳中，在悶熱的夜裏和家人知友聽取全國代表大會廣播時所發明的），他是充分地相信自己有完成這一諾言的能力的。我們可以說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紐約州大衆選他聯任二任州長時，他已經相信自己在一九三二年中將被選爲大總統了。

羅斯福決定如果他被選爲總統，他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政綱。當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從赫拔特·胡佛那雙麻木的手中接過舵的時候，他也許並沒有看到未來經濟形勢可能惡化到什麼地步，但是事情惡化得很快，使他不得不作應付困難時期的準備。因爲這個原因，他聚集了許多專家，這就是一般所稱的「智囊團」。政治方面的人物是與路易

斯·霍威商討後選擇出來的，他們的工作是爭取選票。智囊團的工作是使這些選票不是在虛偽的外表下取得的。

主要人物有哥倫比亞大學公法教授雷蒙德，摩萊，他是極有名的犯罪學家。羅斯福最初請他計劃紐約的標準假釋制度。一九三一年末，他請他監察競選材料的準備事宜。摩萊從他學校中又拉來兩位人物——萊克斯福·杜威爾，他是經濟系的教授，和阿道爾夫·奧古斯多·柏爾，他是法律系的教授。英國政治舞台中不信任智識人物的意見，這種風氣也在美國流行着，而智囊團自難免爲世人所責難。智囊團並不全是彬彬學人。羅斯福的顧問們雖然都很聰明，但大多不是學者。不過，這三位教授却特別受外人的注意。

智囊團的工作，可以由賽默爾·I·羅森曼法官（他也是該團合作人物之一，曾任羅斯福州長兩任顧問）所編集的「羅斯福文告演說集」中看到一般。他們完成了偉大的工作，這是無人可以否認的；不過如果沒有合適的總統候選人，他們的工作也就無效了。也許我們可以說不論對手是誰，在大選前六個月時，胡佛已經失敗了；但這並不足以說明羅斯福何以一旦當選後，又能以史無前例的多數票聯任的原因。智囊團的工作也不是說明這一點。事實上，唯一的解答祇能從這位人物身上找到。

特別是有了一篇由智囊團和很多人們所擬的演說。那是她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舊金山的共和國俱樂部中發表的，如果一篇演說可以使一個國家準備革命的到來，那麼在共和國俱樂部中這一篇演說，就是屬於這一型的。

作者寫到此地時，各處傳來對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羅斯福大總統在第七十八屆國會的演詞所作的批評，表示出全美人士因為看到這一篇話中沒有一點偏頗性質，都深感欣慰。共和國俱樂部那次演說的重要性不在它對競選的影響而在它使羅斯福的哲學得到了被視為正確的根據。如果他錯誤了，他在投票前已經毅然負起了錯誤的冒險。

「關於政府的爭執，常是個別的男女們該為一個政府或經濟體系服役呢，或是一個政府或經濟體系應當為個別男女服役而存在……最後斷言並不是任何個人可以說的。但是我們仍相信變更和進步。民主政治是一種探求……一種對優良事物的不斷探求。」

傑佛遜，他繼續說道，認為人民有「兩種權利，一種是個人權能，另一種是個人財產之取得及保有權」。他們說的「個人權能」是指自由思想的權利，意見之形成及發表的自由，以及個人依據個人權利而生活的自由。為了保證第一種權利。一個政府必須使

它的作用不致干涉個人。但是傑佛遜也知道財政權的執行可能阻撓個人的種種權利，政府沒有這種財產權利即不能存在，政府要干涉，但是不能摧毀個人主義，它必須保護個人主義。

「各位都熟悉那時以後所發生的政治大門爭；那時漢彌爾頓和他的朋友們如何積極建立集中的統治權，而終於在一八〇〇年大選時為傑佛遜先生的政黨所敗。經過那次爭鬥之後，我們今日所知的共和民主兩黨形成了。」

「於是，在美國政治生活中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是個人反對體系的時期，也是個人主義被奉為美國生活中一大口號的時期……」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發生了一支新力量，建立起一個新的夢想來。這力量就是所謂的工業革命，是蒸汽及機械的進步以及現代工業的創始。這是一個經濟機械的夢，可能提高每一人員的生活水準，使很卑微的人們都能得到繁華的生活；用蒸汽力和電力來消滅距離；把每個人從笨重的苦工之中解放出來。」

羅斯福更進而說明「有偉大意思力及偉大野心，具有天才」的人們，必須被運用來實現這種夢想，在擴展期中，一切人都有平等的機會，政府的工作不在阻撓而在協助發

「吾人看看今日的情形，就很明白地看到機會平等……已經不復存在。我們的工廠已經建立起來了；現在的問題是在現存情形下，工廠是否建立得太多。我們早已到達最後的邊界了。」

「……正如農耕自由已經中止一樣，商業的機會也已經日漸狹隘了……如果集中的過程依然以同樣的速率（像過去三十年中一樣）前進，一世紀後，全部美國工業將在十幾個會社操縱之下，也許祇由一百多個人主持了……」

「這一切都需要再來一次估價……我們目前的任務不是自然資源的發明或採發，也沒有作更大的生產的必要。它是更重建高一級的……安排資源並處理目前工廠，尋取我們過剩生產區的市場的途徑，解決消費力低落問題，調整生產消費，更平均地分配財富及生產品，使現有經濟組織能為人民服役的工作。行政開明的日子已經來到了……據我看來，政府在和商業上的關係上說來，它的任務是協助一個經濟上的權利宣言，一個經濟上的憲法條文的發展……」

在這可稱爲劃時代的演說結尾時，羅斯福（雖然在那時似乎沒人了解）以現代的口吻來複述傑佛遜在獨立宣言中所提到過的社會契約論，他說：

「每一個人都有生活的權利；這就是說他有使生活舒適的權利。他也許因怠惰或犯罪而未能執行這一權利；但這並不能使人否認他之具有這種權利。我們沒有真正的飢荒或歉收；我們的工農機械化已經能生產足供消費的物品。我們的政府以正式或非正式，政治的或經濟的方法，給每個人一條路，使他以自己的工作，來從豐富的物資中取得他所需的一切。

「每一個人對他自己的財產有一種權利；這就是說有一種在最大限度內保護他的儲蓄安全的權利。除此之外，人們無法承受人生中自然而來的盲幼，疾病以及衰老的重荷。在有關財產的各種思想中，這一權利是最重大的；其他一切財產權利對它都該讓步。如果依照這種原則，我們必須限制投機家，投機家甚至金融家的活動，我相信我們必定認爲這種限制是應該的，不是打擊個人主義，而是保護它……」

「這高爾契約最底條文是爲了自由和快樂的追求……我們明白如果在個人利益的情形之下，個人自由和個人幸福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知道在每個情形之下……國

讀、思想、談話以及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權利必須受絕對尊重。我們知道任何損害這種基本權利的自由行動，是任何約文所不能辯護的；在這方面，政府工作是在保持平衡。在這種平衡之下，每個人都能取得自己所需的位置；能得到所需的安全；都能按他能力而得到權力，這種權力是和他附帶負起的責任同來的……

「政府須有一種能制定（這樣）一種得到一般人擁護的政策；不斷地勸告、領導、犧牲、教諭，因為一個政治家最大的責任就是教育。」

羅斯福認為一個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如果不願在精神上與物質進化取得一致步驟，它不是分裂為兩個州的集團，就將進而演化為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我們該記起一九三二年時，墨索里尼的實驗也有相當的成功。當時這種實驗沒被人完全了解，因此它祇能在義大利國外冒險以求進展。希特勒在那時也成了保守的論調中認為是最有希望解決德國混亂的人物了。

羅斯福不能不注意到從前以暴政壓迫殖民地，引起美國獨立宣言的國家，現在竟比由那些殖民地中發展成的強大國家更為自由了。他不願把這作為事物的合理情形看；但是

他覺得一位人物必須負起喚醒美國政治良知的鉅任。政府必須能成爲政治生命的表現。

我們所以對羅斯福早期事業作較長的敘述者，因爲在作者看來，它們是了解今日羅斯福地位的基礎。他必須由他的行爲來判斷而不能以理論來批評。他天生對別人的情緒頗能預感，歸結起來使我們認他爲一位紳士。他很幸運地有着使他能表現這種感覺的機會的父母。他很聰明地選擇了一位夫人，她慢慢地趕上了他的政治觀念，能夠稍稍地留在這些觀念之前。羅斯福夫人常常提供比她丈夫更爲激烈的看法，這使羅斯福不得不永遠前進着。這無疑的，也是他天性關係，但是如果他偶然有在政治上後退，對政治生活討厭的心思時，看見他夫人的榜樣，他就不得不振作了。今日世界上應引爲滿意的，就是現在羅斯福大總統的思想毫無硬化痕跡，這在同時代的政治領袖中是很難看到的。有些批評者說他太易於受人影響。如果他保持着自信力，這又有什麼關係呢？而且沒有任何批評中顯示出他會喪失這種自信力的。這是說他不怕犯一點錯誤，而如果他在執政中沒有犯一點錯誤，那無異是說他是個超人，而美國是個超人的民族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羅斯福在共和國俱樂部發表那篇演說時，似乎並沒有注意到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中他引用這種政治理論到實際情形去時可能發生的糾紛。他似乎是在安下

一個在威脅性的經濟危機設有有力而合理的行動所移轉後的長期政策的主要指示。這篇演說和他在任紐約州長時發表的就職演說有一點相似之點，它們是要求一個長期政策的理想。

一九三二年秋天，美國國內經濟情形迅速地惡化有，環境加速了它的步調。十一月八日羅斯福在選舉團中以四十二州對六州，在選舉中以二二·八一三·七八六票對胡佛的一五·七五九·二八六票當選為美國大總統。規定在十一月大選後，新總統於次年一月二十日起職，新國會於次年一月三日就職，而第二十修正案，當時正在批准過程中。因此，直到新總統在開年三月四日正式執行職務那時為止，人民除了面對着惡化的經濟局勢之外，還須忍受一種新舊交替間青黃不接的時期。那時歐洲對美的戰債問題，已經非常尖銳化了。

羅斯福雖然明白宣稱他「歡迎胡佛總統在外交上所採取任何探討式，或初步調查式的步驟」，但事實上他卻很聰明地避去了胡佛請他參加任何有關戰債問題的，善意的邀約。

二月十五日，在佛羅麗達水上度過一個短短的釣魚假日後，新總統到了美阿米。在

那裏，一個瘋人對羅斯福連射了幾槍，人羣中受傷的有五人，一位是芝加哥市長安童·施馬克，當時他正站在羅斯福身邊。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中領導伊利諾斯擁護羅斯福的就是這位施馬克。他在倒地垂死時還低聲說：「我很高興！因為打中的是我而不是你。」

遠在德國，另一個殺人的瘋子，在羅斯福五十一歲生辰時做了德國國務卿，他這時該已經聽到了戈林火燒國會的炸藥陰謀，這陰謀用意在他能在三月五日掌握大權，解決選舉問題，三月五日正是美國總統就職後一日，歷史上罕有這種不吉的偶合事件的。

美阿米行刺案發生之前一日，密西根各銀行在州長所謂休假的名義下，全體休業。二月二十五日，瑪麗蘭各銀行也都關門。此後直到三月四日，紐約，伊利諾斯，麻薩諸塞，新澤西及本雪文尼亞各州的銀行都宣布休假，它們過了週末依舊不斷地休着，其它各州中，幾乎每天都有銀行展限兌付。

這就是在三月中一個早晨，羅斯福在華盛頓所面對的一個爲經濟沉疴所打擊的國家的情形。一位傳記作家在寫這段文字時，宣稱在美國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這樣（以他說話的聲音和他所說的內容）使全國團結一致，這話並不是出於衝動的。

第十二章

一位外國觀察者，即使他是一位權威的經濟學者，在討論羅斯福對美國國內經濟的措置上的得失時，不得不十分審慎；但是他雖然是門外人，他和美國人士同樣地微感到不耐，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們很快地忘記如果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能夠嚇去了當時的恐怖，他們也許不致於抱怨國內經濟的管理機構了。

也許最公平地表現當時情形的看法，是錄下總統自己的話，他並沒有誇張。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前幾個月中生活過的人，不必再聽別人講述一九二九年崩潰之後的美國經濟生活的困窘情形了……到總統就職日那時，美國所有銀行完全關門了，一切財政事務完全中止了，工商業完全低落到最低的水準之下去了。和經濟崩潰同來的大批失業情勢的擴展，更使人有陷於絕境之感。我主要是在尋覓……盡最大可能地，消滅目前以及未來緊抓住美國人民和美國精神的這種恐懼。」

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說這樣的話倒是很偶然巧合的，那時他正在等待醫

生的診斷，他說：「我主要是在盡一切可能覓取消除緊抓住富蘭克林·D·羅斯福身心的，目前以及未來的恐懼。」這並不是故意把他自己有一個時期中所遇到的情形和一九三三年三月中美國的情形相聯。祇有在小說中或戲劇中，作家們爲了自圓其說才會作這類的對比的。我們記得輿論說他很平凡而並不出衆，很淺薄而並不深刻，很易受感而不善感人，委婉而不徹底，溫柔而不嚴苛，感情化而不實際……等等，這在外表上看來倒是很好的。他自己對一九二一年八月中第一次覺得腿有點麻木那時起，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接受紐約州長候選競選時止，那一時期中保有着他意志力量和決心這種情形，非常感到滿意。從那一次偶然的事情上看來，也許在病後他的自信力不如以前那樣明顯。我們以爲一切都因爲這位人物對他自信的權利估計得很壽。這種權利受了最嚴厲的試驗。小兒麻痺症使他有一生失業的恐懼。小兒麻痺症早將他的雄心閉鎖。小兒麻痺症使他失去了以前的生活經驗。小兒麻痺症使他失去向生命中購買的力量。小兒麻痺症使他體味到和貧困相同的艱苦經驗。他從這種困苦病難中爬到了顯著地位上，面對着一個在林肯以後沒人遇到過的，全國危難的時期，他可以從自己困苦的生活經驗中得到一切來無視於一切危難的恐懼心理，同時他很明白國人無法嘲笑他，說他沒有感受過這種困苦

的時期。

「現在是忠實而勇敢地說出真理，說出全盤真理的時期。我們不必因為面對今日國家的情形而有所畏縮。這偉大國家將和以前那樣繼續存在，而且將重生，將更為繁榮。因此，我確定地說——說我自己的信仰，我以為我們該怕的就是恐懼心理——一種無名的，沒理由而不合理的恐懼，須有絕大努力才能轉後退為前進。在我們全國生活陷於黑暗時期中的每一階段中時，忠實而有力的領袖常能獲得人民的了解和支持，這是走向勝利的主要條件……」

「我自己和你們大家都以這種精神來對付我們共同的困難。感謝上帝，這些困難完全是物質方面的。價值低落到瘋狂的水準之下；賦稅已經增加；我們付賦稅的力量低落；各種政府機關收入都不為減削；一切交易手段在貿易中完全凍結；工業企業的枯葉到處皆是；農民的生產品沒有市場；成千萬家庭在多年中的積儲都喪失了。」

「更嚴重的是無數失業公民面對着生存的嚴重問題，而很多人勞動着，却得到幾等於零的收入……」

「愉快非但存於金錢的保有之中；它還存在於完成一件事物的欣喜中，在創造性努力的激動中……我們最偉大的基本工作是要使人們工作……」

「在世界政治中，我將以這個國家和我們善良的鄰國的政策相並而馳——善良的鄰國堅決地尊重它自己，因此它也能夠尊重別人的權利——它尊重與世界其它隣國所訂定的條文以及它該執行的義務……」

「我知道我們願意將生命和財產交付給……紀律，因為它使一個目的在求得更大的優良條件的領袖可以行使職權。我現在提出諾言，担保這偉大的目的要被視為神聖的責任似地被我們遵守着，必要時我們可以進行武裝的鬥爭。」

「作過這個担保之後，我毫不遲疑地担任起我們人民的偉大軍隊的領袖，來對付我們共同諸問題所引起的有組織的襲擊。」

「由於憲法規定的責任，我準備提供一些在凋疲的世界中一個凋疲的國家所需要的種種處置。對於這種處置以及國會由它的經驗或智能中所決定的其它處置，我將負起我憲法上的權能，儘速付諸實現。」

「但是如果國會未能負起這種使命，或者國家的危機仍舊非常嚴重的話，我絕

不躲避我自己的責任。我要要求國會給我另一件對付危機的工具——對危險作戰所需的更大的行政權，這行政權範圍要如我們受外敵侵犯時我所負的權力一樣大。

「爲了我所受的信託，我將回復這一時期所須有的勇氣和信仰。我不能……」

「我們不能不信任主要的民主政治的未來。美國的人民們並沒有跌倒。他們爲了本身的需要簽定了一個契約說他們需要一個直接而有力的舉動。他們需要紀律，和一個領袖的指示。他們使我成爲達到他們希望的工具。我是接受禮物的工具。我以接受禮物的精神來接受這種委託。」

「在這種努力之下，我們的國家卑下地祈求上帝的保佑。願上帝保佑我們大家。願上帝在未來時日中不斷地指揮我。」

三月九日（這是議員從太平洋沿岸可能趕到華盛頓的最早的日子），國會召開非常會議，這以後一百日的緊張討論，正足以表示羅斯福大總統應付緊急時期的非凡能力，這種討論非但不是他當選後到就職時這一時期中所能準備妥當的；即使我們說是在就職前一年之中籌劃的，也是很可能的事；但是羅斯福在一百日之內完成作爲新政物質基礎

的全部根據，却是在全國銀行倒閉時立意完成的工作。

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崙在法國登陸；但是他的「百日」却是在三月二十日路易斯十八出走後才開始的。羅斯福在「百日」前，祇有五天的光陰。

三月五日，他對國會表示自己的信仰，並且向全國鬥士們廣播，請他們合作參加一個「對自然力量，對人類自加限制的錯誤，對自取無能的力量，對怠惰和恐懼」的戰爭。三月六日，他對被約到白宮來準備作一天討論的全國州長會議演說。由於銀行倒閉的緊急危難情形，他祇能即席簡短地請他們「協助及合作」。州長們不計較政治上的不同意見而和他合作，決議一致信任他的領袖地位。有一個人民代表委員會致州長會議一封信，表示他們相信「全國一致對我們所選的領袖表示信仰和希望。」

這封信中簽名的有美國工聯主席威廉·格林，卡地納爾·孟地靈，拉比·衛斯，阿爾法萊特·E·史密斯，牛頓·D·倍格，尼可拉斯·摩雷·勃特勒博士——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美國高會主席H·G·哈立曼，以及政論家華爾特·李普曼。

就在三月六日，大總統宣佈銀行休假祇能到三月九日為止，他自己開始草訂緊急時期銀行法令，不到半小時就交國會，在同日立刻頒行。同時又發命令各銀行俟通知後開

業。三月八日前一天，大總統舉行他第一任內三百三十七次記者招待會中的第一次集會。記者招待會在白宮中並不是創舉，不過羅斯福廢除了以前那種紙面詢問的成例。和麥克因泰，路易斯·霍威同為白宮祕書的史蒂文·歐萊負責與各報取得聯絡。他自一九二〇年副總統競選後，一直和羅斯福在一起。全國報紙評論對新政都表示反對，但是記者們私人對總統的印象很好。

三月十日，羅斯福請國會大為減削聯邦預算。那晚上他在夢中被加利福尼亞大地震的消息鬧醒了，不到一刻鐘，電話中又說『要為海陸軍及紅十字會取得一切必須的物資』。他從不相信任何國家的厄難，可以委託私人企業來解決——無論這種厄難是由財政銀行，還是由沃海奧和密西失比的銀行所造成的。

三月十二日，大總統第一次發表廣播爐邊閒話，向全國人民解釋銀行事件。

「你們作人民的必須要有信仰，」他結論時說：『你們不能為謠言或猜測之詞所迷惑。我們要聯合來消滅恐懼。我們有着重建經濟體系的機構；但是要使它進行工作，却須有你們的支助。這是我的，也是你們大家的問題。我們大家都不能輕忽。』

在財長合理處置下，銀行在三月十三日禮拜一那天開門了，以後幾天中一直都開着

門。這是羅斯福在爐邊閒話中所能傳播的信任，不久之後，在財政方面，這個國家又能開始行動了。

在銀行倒閉那一週的危難時期中，幕後工作的人們像瘋人似地工作着。財長威廉·H·伍丁是本雪文尼亞一位鑛礦鉅子，閒暇時喜搜集硬幣，拉提琴，譜樂曲，寫兒童歌曲。他是共和黨人，但是因為不贊成禁酒令而在一九二八年時支持阿爾·史密斯為大總統。他是當初拉羅斯福出任州長，允許為他集募溫泉基金而成爲該基金理事的人物。他在支持羅斯福作候選競選時，在名義上還是一位共和黨人。當華爾街企圖阻止羅斯福時，他公開說他相信羅斯福。他的銀行後台是丁·庇爾勞特·摩根公司，他自己的事業很興隆，在華爾街上很有勢力。

十四個月之後，這位小人物死了。他在那一個緊張的星期中，幾乎沒有閉上眼過，那時他已經害了喉潰瘍，以後十個星期之內，他還是努力工作着。「在作戰時間中，沒有人比伍丁部長更熱心，犧牲更大的。他在美國人，特別是知道他的人們心中，佔有偉大的地位。」這是他的首長說的話。這種人的信仰是羅斯福所能贏得而且能用它來爲國

家謀利益的。

三月十三日，總統向國會提出廢棄「伏爾史蒂」法案，使啤酒及淡酒類之製造合法化。第十八修正案之廢棄須要較長時期，目前的處理祇是初步手段。

三月十六日，總統提出農業調查法案。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在三月十日對五十位農民代表解釋一個足以影響當年收成的農業計劃。第二天，通過了草案，五月十日，通過了「影響很大，在平時從沒有提出過的遠大的農業法案」。

亨利·阿迦德·華萊士，伊奧華人，是羅斯福出色助手之一——在某些觀點上說來，是最出色的人物。他在一九四〇年時被選為副總統。他的父親，「華萊士農民」報的所有及主編人，歷任哈定和柯立芝時的農業部長。青年華萊士發現了包谷，豬，雞等增產方法。他改進了根據氣象報告預言收成情形的方法。他實驗過支持體力究竟須要最少食品的量如何，甚至以自己為實驗而害了壞血病。他寫過有關農業定價的標準書本。一九二八年他脫離共和黨，一九三二年，他寫了不少文章，又發表不少演說，使傳統上是共和黨勢力的伊奧華州一變而為民主黨的。他是蘇格蘭的伯里斯巴德里安後裔，無疑

地是全世界偉大的農業思想家，他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很大。是的，羅斯福選人非常得宜。

三月二十一日，總統要求國會給他推進人民保守隊的權柄。這是在偉大經濟計劃中他自己的特殊節目，到六月一日，已有三十萬青年男子在公路邊植樹來防止土地腐化及潮浪。全國建立起二百處營房，賺得的工資中有部份送回家去。

三月二十七日，羅斯福總統採取推進農業信用所的初步步驟。這工作要日後繼伍丁爲財長的小亨利·摩根索來從事。

三月二十九日，總統對國會提出交易安全法案，使投資者不致因爲公司方面虛偽的流動資金手段而受損失。

四月三日，提出了農業抵押法案，目的在減輕農民担負，防止土地併吞。

四月十日，提出坦尼斯流域主權法案，目的在爲「全國社會及經濟上之利益」，從事「計劃空前的偉大區域工作」。

四月十三日，提出有家者債務法案，是防止併吞土地又一法案。

第十三次記者會談時，一位記者問總統說：「你怎麼會傷風的？」

他答道：「我不知道，我想我說話說多了傷了風。」

但是，這傷風並沒蔓延到他腿上，因為在四月二十日，他使美國拋棄了金本位。

還有許多話要說。總統約藍姆賽·麥唐納去見他，討論即將在倫敦開的世界經濟會議中將引起世界注意的種種問題。在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六日之間，這位總統和英國首相以及他們的專家隨員們不斷地討論着。

四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和加拿大總理舉行經濟會議，四月二十八和艾杜德·赫里歐討論法國經濟。

五月四日，總統要求國會通過鐵道改組法案。

五月七日，在第二次爐邊閒話中，他對全國報告他和他的政府所辦的一切，以及正在計劃中的許多設施。

五月十二日，總統簽定了聯邦救濟法案第一條，同時對美德貨幣會議結果，和德國的史查特博士發表共同聲明。

五月十六日，他向全世界五十六位政府領袖作裁軍和平以及結束經濟危難的呼籲。

他從荷蘭的惠海爾明娜皇后那兒得到了最動人，最忠實的回諾。

五月十七日，總統對國會提出全國工業復興法案，要求以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作公共工作救濟金。

最後這一巨大法案在六月十六日由總統簽署，當時在休·S·約翰遜將軍領導下，建立了全國復興局。工業復興法案（N·I·R·A）所引起的評判如何，我們從本雪文尼亞的上達巴地方的小克利斯多法·J·柯靈士夫人以尼拉（N I R A）作她女兒的名字一舉中想見，同時可以看到國民對羅斯福的信仰。

在總統讚慰後，第七十三次國會在六月十六日休會，從開會迄今，正是一百天。新政開始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禮拜六，羅斯福先生離開華盛頓，和孩子們乘四十呎的帆船「安巴傑克」號沿麻省，新漢勃西亞及梅因沿岸航遊。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也是禮拜六，拿破崙心中盤算着自己的地位，政治和軍事技術等等，正跨着白馬，冒着雨向滑鐵盧行進着。

在羅斯福的一百天之中，德國國內的事情演變得很快，三月五日，由於德國西南部

天主教中等階級轉向希特勒之故，納粹已經得到百分之四十四的選票。

三月十三日，戈貝爾博士被任爲啓蒙部長；共產黨人被排斥於國會會議之外，國會在戈林和希特勒陰謀縱火之後，現在正改在堡斯坦的迦立生教堂中開會。

三月二十四日，邱吉爾正在下院中攻擊麥唐納在羅馬和墨索里尼所談着的英法德義四強協約，同時他認爲裁軍會議結果是有害無益。艾登認爲邱吉爾的攻擊有點荒謬。

四月一日，全德國的猶太商店被抵制了，在這一月內，頒發了阿里安法令，凡沒有在大戰中服役的猶太人，一律革職。

四月七日，希特勒任命戈林爲普魯士總理。

五月一日，納粹從工會手中奪取了慶祝五一勞動節的舉動。

五月二日，工會被解散，組織了德國工人陣綫，解散了社會民主黨。

五月十日，在柏林舉行了焚毀納粹所恨書本的大火。

五月十七日，希特勒聲言德國將毫不自私地和別國合作克服歐洲政治及經濟上的種種困難。

五月十八日，興登堡引用前一天希特勒所說的話，回答羅斯福向全世界作的裁軍以

求和平的呼籲。

六月十一日，奧國的納粹們開始煽動人民忿慨，宣稱陶爾非斯博士是國際猶太人及小協約國的僱庸。

六月十七日，希特勒向人民宣稱革命時期已過，進化時期將立即開始。這時期開始時，無數反對納粹的人們被送進集中營去受刑或被暗殺掉。

希特勒的開頭一百天我們說得不少了。他最後的一百天現在正依無情的程度發展着。

六月十九日，「安巴傑克」號到了坎普貝羅，有很多隣人們來歡迎，羅斯福對他們這樣說道：

「我想，無論是新知舊交，我都可以認你們為我的老友而談話。我今天早晨算計着時間，記起四十九年以前我因為長牙而被帶到這兒來。直到十二年以前，我還是在每年到此地來過好幾個月。

「我覺得回憶是很奇怪的東西，因為今天早晨當我們在奎台海角方面快要航出迷霧時，在船頭上瞭望的孩子們喊道：「前面是陸地」。可是，回憶使我開足速度

前進，因為我知道那地方是虛貝克狹地……

「當我航過了狹地，望見了一行漁船，見到這兒惠爾區池碼頭以及東港碼頭上的人時，我心中想在此地的這種迎接，正是可能發生的世界各國之間友好的最好的榜樣……」

『我希望，同時相信如果世界繼續和平，世界各國將以美國和加拿大的榜樣為模範，那麼在今後三年中，我將能再度來此渡一個假期。』

從一九二一年八月以來，羅斯福沒有能到坎普貝羅來。現在，在華盛頓那緊張的一百天之後，他又回到在梅因海岸外的加拿大小島上，他在這兒得到了克服自己未來生活中的恐懼的機會，在這兒，他學得了力量和意志，自信以及確信將能為同胞們克服另一個恐懼的教訓。在一個偉人生活中，沒有比這更令人難忘，更感到溫存的偶然事件了。

第十三章

筆也許比刀更有力量，但是由一位富蘭克林·D·羅斯福說出來的字句，是無可與之相匹敵的。歷史上從沒有見過有像一九三六年大選時那樣足以表示對自信力的反應的數字過。

在大選前一天晚上，他對數百萬聽眾廣播時說：『在世界某些地方，正起伏着反民主政治的波濤』。

「但是我們的信仰是堅定的。我們由於經驗教訓而更加信任民主政治……當你
我明天排了隊靜候投票時，我們像是排在一條橫貫我國歷史的陣綫上。這條綫上有
華盛頓，有傑佛遜，傑克遜和林肯。後來又有克里芙蘭，西沃圖·羅斯福和烏德羅
·威爾遜。他們，在他們那時，也靜候着他們投票的時機。和他們並列——和他們
一樣地投票的——是無窮的美國公民，他們雖然在歷史上沒有留下名姓，但他們所
投的票却造成了歷史……」

在過去，每一位曾經投過票的男女，在製造未來的美國史過程中，都曾經出過一手之力……

你們明天到票櫃前面去時，不要害怕，該爲你想像中所需要的最好的世界投一票。」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美國人民對他的回答是羅斯福以二七·三七六·六七三票壓倒他共和黨對手，坎薩斯的阿爾法萊特·M·藍敦州長。在選舉人團（包括各州全部總統選舉人在內）中，四十六州投選羅斯福，祇有梅因和伐蒙特投選藍敦。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那年在克利夫蘭舉行，他們注意於各種演說或意見所引起的熱烈讚美，却沒注意到美國的脈搏如何。

藍敦州長和芝加哥日報發行人，被選爲副總統候選人的法蘭克·諾克斯上校開始在台上作勇敢的斷言時，全場情緒非常沸騰：

『美國正在危險中。美國的男男女女以來未來的子孫們都在危險中。我們要獻身以保持他們的政治自由，個人機會，以及他們作爲自由公民的素質，這些東西現

在都受了政府的威脅。」

這是保守主義對「百日」立法所作的抗議。這是保守主義對最高法院法官們所表示的感謝——他們常以六對三的多數說新法案不合憲法。這是保守主義表示美國民主政治可以在二十世紀時站在一邊，到二十一世紀時再來領導的說法。

六月二十七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菲拉台爾菲亞開會時，大家一致推羅斯福爲總統候選人，他對談政治自由和自由公民的共和黨候選人反駁道：

「自由一詞……表示出從某一限制力量中解放出來的意思。一七七六年時我們要從自英國皇室中獲得特權的保皇黨手中取得自由……」

「……在現代文明中，經濟保皇黨們鑄成了各種新的皇朝。新的皇室建立在集中統制一切物資的手段上。通過運用會社，銀行，工農業新機構，勞力和資本——這些是祖先們夢想不到的——等等新方法，現代生活的全部機構已經被迫從事這種忠誠的服役了。」

「在這種忠誠之下，凡是想運用美國體系以求發展而得利益的千百小企業者和

商人們，全無插足餘地。他們和工人農民們一樣，得不到什麼自由……

「一位英國法官有一次說過：『有需要的人並不是自由的人。』自由需要謀生的機會——這種生應該和時代的標準相合，這種生非但使人可以得到生存所依的充分東西，並且要有所以生存的理由。

「因為在經濟的不平等之下，我們所爭取到的政治平等是毫無意義的。一小集團的人已經完全操縱了別人的產業，金錢，勞力——生命。我們很多人已經不再自由了；自由已經不再存在了；人們不再能追逐快樂了。

「美國公民爲了反對這一類經濟暴政，祇有仰賴於政府有組織的力量。一九二九年的崩潰已經顯示出專制主義的面目了。……

「這些經濟保皇派們指責說我們在推翻美國的組織。他們所真正抱怨的乃是因爲我們在奪回他們的權力。我們爲了忠於美國的組織而必須推翻這種權力……

「這（三）數年來的失敗和勝利，使作爲人民的我們對政府和我們自己有一種新的了解。從昔日新英格蘭會議以來，關於政府事務，從沒有如此廣泛地被討論，如此清楚地被了解過……

「政府會有錯誤的，總統也會有錯誤的，但是不朽的但丁告訴我們說公平之神對冷血者所犯的罪以及熱心者所犯的罪會給予不同的權衡尺度的。」

「人類事業中有一個神祕的圈子。對某幾代人們所給予的很多，另有幾代的人們却企盼很多，這一代的美國人們有一個固定的命運。」

「在我們這一世界上的其它土地上，有許多人民在過去爲自由鬥爭而生存，現在似乎對這種鬥爭有點倦怠了。他們爲了生存的幻想而出賣了他們自由的遺業，他們已經放棄了民主政治。」

「我相信祇有我們的成功才能再度激起他們遠古的希望。他們開始知道在美國，我們正在進行一個偉大而成功的戰爭。這非但是對需求以及經濟破產的戰爭。它的意義比這點更爲重大：這是民主政治生存的鬥爭。我們是爲我們自己以及全世界進行一個拯救一個偉大可貴的政府形式的戰爭。」

「我接受你們給我的使命。我和你們攜手。戰爭一日不止，我永遠不退伍。」

在此，我們且看看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其它各地」的情形。

墨索里尼正勸史乞斯在尼格和希特勒締訂和奧國前途有關的協定。那時是黑衣首相侵略阿比西尼亞之後兩個月，義大利代表們正退出國際聯盟。在一個月之中，佛朗哥將軍在德義允諾支助之下，飛去任摩洛哥軍領袖而發動內戰。在希臘，米泰克斯將軍在五星期前正發動他的政變。德國正在捷克斯拉夫製造糾擾。在德國，希姆萊被任爲警察首領，希特勒青年團効忠誓文中已經規定拯救希特勒就是救德國，救德國就是救上帝。

羅斯福獲得多數票時，正足以表示在幾百萬人看來，他是在垂死的民主世界中唯一的美國民主者，而他的對手們却說他在大選中利用了國會通過的救濟基金來運動賄賂選舉人們。

但是，如果美國不願消滅，那麼它必須有一個新政。在政治思想上，羅斯福並沒有什麼新貢獻。羅斯福並不因爲能立新法，行新法而成爲偉人，他之所以能和華盛頓，傑佛遜，傑克遜，林肯等同列爲偉大總統者，因爲他是他國家命運的工具，而且能在國家發展中的危急時期表現出美國精神來。美國人民對羅斯福愛戴已極，羅斯福的受人歡迎是很自然的。他的敵人始終利用這一點來尋覓他的缺點。他們却沒看到一個人越受人

歡迎，越不致因此而失敗。威爾遜從沒有受人歡迎過。因此當他一度受羣衆熱烈歡迎時，立刻就失敗了，雖然他認出羣衆是非常浮動的。理由是他不愛人民本身，因此他得到了最壞的結果。羅斯福愛人民，這是他們所以愛他的理由。而且，他們正如他母親似地，以有他爲榮。而且，他們又怎能不如此呢？無論對他母親或對人民們，想引起一種沒理性的愛好是不可能的。他的敵人們說他在摧毀美國主義，這話有點酸意，因爲他們不得不承認他是代表美國主義的一朵美葩。他們認爲他犯了不少罪過，他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從巡洋艦「印第安諾坡里斯」號上打給在倫敦開會的經濟會議的一通無綫電報，使他認爲他太不重視金錢了：

「如果這爲了要使所有國家得到更真切永久的經濟安全，得到更大的繁榮而召集的各國大會（它應該努力考慮各種大問題）的精力完全集中於有關少數國家的貨幣交換等非常虛偽而且很暫時性的提議上，我就認爲這是一個世界大悲劇的頂點。

大總統這種侃侃之談，當時在英國頗感受窘。但是一九三三年七月送出這一段無綫電消息的人，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却將租借法案提供給國會中。」

有關重要的是當醫師使這病人雙腿復元時，他相信這位病人的責任是要以他新的精力來爲世界謀利，拯救人類民主的未來。這樣，命定了當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任修身元首時，他的權力已受到一位在那天快過五十一歲生辰的人物的限制。這樣，當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醒來時，他在那一早晨已經爲一位在新選舉中得勝，還熟睡着的人所打敗了，那位人物遠隔重洋，正在一天之前，爲民主政治獲得了勝利。

羅斯福從沒有鼓勵人們相信在未來的怒潮中他們可以乘方舟飄於世外。也許我們可以說他熱烈地希望可以避免戰爭，但是他從不使這種熱情的希望壓倒了理知，而在希特勒把握全權時，他是否以爲戰爭可以避免，這倒是個疑問。很自然地，當危難之機來臨時，他對美國人民加強地說他們可能被一個勝利的德國所打垮；但是他那不肯袖手旁觀而要摩挲擦掌的神態，却使他的對手們說他是在製造戰爭。美國的孤立者的態度，基本上和不列顛的妥協者態度相似。它是貪圖和平而不是想得到和平的一種理想。兩者都沒有看到那時受威脅的不是殖民地，原料及商業優勢，而是全人類精神和物質的未來命運。一直到很久之後，美國和英國才爲民主政治的未來所困惑，威爾遜曾經請美國人民

爲民主政治的安全來反抗德國軍國主義；但是在戰爭結束後，他的話就像大戰中很多的口號一樣地被看作一個推銷員的語言。

邱吉爾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之後，羅斯福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之後，都因爲他們在對付軸心侵略行爲上的正確判斷而接受了統率一切的特權。也許日後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兩位人物出衆的成功還不止是因爲他們在戰略上的遠見。羅斯福的成名也許是因爲他能在歷年來陷入危機中的政治觀念中灌注以新的生命；邱吉爾的聲名成立也許是因爲他在開始時已經覺得如果不是由英美共同得到的勝利，那種勝利是沒有價值的。

羅斯福能給民主政治以它所需的不顧生命的熱狂。在基本上說來，他的民主政治觀念乃是一種黃金律，或者是爲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人類在追求快樂時所採的途徑自然是因時因地而有變更的，羅斯福對快樂的觀念是受二十世紀初期他同胞們的生活水準所影響的。自一九三三年之後，他最大的問題是要同胞們相信祇有多少犧牲一點他們保有的美國個人主義，才能得到他們所要的快樂。而值得注意的是最個人主義化的人們正是最孤立的人們。

人類因爲印刷，蒸汽動力，以及內燃引擎之發明，是否得到更多的快樂，這

疑問。上帝不使人停留在一個階段中，這是沒有疑問的。亞當和夏娃犧牲一切而發現了這件事。

如果羅斯福早十年出世，他也許年紀太大而不能發現過去該向時代屈服的種種東西了；如果他遲出十年，他又太年輕而無法了解該保存的一些過去的事物了。他的力量就在於他之不爲許多阻滯他個人雄心的小事件所沮染。他需要權力，並不是爲他自己而是爲別人。他的目的在成爲他衷心愛護的老美國的代表而並非一個新美國的作者；但是他要求全國樂於接受時代所給予他們的責任。

新政無疑地使美國人感到了不安，但是它還給予了許多並不引起不安的新藥。現在我們所想的是一個世界的新政，我們可能也會感到它所引起的不安的。

不論一九四一年時，世界大戰爆發與否，世界在一九三九年時將重返於經濟恐慌之中，這是一定的。兩次戰爭可以說都是一些外科醫生們急於想治好病人的結果，這些醫生們沒有診斷能力，一味亂割病人主要器官和分解他的肢體。經濟恐慌原因在生產能力

進展太快，無法使分配及消費能力相協調。世界的財富成了一個癩，亂動亂診會引起生命的危險。現在割癩的刀已經安在癩上，可是病人已經有力竭而死的危險了。在和平來到時，他已經奄奄一息了。

羅斯福在這時是否還有對付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美國那種困難情形的勇氣，自信，廣泛的同情和忠誠信仰來給於民主政治呢？

這是加在一個人身上的可怕的責任，但是在美國，祇有這一位領袖，才是在恐怖時期中人民所仰望的人。邱吉爾和史大林都沒有號召全球的思想或氣質。他們在一國之內，是出色的領袖。作為蘇聯人，史大林在一九三九年和德國訂約是很合理的；但是縱使蘇聯的安全因此得以保持，它總顯示出蘇聯沒有顧計到其它國家的命運。從那時起一直到今日為止，沒有絲毫的理由可以使我們相信史大林有解決蘇聯國外其它國家的困難的力量。一九四〇年的邱吉爾自稱爲是羅斯福「熱誠的隨從」，這是非凡政治家風度的表現。他天然地認爲美國人比英國人更能了解法國的觀念，因此更有處理法國關係的能力。英法相互地認爲一九四〇年的崩潰是對方的錯誤。這是實情，現在必須翻過新的一頁來，而翻這一頁的手指，應該是美國的大總統。

邱吉爾能冒險觸犯英國式的本性在卡薩布蘭卡和羅斯福安排一切，這也許因為他有一半美國血統的關係。然而從一切證明上看來，這兩位領袖非常協調，而且所提的意見並不太過於積極。

世界的未來形式，在殘垣斷牆以及國破家亡的情形中還未能看出究竟。但是我們現在，該準備恢復世界和平了。大西洋憲章並不是在聖詹姆斯公園的池上草訂的。對現在的世界的形成，孤立主義，自由貿易以及妥協主義都各有它的貢獻，因此英美人民都須負起因罪過而引起的責任。

凡是有學識的人，都會看到要規定一個恢復世界秩序的計劃，必須有中國和蘇聯的合作。同時也得記住其它較小國家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民主政治的意思是說人民大眾可以發言以統治一切；它並不是說由一個要求有表現民主政治的特權的一派政治思想來統治一切。當戰爭過去，和平開始時，真正民主政治已經受到深刻的威脅。

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新政治家」上有一段文字正足以表示不少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們所感到的驚奇：

「蘇聯沒有代表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這反映出一個嚴重的危險，史大林可能

認爲盟國干涉巴爾幹，是一種對蘇聯勢力的排斥，要把它排斥於一個人民不傾心於西方民主國家而傾心於蘇聯的地區之外的企圖……這種懷疑已經因爲北非種種事件之發生而增加：達爾蘭之任命完全是一種軍事上的便利。派出各式的，不足以代表而且很可疑的人物如達爾蘭，奧都等人物出現在東南歐洲各種政府中，這像是國務院一種有意安排好的政策。……比國務院更熟悉這許多事件的外交部，很明白這許多計劃中的愚蠢處。……

「羅斯福總統使人驚奇地說這是一種『非常的會晤』，他是這樣來敘述吉樂德將軍所提出的「解釋」的，他這種解釋是非常神祕的。他問爲什麼他自己不能洗刷他治權中的維琪份子？回答是很簡單的，現在不論過去態度如何，每一個有「才能的」的人必須來支持反對軸心的軍事行動……戰後華爾街也許要和歐洲大陸恢復商業交往……羅斯福總統要爲吉樂德將軍所表示的政策作門面，這祇是另一個表示出民主黨內反動勢力的力量的不安的證明。反對新政的南方民主黨人是羅斯福所以獲得多數人擁護的主因，他們是支持赫爾先生和威爾斯先生。」

如果上述的話合理地支持了史大林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的行爲，那麼他將成爲另一個賴伐爾了，而邱吉爾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對史大林的態度，也將成爲爲便利計而求取的可恥的行爲了。但是在此我們最好把邏輯放在一邊，而以邱吉爾先生的詞令和希特勒進攻蘇聯時法，英，美的共產黨人們在智力上所完成的輕巧行動爲滿意，那時他們從對帝國主義之戰所取的怠工情形中一轉而取積極態度，這不是很令人滿意的嗎？

因此，很明顯地，當我們要在和平的巨桌前把一個令人迷惑的七巧圖拚合起來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眼光遠大的人，勢力廣泛的人來指導，這人既不受右傾沙漠的迷惑，又不爲左傾奇山的眩迷。在這一巨大的鬥爭沒有解決時，解決糾紛的理想人物就是羅斯福。他是一位對任何理論，任何數條，任何主義，任何人種，都不存一點偏見的政治家。

第十四章

一九二〇年羅斯福在副總統競選失敗時，曾經贊成並鼓吹美國參加國際聯盟；但是他在演說中從沒有附和着說國聯的法規乃是一種實驗性的東西。那時他和現在一樣，並不是教條主義者。他認為國聯是到正確方向去的機構，但並不是通天堂的梯子。在此地沒有浪費字句來敘述一九二〇年時可能發生諸事件的必要。現在我們所以提到國際聯盟，目的在使讀者知道羅斯福並不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破殘的觀念上飄下來的一片碎塊，飄到風雨不息的第二次大戰的岸邊而爆發了。從任何方面說來，一九二〇年之後一年中，他已經退出政治圈外，在美國國外，沒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三十年代中，當邱吉爾正努力鍛鍊國會中的意見，使它能對付不可避免的德國的挑釁時，羅斯福正專心於國內經濟困難及社會改革諸複雜問題而無力注意歐洲情形。即使他有兼顧之心，也難分兼顧之力。英國人民對希特勒惡勢力所能引起的情形，還不能想像到，美國人民對它自然更加茫然了。想起當時情形，使人覺得非常富於諷刺氣息；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有一次廣播中說將來火星中會突然有人下來進攻國防軍，這話使新澤西和紐約二州的人們大爲恐慌，而在早一個月時，納粹從紐倫堡方面廣播却說希特勒對捷克斯拉夫的威脅，祇引起小小的驚奇而已。不過，這倒是事實情形。

羅斯福在自己任大總統時也許並沒有看到和他同時任德國元首的希特勒對人類未來發展可能有什麼影響。他並不是預言家；他是在人衆前前進的人。而且，他天然地是一位樂觀者，而且我們可能想像他是真正相信自己能夠使美國站在戰爭之外的。

一九三三年，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道：

「在世界政治方面，我要將這個國家供獻給良好鄰國的政策上——供獻給堅決地尊重本身權利，因而也尊敬別人權利的國家——和尊敬它本身義務，以及尊敬它和世界各鄰國訂定諸條約的國家爲伍。」

但是當時這位演說者並不知道這任務是比一切更爲莊嚴遠大的任務，而美國人民却正因爲面對着其它種種任務的威脅，忽略了這一任務，因此阻礙了美國外交凡八年之久。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大總統在對國會報告中說道：

「不幸的是關於世界局勢方面，我不能對你們報告一個完全樂觀的情形。

「合衆國的代表和其它美洲共和國的代表們密切合作，會於蒙特維地奧，使會議完滿成功。我深望我們能使鄰國們明白我們正和他們共同努力來避免未來的土地擴充和干涉他國內政等情事的發生。而且，我們都在覓取復興商業的途徑，以爲建立互惠的貿易平衡的張本。

「但是在其它地方，人們深懼侵略即將到來，因而不斷擴張軍備，繼續建立商業壁壘以阻止任何和平進展及貿易協定。我曾經說美國不能參加與歐洲有關之政治設施，但在任何時期，我們都願和世界各國合作，採取實際方法以減縮軍備並壓低阻礙商業發展之壁壘。

「關於其它國家之政府、人民所欠我們政府及人民的債務情形，我希望對各位有所報告。承認這種債務的若干國家，已經償付了一小部份；其它國家則無法償付。有一個國家——芬蘭，已經償還了全部債款。」

除了一種好意的自由主義外，這段話中並沒有其它表示。戰爭在普通常識判斷下，似乎還是可以避免的。人道的生活方式，似乎還沒有受到威脅。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總統在對國會報告時，這樣說道：

『我不能公平地告訴各位說在美國境外的國際關係已經改進了。在事物表面上看來，有許多舊的妬忌，舊的忿恨又激揚起來了；在不少地方，爲爭取武備和權力的鬥爭，又重新抬起它們醜惡的面目來了。我深願平心靜氣的商議，使有建立性的領袖地位可以給我們以安全的勢力和充分的時間，使全世界各地可以出現新的、更實際的代表政府，在那一局局面下，特權和勢力將削減，全世界的利益將提高。』

『但是，我深信我們的和平睦鄰態度是將爲世人了解而贊成的。維持國際和平是我們深誠無私地關切的任務。我們力求避免武裝衝突的堅決而不可否認的希望，最近有不少實據可以爲之證明。』

『我們和他國和平相處，這是不容懷疑的事。同時，多數國家的人民們，正在覓取如何從誇大詭說軍備不能減縮是受國際局勢限制的論調中解放出來的途徑，這也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歐洲在當時似乎還在遙遠的地方。好意的自由主義並沒起什麼作用；但是在一九三五年那篇報告的結尾，却是出於感謝上蒼的熱忱，感謝上蒼使過去一年中美國人民有所

建樹，這話是有一點生氣的：

「我對未來一年中抱有堅強的希望，這並不是因為受了空洞的樂觀主義的推動。如果我們有願心，我們能使一九三五年成爲一個善感滋生的時期，受着一種有目的的進展的支持。除了物質上的復蘇之外，我已經預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復蘇。美國人民將空前地轉向一種不受生活中物質目的所局限的永久價值上去。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到關於這一方面的信號。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我們感到了上蒼的力量，它常常給這個國家以指導和關注。」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大總統對國會作每年一度的報告時這樣說道：

「美國的睦隣政策已經不再是一種希望，不再是一種還待完成的目的了。它是一種積極，即時而有效力的事實。在這一成功之中，每一個美洲國家都要參予了解。現在沒有戰爭，沒有關於戰爭的謠言，或關於戰爭的希望。在這一廣泛區域內的衆多人口，有兩億五千萬強，散佈在起自北極，直達南極的地區中，相信並且要奉行這種睦隣政策。他們全心全意地希望世界上其餘人民都能作同樣的行爲。」

談到世界上其餘的人們——啊！現在正有着一種摩擦。

「要是我今天是在對美國人民作一篇就職演說的話，我不能在一段話中敘述出我對世界事務的評斷。十分抱歉的是我不得不對世界事務多作敘述。就從一九三三年那個夏天起，歐洲及亞洲許多人民的領袖們的脾氣和目的既不是向和平，亦不是向促進人類善意的途徑上發展的。在這一時期內，非但和平和人類的善意離這一區域日漸疎遠，而且現在已經到了美國人民必須認清：怨恨日漸滋長，侵略形勢日漸明顯，軍備擴充的這種局面——這種局面有很多是足以引起普遍戰爭的原素。」

「在其它大陸上有許多國家，特別是較小的國家，如果要他們能自己作主的話，他們一定非常自足於已有的疆土，願意由他們自己，或者和隣國們合作，來解決個別的經濟和社會上種種問題。這些國家的統治者們，心中深深地服從人民的和平和理智的情緒。這些統治者們，必須不斷警覺着，要對付今日或明日可能由那些不能以和平方法來改進人類生活的其它人民的統治者們所發動的侵略或進攻。」

「在那些在今日必須負起破壞和平的責任的各國中，有着的是什麼希望呢？至少，有着悲觀主義存在。我們或其它國家的人民來空說這些受專制主義和侵略主義雙重精神統治着的國家中的人民大眾並不同情於他們的統治者，說他們沒有表白自

己的機會，說他們如果可能，一定會改變事物的，這種說法是徒然的。

「這是很不幸的，它並不清楚。我們可以說，如果那些國家的人民大眾們能像我們所了解的民主政府下所有的自由和一切民主手段，他們是可能變更現有的政策和政府的。但是他們沒有這種權利；他們祇能被迫盲目瘋狂地隨着一心尋求專制權柄的領導者前進。

「企望擴展，企望改正前次戰爭所造成種種不公平情形，企望覓取貿易出口，企望覓取過剩人口的出路，甚至企望對文明進化作一點和平貢獻的國家，都沒有表示出它們具有願以和平談判或呼籲人類正義本性來達到它們有理由合法的種種目的所需的耐心。

「因此，它們不耐地返求於昔日武力的法則，或者轉向一種瘋狂的觀念，認為他們是完成一種使命的特殊人物，世界上其它人民們都該受他們的支配。

「我知道，同時你們也會知道我所仔細選擇了的這些字句，不會適合於其它國家的胃口的。但是，這種情緒，將在這些國家中得到同情和了解，在這些國家中的人民們，都渴望着和平，但是在今日歐亞關係的複雜變化奇景中，他們却是隨流更

改着自己的位置。因為愛好和平的國家——這世界上有不少這樣的國家，總以為他們的存在，有賴於他們的行動，有賴於他們在國際政治大棋盤上的行動……

「對任何參加與美國沒有密切關係的戰爭的各國，美國採取一種明確不變的政策，它將取雙重的中立地位。第一，我們不使交戰雙方從美國得到武器彈藥以鼓勵他們繼續作戰。第二，我們要使足資交戰雙方進行戰爭的物資不致超過平時數量地由美國運出去。」

「我對各位已經加強敘述過世界人民所面對的嚴重情形。這種加強是應該的，因為這對文明以及美國的關係很重大。和平是為少數人所破壞的，不是多數人所破壞的。和平是受那些覓取一己私利的人們所威脅的。世界現在所見到的和以前許多世紀十分相似——那時小王室和封建公候們每二十天使歐洲地圖改變一次顏色，那時各大帝王們努力瘋狂地爭取殖民帝國。」

「我們希望我們現在並沒有再度走到這種世紀的門前。但是如果我們必須走上這一步，那麼美國和美國人民要担任的任務祇有一件：通過非常完善的中立，我們不鼓勵別人鬥爭；由於適當的防守力量，我們使自己不致受別人的攻擊；同時我們

以一切榜樣，一切合法的鼓勵和協助，使其它國家回復到和平和友好的情誼中去。

「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使我們知道在世界事務中，專制主義使世界和平岌岌可危，這種威脅並不是由愛好民主思想的國家中發生的。如果在世界事件中這一點是正確無誤的，那麼在決定國內政策時，我們將加之以最大的重量。」

很明顯地，總統在這次演說中，比上次更爲着重於國外事件。看來到那時爲止，他對於希特勒勢力的真正危險性，還沒有完全了解。他所見到的還祇是專制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對立而已。他似乎還沒有看到希特勒的崛起乃是一個病毒已深的民族精神的表記。

總統不斷地以歐洲專制主義之復活作爲對美國人民的警戒，使他們知道財政和工業集團對他們的統治，也會走上同樣的道路；但是事實上他沒法作有效的比較。對國內和國外事件中，他依舊表現着自己善意的自由主義，他這樣的作風，無意地使希特勒以爲美國民主政治和英國民主政治一樣，對他那樣的擴充勢力，並不問聞。

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總統對國會的演說中，幾乎沒有暗示到國外事件的內涵意義，他說：「在寡頭政府之下，軍國主義向前挺進，在民主國家之中，軍國主義却不爲滅

我們無法不相信當羅斯福大總統競選勝利之後，一心想和美國最高法院相鬥爭，因為他那時覺得它是非常危險的寡頭政治。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總統發表第二次就職演說時，也沒有提到國外事件，直到十月三日他在芝加哥時才說：

「可是我和你們現在都被迫不得不向前瞻望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人口的和平，自由和安全已經為其餘百分之十的人們所搖撼，這百分之十的人們將要摧毀一切國際秩序和法律。當然，那希望在世界公認的法律和道德水準下過和平生活的百分之九十的人們，能夠而且必須覓取使他們的意志存在的途徑。

「目前情形是和全世界有關的。這裏所包括的各種問題非但和許多特殊條約中的特別規定有所抵觸；它們乃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是國際法律以及人道原則的問題。當然，它們對條約極為抵觸，特別是對國際聯盟公約，對白里安——凱洛格協約以及九國公約，可以說是最大的抵觸。而且它們也包括了世界經濟，安全和人道的種種問題。世界的道德良知必須承認消除不公平以及苦惱的原因；但同時我們必

須認識尊重條約的神聖，尊重別人的權利和自由，而阻止一切國際侵略之行動。

「當疾病普遍傳染時，人們同意集體對病人實行防疫工作，以保持這一集團的健康而阻止疾病之傳播。」

這一篇世人所知的『防疫演詞』，在美國使人們大為詫異。第二天在記者招待會上，總統爲記者們所困，他們都想看看總統究竟是否有意背叛中立法案。恩斯特·K林德萊對這一點特別留意：

林德萊：那麼，你說你的大綱對中立法案並沒有什麼衝突。在我看來，這兩點似乎是相對立的，你的話還沒能給我一點啓示。

總統：恩斯特，你仔細想想吧。

林德萊：我想了好幾年了。它們像是在南北兩極似地對立着，你要和一集團的國家站在一綫上，這怎麼能使你保持中立呢？

但是，總統雖然激起了孤立主義者的驚訝，他却毫無困難地使國會接受他所提出的

龐大的海軍計劃；不論他的防疫演說在當時引起怎樣的批評，但是那年十月時他在芝加哥說的一句話却成了時代的燈塔：

「我們千萬別懷着幻想以爲美國可以逃避劫數，以爲美國可以得天之憐，以爲這西半球不致被攻擊，以爲它可以安靜而和平地推行倫理和文明的藝術。」

我們在以前曾說過羅斯福並不是一個大預言家；但是他預見到未來的一切，這種眼光不是深刻的觀察家是不會具有的。

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總統在對國會的每年演說中並沒有提到國外事件，不過祇籠統地表示出美國對和平的愛好，這一點可以從一二週以前美國接受日本對轟炸巴納號一事道歉上得到證明。那時美國在遠東對日本的妥協政策，似乎將隨英國在歐洲對德國的妥協政策之後而發展。而無疑的是當時兩國人民對這種政策一定很感激。但是，總統在一月六日對議院議長提出一封信，其中却要求修正憲法中規定『在宣戰前』必須參照人民投票的條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前，憲法上多了這一修正案，我們倒可以看出美國人民對憲法是否忠誠了。

在現在看來，當時總統對希特勒提出的兩個願請，和對墨索里尼提出的私人願請，似乎有點像與虎謀皮。那時他能作的唯一實際貢獻祇有一件，那就是他私人努力來完成一個最後協定。但那像是一件義務，而美國輿論對任何義務都是反對的。

十一月十五日，當總統聽見在巴黎一個德國隨員被一個青年猶太人所刺死而發生的糾紛之後，他在第五百次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了他對自己的端正態度受阻遏後心中的感想：

「前幾天中從德國傳來的消息，使美國輿論深為震驚：我自己都難以相信在二十世紀的文明中竟會有這種種事情發生。」

而當他按例在溫泉參加感恩節宴會時，他在廣播中讀了溫泉基金資助人之一，美國幽默滑稽明星埃第·康脫的電報，他說它『表示出我們所懷的同樣思想』：電報上這樣寫：

『祝您和您家人們有一個愉快的感恩節。我非常感激，因為我能生在這樣一個國家中，這國家的領袖們在感恩節時可以安心坐下來割火雞，不必問如何割一個國家的事。』

讀者們一頁又一頁地看過了羅斯福大總統在各種場合中所說的話，會覺得他是很易激動，但是很難找到表示他這種激動的字句，要等到他抓住一點『秘密』後，他可以立刻流露出他對人性的忠信，希望，和慈善的心情。

『防疫演詞』就是他流露心意的一段話，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他在翁他利奧的金斯頓說：『加拿大是不列顛帝國姐妹之邦。我可以對你們保證，如果加拿大受另一帝國之威脅時，美國人民絕不會袖手旁觀的，』這又是一段他流露心意的話。

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總統對國會報告時說：

『使全球可能捲入火燄中的戰爭威脅已經過去了；但是和平還沒有真正的保障。

『在我們週圍激起了——軍事上和經濟上的——不宣之戰。在我們週圍，各國都大量生產——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武器。

海外來的暴風雨現在直接打擊了美國人民所不可少的三種機構。第一就是宗教。它是……其它兩者——民主和國際親善信誼的源泉。

『宗教教導了人們，使他們了解他們和上帝之間的關係，使各個人尊重自己的

尊嚴，同時教他尊重他的鄰友們，正如尊重他自己一樣。

「民主政治是自治政府的實踐，它是要自由人們尊重同儕之權利和自由的，一種契約。」

「國際親善信誼是和民主政治並行的，它是由文明國家的人民們尊重其它國家人民之權利和自由的志願中產生出來的。」

「在現代文明中，這三者——宗教，民主政治和國際親善信誼是互相輔成，互相支持着的。」

「凡是對宗教信仰自由進行攻擊，這種攻擊的來源都是和民主政治相違背的。凡是民主政治被推翻的地方，信教自由絕不存在。而當宗教和民主政治滅絕時，國際關係中的忠誠和理智都會消滅而為熾烈的野心和野蠻勢力所取代。」

「一個社會秩序中排斥了宗教，民主和國際間的忠信，它無法合於和平的需要。美國反對這種秩序而堅持它昔日的信仰。」

「在人類生活中必定有這樣一個時期來臨，在那時，他們非但要準備防衛他們的家園，並且要防衛他們的教會和政府所依存以及他們的文明所根據的信仰和人造。」

防衛宗教、防衛民主、防衛國際間的忠信，這是三位一體的鬥爭。爲了拯救其中之一，我們必須同時拯救三者：

「我以前曾經說過這一代美國人命定了要肩負重大的責任。這話現在逐漸證實了。上天賦予我們的很多，希冀於我們的也很大。

「這一代美國人民將「光榮地拯救了世界最後的高尚希望」不然就將「恥辱地喪失這種希望。」：方法是簡潔，和平，慷慨而公正的——這是我們一旦採取之後，必將爲世界所稱道，爲上帝所賜福的。」

總統再度地爲自己和人們担負起精神上鉅大的責任。事實上命運所安排好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但是命運又是誰安排了的呢？

墨索里尼進攻阿爾巴尼亞成功後，希特勒又在他心愛的三月中進攻捷克斯拉夫。四月十四日，羅斯福決定私人寫信給希特勒，問他願否保證在至少十年以內，不侵略三十個獨立國家的土地。國務卿同時以同樣信件送給墨索里尼。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沒有直接答覆；但是在月底時分，希特勒在聽衆哄笑中，在德

國國會中對這三十個國家逐一地開着玩笑。這當然是對羅斯福私人所作的諷刺。羅斯福當時聽到了這篇廣播演說沒有呢？這是我們無法斷言的事，不過從那天起，羅斯福對希特勒的態度變成了毫不容赦的神情了。

總統第一次實際反對就是提議撤廢禁運軍火案，他知道這是德國人所計較的，因為禁運案分明是對保有強大海上力量諸國不利的。他認為如果他能完成這點，也許他可以阻止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發動戰爭的企圖。但是參議院委員會意見對他不和。七月十一日，參院委員會以十二票對十一票決定不廢除該案條文。總統和他的國務卿再度努力一次。在白宮中召集了參院首領們開會討論如何克復參院中的反對。總統竭盡所知來勸告他們，要使他們相信戰爭在夏末即將爆發。赫爾說這是必然的形勢。參議員布拉說一九三九年中不致發生戰爭，因為德國還沒有充分的準備。赫爾請他到國務院去讀一讀他得到的電報。布拉並不受什麼影響。用總統自己的話來說：「布拉參議員以為……他自己所得……關於歐洲的情報，比美國政府從歐洲得到的情報更為精確。最後，國務卿問他意思是否以為國務院所得情報不如他私人的情報，他最後說他臆測下認為是這樣的。這都是非常適於議會中的談話。」

因此，撤銷禁運軍火案的提議祇好束之高閣了，八月五日，總統不安地開始他的夏季假日。他才到海德公園時，柏林傳來消息說在幾天之前，在莫斯科的德國大使馮·德·史屈倫堡對莫洛托夫表示希特勒準備討論締結蘇德協定。五月中莫洛托夫繼李維諾夫任外交委員長時，希特勒已經建議加強兩國之貿易關係作為對英法向波蘭提出保證之對策。莫洛托夫告訴德國大使說史大林喜歡訂定政治協約而不喜歡貿易協定。那時希特勒一心希望煽動波蘭人來欺騙別國，交出『走廊』，和他一起進攻烏克蘭。據說貝克對這一陰謀計劃非常滿意；但是立刻形勢證明他沒有使人民接受這一計劃的時機。後來莫洛托夫敷衍住德國大使，而史大林則開始和英法討論反德陣綫。後面這一任務是交付給蘇維埃作戰委員長伏洛希羅夫執行，他忠誠的態度使英法駐莫斯科大使相信外間傳說史大林和希特勒有訂約可能的謠言全無根據。但是八月十六日，英法軍事代表團受伏洛希羅夫通知說如果波蘭人同意讓蘇軍進入波蘭，蘇聯將加入反希特勒陣綫。蘇德協定條文已由莫洛托夫及史屈倫堡具體草定，柏林方面於八月二十一日宣佈此一協定，在倫敦，蘇聯大使邁斯基與英美同樣地一無所知，他聲明這種宣佈乃是德國分裂英蘇的一種手段。蘇聯駐柏林大使和邁斯基一樣地皇然不知所措。

這種惡耗使總統縮短了假期。因爲最惡劣的情形隨時可以爆發。

八月二十四日他私人致函給希特勒和波蘭總統，要求他們作和平解決，同時提醒希特勒，說他沒有回答他在三月二十四日給他的信。希特勒這次以更卑鄙的謊話由德國駐華盛頓代辦回復總統。羅斯福再作一次嘗試：他的信是這樣寫的：

「現在我們還能拯救不少人的性命，如果閣下和德國政府能同意接受波蘭政府所承認的和平解決辦法，那麼現代世界各國現在還有建立和平友誼關係之基礎的希望。」

「世界人民都祈望德國也會接受這種辦法。」

就以這最後短短一句話，羅斯福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釘在德國身上，使它無法逃避。我們希望希特勒會受和平條文之壓迫，以粉刷簽字承認他的罪過。

九月三日，總統的爐邊閒話中又流露了他的情緒：

「這國家將仍爲一中立國家，不過我不能要求每位美國人在思想上保守中立。」

中立者也有考慮事實的權利。中立者不能緊閉住他的思想，抹殺他的良知。」

總統召集了特殊國會會議，要求取締中立法中禁運軍火的條文，允許美國在「現購自運」原則下售賣軍火給交戰雙方。美國船隻被禁不得在「戰鬥區」中航行。十一月三日參眾兩院中均以多數票通過廢除禁運法。然而，由於戰爭的發展形勢，美國輿論都力主不得參入戰爭之中。在東部的共和黨人們注意着總統的一言一動，滿腔懷疑，生怕他會使全國進入戰爭中以取得他第三次的連任。對英國同情心最濃的要算南方，在南部以及中西部，對戰爭的基本主張頗能了解。事實上，東部的共和黨態度正如英國保守派在慕尼黑時的氣派。產生眼光遠大，佔有絕大勢力，主張「協助盟國以防衛美國」的委員會的，乃是「孤立派」的中西部。當一九四〇年四月中德國佔取了丹麥和挪威後，華爾街的代行者「經濟商業紀事報」上首先指出德國如擊潰法國及英海軍後，必要轉向美國去。共產黨人們支持着華爾街。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一日，總統以五十艘逾齡驅逐艦交給英國以換取英國允許美國在西印度羣島上佔用某些基地之諾言，世界工業勞動者機關發表了這樣的話：

「納粹在此地！法西斯黨徒在此地！共產黨人在此地！和平主義者，孤立派，

傑霍伐派都在此地，第五縱隊到處都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從沒有陷於比今日更危急的境地中過！

「在世界上，我們現在祇剩下了一個真正的朋友——英國！她的艦隊是使我們免於失敗，奴役，姦淫和崩潰的屏障！

「醒來吧，美國，醒來！」

在那決定大運的一年中，總統領導着巨大的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民主政治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九日，他在白宮中對推他連任第三次總統——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候選人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他接受提名的演說：

「在過去七年中，美國政府曾公開以種種和平方法反對獨裁形式政府之擴展。如果在來年一月中我們的政府轉入另一雙手——一隻沒有經驗的手中，我們唯有希望並且祈禱他不致和任何地方（包括此地）企圖破壞一切民主政治的人們妥協。

「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在戰爭未起時一直到最後一秒鐘，努力阻止它，並且竭力限制受災區域的擴展。我還堅持着赫爾國務卿和我時常表示的，對一切侵略行為

斥責——它們消滅了愛好自由，追求和平的古老國家，這些國家是努力保持中立的。我對一切反抗這種侵略的自由人民的同情並不稍減，對他們的物質援助我也不稍吝惜。我時常提醒這個國家，要它警覺着我們和我們所貴重的東西所受的威脅，這種努力，在我毫不感到有所遺憾。

「我在妥協的第五縱隊們面前追求這種努力，他們都說我瘋狂，說我在製造戰爭。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是我簡單，樸實，無可避免的責任，我應該使國人們警覺到迷漫全球的新勢力的危險。

「祇要我在任總統期內，我將盡一切力量担保這種外交政策永久不變。

「我努力維持，使這個國家保持和平，同時使它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有應付萬一的準備，這些工作，完全由國人來判斷。

「我們現在要作歷史上重大的選擇。

「這非但是人民政府和獨裁政府之間的選擇。

「這非但是自由和奴役之間的選擇。

「這非但是前進和後退之間的選擇。

「這是把這一切混合在一起的選擇。

「這是我們所熟悉的文明的持續，對我們所寶貴的一切的全部被摧毀之間的選擇——是宗教對無神論調，是公正的思想對強力的控制；是道德對槍砲；是敢說敢行的勇氣對妥協的虛偽的催眠調的選擇。

「而我們都常聽說自私和貪心的人民不能獲得自由的。

「美國人民必須決定，看這些事物是否值得他們犧牲金錢、精力、和自己。他們不能單從聽到的話，看到的諾言、解釋和要求來作他們的決定。他們要從紀錄——已經完成的紀錄——上來決定。」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偉大的民主政治國家竟以五百萬多數票決定把國事依舊交給富蘭克林·D·羅斯福。

九天前，有一個小國在歷史上失望的傾刻中，決定在世界民主政治中和英國並肩為世界自由而戰：

「和全世界自由生活的人民對立的一個國家的軍力，已經被阻抑在我們的海岸邊。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在大西洋彼岸已經受英國人和希臘人的阻抑了。」

這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個星期天的黃昏，總統在白宮中論國家安全時發表的爐邊閒話中的一段話。

當大西洋這邊發表這篇爐邊閒話時，在大西洋彼岸，德國的燃燒彈正拋落在倫敦市上。作者當時在被轟炸的環境中聽到遠隔重洋傳來的語聲，覺得它有如海浪之聲那樣有力，有如自由的樂曲，它啓示了英國深沉的情緒：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兩個歐洲的強國和一個亞洲的強國在柏林簽訂了一個協定，它們聯合起來對美國威脅，如果美國干涉或阻抑這三國的擴張計劃——一個統治全球的計劃——它們將聯合起來共同對付美國。」

「德國的納粹統治者們已經明白昭示出他們的意向，他們要統制自己一國的生活和思想，也要奴役全歐洲，然後利用歐洲資源來統治全世界。」

「兩週以前，他們的主子這樣說過：『現在有兩個互相對立的世界。』然後在

回答對敵時，他這樣說道：「別人說得對：在這一世界上我們不能和人妥協，我能擊潰世界上任何強國。」納粹的領袖是這樣說的。

「換言之，軸心們非但承認，並且進而宣稱他們的政府哲學和我們的政府哲學之間是沒有和平可言的……」

「過去兩年的經驗，使我們知道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和納粹妥協的。沒有人能用手撫摸而使猛虎變成小貓的。對殘暴忍心的人是沒有妥協可言的。和一個燃燒彈講理性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如果不全盤投降，就無法和納粹妥協。」

「義大利的人民們也被迫成了納粹的附庸；不過現在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盟國幾時把他們交付給死亡……」

「由於美國的重整軍備，以及竭盡一切力量把可能輸出的軍火供給前線的防衛者們，這些措置使民主政治在對征服世界者的鬥爭中得到絕大的幫助，它必須得到更大的幫助。我們這樣做，正如接近德國的瑞典，蘇聯及其它國家以鋼鐵，石油及其它作戰物資運送給德國一樣，並不能說是放棄了中立地位……」

「我們必須是民主政治的大兵工廠。在我們看來，這時期是和戰爭一樣的緊急」

。我們必須以戰爭時我們所有的決心，緊張情緒，愛國心，和犧牲精神來從事我們的工作……

「我們協助大不列顛的決心絕對不受任何阻抑。任何獨裁者或獨裁者們的集團，都不能用他們的力量來威脅我們這一決心。

「不列顛從英勇的希臘軍隊，以及全部流亡政府的力量中得到了非常有價值的軍事協助。他們的力量是日漸增長着的。這種力量乃是寶貴自由更甚於寶貴生命的男男女女們的力量。

「我相信軸心國家不會勝利。」

總統這樣地使人民們有了準備之後，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對國會年報時，他提出了租借法案：

「我請求國會給予製造各種軍火和戰爭物資的權柄和充分的金錢，使我們可以將大量軍火物資轉予現在和侵略國家作戰的各國。

「我們最有效最急切的任務就是要為他們，也是為我們自己作一個大兵工廠的

工作。他們不需要人力，他們需要值千億萬元的防衛武器。

「他們無法以現款換取這些物資的時日快到了。我們不能也不會告訴他們說因爲他們目前無法購買他們必需的武器，他們祇有投降。

「我並不是說我們要借給他們多少美金的債使他們可以用來買武器——一支必須以美金來償還的債。

「我提議使這些國家可能繼續自美國得到作戰物資，使他們的定貨單和我們的計劃相配合……

「在未來時日中，我們希望得到一個以人類四大自由爲基礎的世界。

「第一是使世界各地都有言論和表達思想的自由。

「第二是使世界各地每個人都有以他自己的方法信仰、禮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世界各地都有需求的自由——說得通俗一點，乃是一種經濟上的了解，使每一國家都能使它的人民得到正常的和平時代的生活。

「第四見世界各地都有不受恐懼的自由——說得通俗一點，乃是普遍地減宿軍備，要減縮到非常徹底，使每一國家沒有對任何鄰國進行侵略行動的能力。

「這並不是千萬年後世界的情景。這是我們這一時代這一代人所可能得到的一個世界的不變的基礎。這種世界和獨裁者們企圖用炸彈建立起來的暴政新秩序截然不同。

「自從美國有史以來，我們參於在一個變動之中——在一個和平革命之中——這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革命，在無聲無息之中，它適應着新的環境——沒有集中營，也沒有建立過戰壕。我們所尋求的乃是各自自由國家合作，共同在一個友誼文明的社會中工作着的。世界秩序。

「這個國家的命運是交付給它千百萬男女的手，頭，和心中的；它對自由的信仰是受上帝的啓示的。自由是指人類權利高於一切。我們要援助爲保守這許多權利而鬥爭的人。我們目的的一致就是我們的力量。

「在這種高尚觀念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勝利。」

經過冗長的辯論，租借法案終於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由國會通過了。

「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簽定了這個法案，」總統在他「公告及演說集」第九

卷中這樣寫道：「不到幾分鐘之後；軍隊和很多作戰的物資已經迅速地運往大不列顛和希臘途中。」

富蘭克林·台爾阿諾·羅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初旬時完成了他十年總統任務，這十年以來，他的言行如果要記錄下來，卷冊一定很浩繁；但是他的進程尚未完成，他也常常不得不略作踟躕。在簽署了租借法案後幾分鐘之後，他運送作戰物資到希臘去，這就是他在進程中踟躕的時期。物資到達得太遲，這不是他的過錯。他的意思是要援助一切孕育着民主主義的國家。爲什麼要在這時期踟躕的另一個理由是租借法案是人類慷慨的實際表現，由於這種慷慨，民主政治才能茂盛而結起成熟的果實，不然民主政治即將覆滅。提出請求的是羅斯福，給予者是美國，這種言行成了人類新精神的新基礎。

在第一章中，我們曾經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羅斯福總統所保有的兩重美國精神，是不是希特勒企圖在千年內領導人類進化計劃的真正障礙？後來，我又直率地說這是本書所企圖解釋的問題。而事實上這種答案祇能從美國人民以及加拿大及拉丁美洲的人民們的供獻之中來覓取的。民主的歐洲人們覺得羅斯福總統是今日世界上最足以代表民主思想的人物，但是在最後爭執中，他的一切效力是受他國內人民們所支配的。本書是在一

九四三年寫的，答案須在日後才得分曉，而羅斯福的巨像，還須待命運來完成它，這命運是這一代美國人的會合之所。

三世紀以來，他血統中流着的荷蘭，英國，蘇格蘭，法國，瑞典乃至德國血液，混合在他一身而為美國所吸收了，這正如赫德遜河那樣由許多河流匯合起來，最後為偉大的大西洋所吸收一樣。

在短促而靜默的和平時期中，羅斯福總統面對着戰爭的無止境的毀壞，他却能看到世界全局，我們對他的能力，寄予了深刻的信仰；他的正義感是我們所熱烈信任的。在世界人士們眼中，他代表着真正的美國精神。我們發覺在處理國內事務時，他的政策也許受國人的怨恨；但是他却真能在危急中把握大局。使富蘭克林·D·羅斯福忠誠執行他份內工作的不單是一種信仰；那是一種信心——認為美國在道義上受環境的約束必須表示出兩世紀前一位人物所說的話：

☞ 我認為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一切都是天生平等，他們從造物者那邊得到了某些不變的權利，這些權利中包括了：生命、自由、和快樂的追求。爲了保有這種權利，人民組織起政府來，政府是因被治者的允許來執行它們公正的權力的。

自從一七七六年七月十四日傑佛遜先生這一席話公開於世以來，美國總統中從沒有像羅斯福先生如此地能認清自己鉅大任務的責任，以及通過那個鉅大任務，他的國家所要他完成的責任。

民主政治加了一種重荷在人類信仰上，當幻想破滅時，這種重荷往往使人難以忍受。可是作爲天創政治目的中唯一合理的觀念的民主政治，在經過外來種種打擊以及內部種種腐朽之後，却依然能存在着。

如果今日民主政治還能被認爲是人類的政治標準，這不得不歸功於富蘭克林·D·羅斯福，他用自己的活力提出昔日的語言，使它灼熱地從他嘴中吐出來。梵蒂岡信任羅斯福。受難的法國信任羅斯福。希臘信任羅斯福。波蘭信任羅斯福。荷蘭信任羅斯福。從數百年迷夢中醒來的中國信任羅斯福。多疑的拉丁美洲信任羅斯福。遭受訂購的義大利也還能信任羅斯福。英國和帝國屬地都信任羅斯福。

羅斯福：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

柏園

大西洋憲章

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提出租借法案的一年（一九四一），也就是他向世界宣布有名的四大自由的一年。這一年，在世界戰爭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同時，這一年，在世界政治的發展上也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這一年的六月，希特勒向蘇聯進攻了；這一年十二月，日本襲擊了珍珠港。當希特勒發動侵略蘇聯的戰爭時，他或者已引起一種幻想，以為可以把資本主義各國團結在暴君納粹德國的周圍，把從頭就帶有反法西斯性質的人民戰爭，轉變而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反蘇戰爭。以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這嚴重的關頭，受到非凡的考驗。

八月裏羅斯福和邱吉爾在大西洋的軍艦上會晤，是確定民主各國所應依循的路線底重要里程碑。在這個會議中，似乎羅斯福總統會努力說服邱吉爾，要他相信蘇聯的愛國戰爭是必定堅持的，而且和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反抗希特勒壓迫的戰爭，在性質上是一致

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形式上未參與任何戰爭，但實質上因通過了租借法案而成爲民主國兵工廠的美國，在賢明卓見的羅斯福領導下，努力說服英國——甚至強迫英國加強這一戰爭的民主性質，預先迫使英國放棄他的傳統的帝國主義，而爲戰後世界的民主新秩序鋪下了基石。這就是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的意義。可以說，沒有羅斯福，在那個時期是決不會有大西洋憲章的。

在羅斯福的勸勉下，邱吉爾終於同意了共同發表這一歷史性的文件。貫徹了羅斯福精神的『大西洋憲章』這樣寫道：

- 『一·英美兩國並沒有領土擴張或其他擴張的野心；
- 二·英美兩國不容許違反有關民族的自由意志而作的領土變更；
- 三·英美兩國尊重各國人民均有選擇他們所喜歡的政府方式的權利；英美兩國並且願意使一切被迫喪失宗主權與自治權的民族，能夠恢復他們所應享的權利。

四·英美兩國在與他們現存的約束不相衝突之下，將努力使一切國家，不論大小，也不論是戰勝國或是戰敗國，都能夠以平等的條件進行世界貿易，和獲取他們經濟繁榮上所必需的世界資源；

五·英美兩國將促使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密切合作，其目的則在保障各國勞動標準，經濟進展和社會安全的改善。

六·在納粹專制政權宣告最後的毀滅之後，英美兩國希望建立和平，這將使各民族都能在他們各自的國境之內安居，並將保證生活在一切國土上的一切居民，都能自由生活，免除恐懼和匱乏。

七·這樣的一種和平應該使一切人民都能毫無阻撓地橫渡公海和大洋。

八·英美兩國相信世界各國，爲了現實上的和精神上的理由，最後一定放棄暴力的使用。因爲，如果讓這些在自己的國界之外進行侵略或可能進行侵略的國家，繼續保有海陸空軍備，則未來的和平決不能維持；英美兩國相信只有解除這些國家的武裝，纔可以建立一種比較廣泛的和永久性的一般安全制度。英美兩國同時將贊助並鼓勵所有其他實際步驟，以便減輕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底軍備重擔。』

大西洋憲章的發表，顯示了羅斯福的遠瞻卓見。不管這部憲章在戰後會被近視的反動的政客們所違背，所撇開，但是它的歷史意義是不可磨滅的。靠了這！資本主義反納粹的各國，以英美爲代表，第一次明白地顯露和強調了他們的作戰目的，不是在重新分

割世界，而是在實現羅斯福總統所會宣布的四大自由。這一憲章於是成爲第二年一月一日在華盛頓簽定的二十六國宣言的基石，二十六國宣言包括了美蘇英中等反抗納粹的國家，它劈頭就這樣宣稱：

『本宣言簽字國政府，對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國總統及英國首相共同宣言（即大西洋憲章）所包含的共同目的與原則，業經予以贊成。』

而二十六國宣言又是未來的聯合國組織的最初出發點。因此，可以說，大西洋憲章不但是盟國戰時合作最初的橋梁，而且是盟國在戰後合作的最初稿矢。羅斯福在這憲章的公布中所扮演的任務，由此可以想見。

從租借法案的提出開始，羅斯福的生活就和世界人民的脈搏息息相關。然而從大西洋憲章的公布開始，羅斯福的歷史就明明白白的變成世界史的一部份。羅斯福，從這時候開始，不僅僅是美國的公民，而且還是世界的公民；不僅僅是美國的首長，而且還是盟國合作的領導人。他的一舉一動關係到整個世界了。

必須注意，其時美國還沒有對軸心宣戰。八月十五日，羅斯福和邱吉爾向斯大林保證，他們將充份援助蘇聯。九月十一日，羅斯福嚴厲地抨擊納粹，稱「納粹的潛艇和海面襲擊艦，即是大西洋上的響尾蛇。」他宣稱：「當它們襲擊懸掛美國國旗的船隻時，即是危害公海上自由通路，蔑視我們的主權，打擊我們所最珍視的權利。」到十月二十七日美國海軍日，羅斯福宣稱「美國商船必須實行武裝，以抵抗海上的響尾蛇。美輪必須能以美國貨物運往友邦的港埠。而美國海軍亦必須予以保護。美國的海軍，依循它一貫的傳統，即「管他有沒有魚雷，加緊向前開。」因此美國必能以物資運往抵抗希特勒的國家，這是可以斷言的。」

戰火燒到美國

這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攻擊珍珠港，因而把戰爭直接帶到美國。八日，美國和英國對日宣戰，十一日，美國國會對德意宣戰。緊接着的一年，羅斯福總統領導美國整個國內戰線向前進——羅斯福知道，必須加緊生產，纔能夠及時把租借物資輸送給在作戰中的盟國；纔能夠扭轉戰局，從而獲取最後的勝利。

早就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羅斯福鑒於國際局勢的嚴重，認為戰火遲早會燃燒到美國來的，所以他在那個時候便恢復國防評議會的設立，同時設置一個顧問委員會，將希爾曼(Hilman)引為勞工代表。當時是有不少人反對羅斯福把這一個產業職工大會(CIO)的領袖當做勞工代表的，有的人更善意勸告羅斯福，說最好勞工聯合會(AFL)和產大(CIO)各有一個代表。然而羅斯福認為這反而不好，反而會發生更多的紛歧意見。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成立的生產管理局(The 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以納生(William S. Knudsen)為局長，希爾曼為副局長。希爾曼和納生之間固然發生了衝突的意見，但是管理局本身卻也無權無勇——它唯一的任務祇是調整陸軍與海軍定購物品和民用物品之間的不調和。後來納爾遜(Donald M. Nelson)主持的「戰時生產局」(War Production Board)代替了生產管理局，權限和效能纔被提高了。雖然一般認為希爾曼在這當中並沒有起巨大的作用，有的評論家則以為希爾曼的天才是在組織勞工作保衛民主的鬥爭，而不是在日常事務的行政方面。這一說自有它的理由。往後希爾曼在產業職工大會里所組織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明。

由和平進入戰爭

要把一個完全與戰火隔絕開的國土上的生產，由和平時期進入戰爭時期，這是很不容易的事。這種扭轉有時比之從戰爭回復到和平需要更大的堅毅，更多的精力，和更迅速有效的步驟。羅斯福在這一方面顯露了他的卓絕的領導天才。在珍珠港事變那一年里，租借法案實際上已於年初通過了，但是這一年（一九四一）所生產的小包車，依然在三百五十萬輛以上，別的盟國可早已停止生產小包車，改製飛機和坦克了，爲什麼會如此呢？一個官方的出版物給了很好的回答：在十二月八日以前，戰火表面上還沒有認真燒到美國國土。

珍珠港事變是晴天里的一聲雷！第二年（一九四二）一月六日羅斯福向國會要求加緊生產，就是美國走進戰爭的第一個重要措置。然而那是談何容易的事情呵：羅斯福向國會提出，要把全國生產的一半獻給『作戰努力』，同時提出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度的預算爲五百六十億圓。其中百分之十五用以防禦國土，但至少百分之五十要拿來作戰。羅斯福定下了高度的生產目標：一九四二年要生產六萬架飛機，一九四三年——十二萬

五千架；一九四二年要生產四萬五千輛坦克，一九四三年——七萬五千輛。最使人吃驚的是，羅斯福竟提出要在一九四二年生產八百萬噸的船舶——可是你得知道一九四一年全年在加速生產的口號下，才不過建造了稍為超過一百萬噸！

羅斯福宣稱：

「祇有這種全面規模的生產，纔能夠加速最後的全面勝利。速度是頂重要的。地方失陷了，可以克復；時間失去了，就永遠不再來。迅速將會救活許多人命，迅速將能拯救這個國家！」

這一年（一九四二），可以說，羅斯福總統集中全力在國內戰線。他把一切可能的精力，把一切可能的人力，都集中在為生產而鬥爭的事業上。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他還要抵抗在上昇期的日本海陸空軍在太平洋上的攻勢，和抵抗還不會走下坡路的粹納海陸空軍對供應線和個別戰場的攻擊。

為了生產的加速和生產量的增加，約莫有五分三的主要作戰物資訂造契約是和一百所大企業簽訂的。鋼鐵、汽車、化學、造船這幾門產業中的巨大的康采恩，在這上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如羅斯福、華萊士一貫的政策一樣，他們決不會忘記中小工業。

在這一年當中，有七萬個重要的契約和七十萬件次要的契約是和中小工業簽訂的。就在這一年的春天，汽車製造工業完全轉變為坦克、飛機及其他作戰物資的製造場，一切汽車都停止生產，製造汽車的機器全部改裝，來生產作戰物資。

但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秋天，生產量卻有減少的傾向，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危機。危機的來源主要是在於，第一，防禦武器的生產已經足量，到這時應當改變為攻勢武器的生產；這改變影響到生產的經常進程；第二，軸心的軍事進展，會使若干原料感到缺乏。必須克服這個危機，否則美國就不能在儘速的時期內贏得戰爭。

在國內前線，羅斯福這一年確實創造了奇蹟。然而這奇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循着賢明的領導下產生的必然結果。美國人民大眾感到了他們對於反法西斯戰爭所負的責任，在羅斯福懇切的號召和合理的措置下，提供了在美國史無前例的合作。

首先，爲了安定人民的戰時生活——這是一個民主國家所異於獨裁國家底主要特徵之一——，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建立了定量分配的制度，這個制度的實施，是由新設立的『物價管制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執行的。物價管制局的另一主要目標，是要將波動的物價穩定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的價格，以這一價格爲

最高價格，來防止生活費用的增加。靠了這一合理的有效的措置，一九四二年美國批發物價雖漲了百分之十，農產品價格雖漲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已完全克服了第一次大戰時暴漲的危機。從一九三九年夏季到一九四二年底，一般估計生活費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但是珍珠港事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後的時期，在物價管制和定量配給實行之下，生活費只漲了百分之八。

因為農產品價格作有計劃的提高，刺激了農產品在一九四二年有巨大的增加；雖然勞動力和機器都缺乏，但是一九四二年播種面積增加了五百萬英畝，這一點也是賢明的措施所得到的副效果。結果，這一年糧食供應提供了百分之十二，也因此在這一年，能夠裝運四十億磅的租借物資往英國和蘇聯，而絲毫沒有壓低美國人的生活水準。

國內戰線的鬥爭

美國有一幅戰爭招貼畫，上面畫着三個人：工人，農人，士兵，手挽着手前進。要贏得戰爭，工農兵在各條戰線上同時挺進是必需的條件。在羅斯福的領導下，一千一百萬工人的領導者們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願放棄罷工權利——這一表示是有條

件的，祇要工資按照着物價的高漲而增加，他們就無需乎罷工。一九四二年正月，除了物價管制局之外，羅斯福又設置『全國戰時勞工局』(National War Labor Board)，協助物價管制局隨時穩定工資和物價。

爲了減少資家提高物價的藉口，羅斯福提出年薪五千元以下的一律加以凍結，不再調整；同時，爲了限制資家投機家靠戰爭發橫財，羅斯福又提出了每年收入除付所得稅外，不得超過二萬五千元的規定——但後一提議卻被國會所否決了。

儘管因物價波動而發生的經濟性罷工在戰爭中仍時有發現，但是因爲有了種種合理和必要的措施，所以在第二次大戰中任何一年，罷工次數都少於一九一八年（上次大戰最後一年，亦即美國實際進入戰爭的一年）和一九三七年。就統計數字來看，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每人每日）數，在第二次大戰中逐年減少。這一現象是非常難得的；一九三九年每一工人因罷工而損失的日數爲十五天；一九四一年，即美國通過租借法案但尙未正式宣戰的一年，損失爲十天；一九四二年，美國正式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對軸心作戰，損失日數爲五天；到一九四三年，盟國反法西斯戰爭已轉入優局勢的一年，除了煤礦罷工之外，只有三天。——煤礦罷工是由路易士(John L. Lewis)的「礦工聯合會」

(United Mine Workers) 所領導的，一九四三年會發生四次，每次都有四十萬礦工牽涉在內。

一九四二年羅斯福總統在國內戰線以驚人的努力，打了一場勝仗。他爲什麼會打勝仗呢？在基本上固然是由於他執行民主的開明的政策；另一方面，則由於他的民主作風。他的一個同事和朋友曾經這樣的說：『羅斯福的作風本身就是具有創造性的。他的作風是由友誼、鼓勵和信任合成的。他不肯對下屬給予直接的和特殊的指令；因此他不會消耗別人的創造性底精力。人們從他那里得到勇氣，得到力量，得知目標的崇高，得到了充分實現民主而必須獲得的領導。他能夠把許多活動弄得非常有效率。他的自由制度包括了：信任他的許多同事，和確認每一個人的價值和能力。』

卡港會議

當羅斯福致力於國內戰線的整頓的這一年，盟國對抗軸心的軍事進展，已漸漸顯露出由被動變成主動，由防禦變成進攻的轉捩傾向。這一年，隆美爾(Rommel)在北非進行了他的最後一次的攻勢，過此之後，就是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十一月），北非的戰

局顯然改觀。這一年，斯大林格勒的勝利（十一月）奠定了蘇聯反攻的始點。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攻勢也已達到最高峯，過此在後，它就不再往上昇了。

在國際政治上表現出來的，是美國和蘇聯和英國之間的日益親近。這親近的徵兆表現在：這一年五月間英蘇訂立二十年的作戰同盟暨戰後合作互助條約，六月間美蘇締結了作戰互助協定。同時，邱吉爾的聘問莫斯科，確立了英蘇兩國之間完全的相互了解。這一點對於後來的三強合作，是有着很大的意義的。

在國內前線打了勝仗，在軍事前線至少阻住了軸心的進展，在國際政治上已經爲三強團結鋪平了道路——於是羅斯福總統從一九四三年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兩個方面上，一方面是盟國戰時的合作，另一方面是盟國戰後的合作。大體上可以說，從一九四三年開始，盟國就在各戰線上開始反攻。因此，勝利雖然還很遙遠，但勝利的局勢已經定奪了；爲加速全面勝利的早日到臨，盟國在戰時的合作就必須加強；又因爲勝利之局已定，高瞻遠矚的羅斯福覺得從現在開始奠定戰後合作的基礎，已經有很迫切的需要了。

這就是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初一連串具有重大意義（對作戰和對戰後）的國際性會議的來由。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至二十六日在北非卡薩布朗加(Casablanca)港的會議，就是一連串的會議底開端。照羅斯福原定的計劃，在這里他希望見到的不僅是邱吉爾，而且還有斯大林和蔣介石。但是後兩者都不克參加，因此會議的前半部，是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會談，後半部則是法國的兩個抗戰派（戴高樂和吉羅德）被介紹與羅斯福會晤。

羅邱會談在軍事上決定了下一步驟——即進攻西西里島和把意大利擊潰的戰略；在政治上則決定敵人須『無條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這句話是羅斯福提出的。而羅斯福則是借自美國內戰時代的格蘭特將軍(General U. S. Grant)。羅斯福說，決不綏靖，決不談判，如果得不到完全澈底的勝利，決不中止戰爭；而所謂澈底勝利即意味着敵人必須無條件投降。

無條件投降原則在對德作戰是實實際際地貫徹了的；在對日作戰則表面上也是貫徹了的——但必須記得，當促使日本投降時，羅斯福總統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三個月有多了。

這一次重大的決定，可以說，是羅斯福為締造戰後世界永久和平的第一步。新近有人故意曲解為這是羅斯福對蘇聯企圖單獨媾和的一種警告，這種曲解實在是不懷好意的。

並且完全誤解或故意曲解羅斯福精神。

卡港會議的另一部份顯示了羅斯福對於戴高樂和吉羅德二人的卓見。羅斯福和戴高樂會見了之後，他認為他很不可靠。他對他的兒子伊利奧·羅斯福這樣說：

『戴高樂預備出來在法國組織一個一人政府。我簡直想不出另外一個人比他更靠不住的了。他的整個的自由法國的組織里充滿了警察間諜，他用密探來偵察他自己的人民。在他，所謂言論自由就是剝奪人民批評他的自由。在這種情形之下，誰又能完全信任在戴高樂背後支持他的那個力量呢？』

另一個法國領袖——吉羅德在羅斯福看起來，也是太不中用。吉羅德對羅斯福說，『祇要給我們武器，給我們大砲，坦克和飛機。這是我們全部的需要。』羅斯福屢次暗示他，說他未免把工作看得太容易了。但是這位將軍腦袋里面似乎祇裝着武器的觀點。因此，羅斯福對他的印象是很壞的。羅斯福說：

『我怕我們現在是依靠在一根非常脆弱的蘆葦上。——這就是墨非（美國駐北非的外交官之一）說的可以號召起法國人民的人！他是個毫不中用的行政者，也將

是一個毫不中用的領導者！』

一九四三年

從卡港會議（一月）到德黑蘭會議（十二月）這一年間，盟國的軍事進展和國際合作是有了飛躍的進步的。不能不說，促成這種飛躍的進步，羅斯福的原則和作風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卡港會議之後的戰局，大體上可以說，盟國完全反守為攻了。在北非戰場，軸心的力量已告肅清；在蘇聯戰場，蘇軍已轉入全面的反擊；在南歐戰場，由於卡港會議的決定，盟軍在西西里島登陸，很快就使三個軸心之一的意大利，在九月間向盟國無條件投降。現在，盟國所要打擊的祇有德國和日本了，爲了戰勝德國，盟國之間進一步的團結，和在這團結的基礎上開闢第二戰場，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爲了戰勝日本，盟國也必須加強東方戰場的反擊力量。

八月間在加拿大奎比克（Quebec）舉行的會議，由羅斯福、邱吉爾主持，中國則派

舖平了德黑蘭會議的道路。這一次會議，不祇討論戰爭的主題，並且討論到和平的主題。

外長會議發表了美蘇英中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決心作戰到底，『直到這些軸心國根據無條件投降而放下了武器爲止』，並確保四國自身以及盟國人民『擺脫侵略的威脅而獲得解放』，認清『必須保證迅速而有秩序地從戰爭過渡到和平，且須確立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以便全世界人類和經濟資源受軍備的牽制達到最小限度』。

這一宣言完全符合羅斯福精神。羅斯福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爲他在戰爭中常常記住如何建立戰後的永久和平。

與此同時，外長會議又宣稱三國政府將於戰後恢復奧大利的獨立，宣稱三國政府贊成意大利在退出戰爭之後恢復民主。

締造和平的理想

羅斯福從戰爭的最初日子開始，他就爲戰後如何締造和平這一課題，下了深刻的研

究工夫。這就是他後來論到頓巴敦橡園會議（聯合國組織的搖籃）時所說的：

『頓巴敦橡園會議並非在一朝一夕之間促成的。赫爾國務卿和我曾以幾年的時間從事思考、討論、準備，並和各盟國從事磋商……』（一九四四、十、二十一、在紐約外交政策協會演講）。

羅斯福在內政上的重要助手之一帕爾金絲(Perkins)曾經這樣寫道：『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在戰爭的幾年中間，他總是記住未來的和平。而且在戰爭的每一階段上，他總是關心每一個勝利，能夠如何嵌進世界未來的永久和平組織里去。』

這種偉大的理想貫徹着羅斯福的思想。這一年（一九四三）九月羅斯福對國會的咨文結語說：

『我們隨着戰爭的進展，設法使我們與他國合作，以求結束侵略和建立永久的國際關係。睦鄰政策已在美洲半球獲得這樣的成就，所以，把它普遍推行到全世界去，似乎是合理的一個重要步驟。我們要這樣做才能夠不失信於今天在國外為自由正義與安全而戰的子女們。』

他擔心着『我們為戰爭而形成的團結』：不是『我們為建設和平而形成的團結』，兩

者的距離相差太遠了。』他擔心着『戰爭終結以後——我們馬上可以聽到一種呼聲，說我們的團結是可以不必要的了。那個時候才是我們的工作真真地開始的時候。』

另外，他所擔心的是英蘇之間不容易合得來。這，即使是在戰爭中也是很值得擔心的。羅斯福會這樣說：

『戰爭是變化不定的事情。要獲得這次戰爭的勝利，我們必須與這一個盟國維持很困難的團結，而同時卻顯然地把那一個盟國置於不利的地位。要想獲得這次戰爭的勝利，我們被迫採取一種戰術上的妥協，這妥協必然地要得罪蘇聯，而使我們將來不得不採取另一種妥協，而這另一種妥協又必然地將得罪英國。總而言之，戰爭的迫切的需要主宰了一條艱難的道路。』（見 *As He Saw It* TV.）

在這期間，另一種偉大的意念在羅斯福的心中生長。『當勝利蒞臨的時候，』他說，『非等到被侵略的國家恢復法律秩序，其人民獲得正常的健康，足以生存那一天，決無安全和平可言。』（見一九四三、十一、九日演說）。

因此，在羅斯福總統的倡導之下，四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在白宮簽訂了聯合國善後救濟協定。協定的序文這樣說道：

『任何區域在解放以後，那里的人民馬上就能夠得到救濟和衣食住方面的協助，並且幫助他們預防災疫，恢復人民的健康，從事準備和部署使俘虜和流亡的人民得重歸故居，而且協助他們重新從事急需的農工業生產，恢復各種重要的服務。』

羅斯福在讚揚這一明智的預防措置時，他這樣說：

『我們推行救濟與善後的工作愈廣泛，則我們在海外的子弟愈能早歸故國。我們會與其他聯合國合作，將其原料，生產及其他資源，用以擊敗共同敵人。我們會和其他國家合作，以全力從事海陸空戰事。我們現在正擬採取為獲致勝利和奠定安全和平基礎所必要的其他聯合行動。』

『柔弱的男女在軸心鐵蹄下橫遭蹂躪，我們僅能以全世界的生產平衡全世界的需要，纔可以解除他們的痛苦。我們已經在善後救濟總署中策劃機構，以真正的民主為基礎，以便在推翻軸心以後極端緊張的日子中，能夠向這個目標前進。』（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九日演詞）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成立，用羅斯福的話說，是『面向免於匱乏的自由底實際實現，跨出勇敢的第一步。』

像這樣子，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國，就一步一步走向國際合作。為避免像上次大戰後參議院拒絕通過參加國聯促見，羅斯福總統除了在事實上促成戰後合作的可能性之外，還在法律上作了必要的準備。

這表現在：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衆議院以三六〇對二九票通過了福爾伯拉特決定（Fullbright Resolution），批准美國可以參加建造一個適當的國際機構，這個機構有相當的權力，足以建立和維持一種正義的和持久的和平。』

同年十一月五日，參議院以八十五對五票通過康納利決案（Conhelle Resolution）——這在實際上和莫斯科會議所發表的普遍安全宣言是完全一致的。

上面所曾提到過的普遍安全宣言第四條說：

『在可能實行的最早的日期，確立一種普遍的國際組織，以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為基礎，這些國家不論大小都可加入為會員國，以維繫國際

的和平與安全。』

康納利決案宣稱：

『美國通過法定手續，可與自由獨立各國共同組織及維持一個國際機構，這個機構有力量足以防止侵略和保障世界和平。』

於是乎未來國際組織的建議——這是羅斯福夢寐以求的——就在國內取得了合法的基礎。

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

現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各戰線的進展使這一偉大的理想更加需要澈底的研討了——羅斯福所渴望已久的與主要盟國領袖的會晤，終於以兩個會議的形式實現了。

由於斯大林元帥認為蘇聯尚未對日宣戰，不願與蔣委員長共同開會；因此，從十一月二十二到二十六日，羅斯福在開羅與邱、蔣會談，從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一日，羅斯福又到德黑蘭去與斯、邱會談。這就是有名的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

開羅會議是決定了遠東戰爭與和平的。關於這，羅斯福自己這樣說：

「（在開羅會議上），我們不僅解決了具體的軍事計劃，並且會商討若干具有遠大影響的原則，我們相信這些原則必能保障遠東未來的若干世代。這些原則，都極簡單而且基本，其中包括以被劫的財產歸還應得的主人。這些原則承認了遠東億萬人民的權利，使他們能夠樹立他們各自的政府形式。永遠消滅日本，使它不能夠成爲侵略的潛勢力，乃對於太平洋及世界其他部份和平與安全的必要措施。」

比較起來，德黑蘭會議更重要的世界意義。『在三日內的緊張與不斷友好討論的期間內，我們對於向德國發動大規模進攻有關的每一點，都已商得同意。』羅斯福說。

德黑蘭會議的公報非常簡短。主要的幾句話就是：

『關於戰爭方面——我們的軍事參謀曾參加我們的圓桌討論，我們已經議定了關於將德軍消滅的計劃。我們已就將從東面，西面，和南面進行的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時間，商得完全的協議。我們在這裡達到的共同默契，保證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關於和平方面——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爲一種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家負有無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這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

的災難和恐怖。』

關於這，羅斯福總統會有這樣的一段話：

『英美中蘇及其盟友，代表全球人口四分之三強，這四個國家一日以其強大的軍力團結一致，決心保持和平，則侵略國即一日不能起而發動另一次世界戰爭。但是這四個大國，必須與歐亞非美各洲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團結合作。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它的權利均應受尊重與保護。我們對於這件事的關懷程度，應與尊重和保護我國內每一個權利的程度相等。我們的敵人所依循的原則，是恃強凌弱的原則，這是我們所反對的。但同時我們卻一致認為假如我們需要武力來維持國際和平，則國際武力將使用到無須再行使用而後已。』（羅斯福對德黑蘭會議的報告詞，一九四三，十二，二十四，）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和平組織的理想，在這寥寥數語中已經大體上出現了雛形。

在這一次會議上，羅斯福很久以來就希望着的一件事，實現了。這就是和斯大林會晤。後來他在上引的報告里，會這樣的說道：

『我現在可以引用美國一句不成文法的俗語，即我和斯大林委員長相處得很好

。他是一個具有極大堅忍決心而又有強烈的善良氣質的人物。我相信他是蘇聯人民的真正代表。我相信我們和他以及蘇聯人民，都將相處得很好，而且確實相處得很好。」

他的助手之一帕爾金絲曾在她的回憶錄里寫道：「他（羅斯福）覺得他和斯大林元帥很合得來。他歡喜他，認爲他極爲可愛。他對於言語隔閡這一點感到相當的遺憾，但他卻常常打電報和寄信給斯大林。我看見過關於美國邀請蘇聯參加國際勞工組織的電報往來。……當斯大林回電說他希望把這問題稍爲攔一攔時，我向羅斯福提議再迫他去考慮一下，然後給一個決定性的答復。」

「不，我不想迫他去，」羅斯福說，「我喜歡這個人。我打算和他好好的來往。我們往後還是可以談的。」

頓巴敦橡園會議

從德黑蘭會議到下一次的三巨頭會議（雅爾達），相隔整整一年零一個月。在這些日子里面，盟軍的進展是驚人的。四月，俄羅斯戰線全面進展，克復克里米亞。六月，

盟軍在西歐登陸，開闢第二戰場。八月，巴黎解放。九月，東西兩方面的盟國向德國心臟節節推進。十月，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得了一次決定性的海戰勝利。一切的進展甚至使人以為歐洲的戰爭會在一九四四年底結束。

在這一年間（一九四四），羅斯福關切着未來世界和平組織如何建立問題；也是在這一年，羅斯福必須以加倍的精力，作競選運動。任何一個愛和平愛民主的人，即在當時也可以毫不躊躇地指出：羅斯福第四次繼任總統，對於戰後世界的局勢將有莫大的裨益。

這一年的春天，四強的專家對於建立國際貨幣基金交換了意見；這一年的夏天，盟國的代表們齊集在頓巴敦橡園，商討戰後的和平機構，建議設立一個叫做「聯合國」的國際組織，提出「國際安全組織建議案」，這就是後來聯合國憲章的雛形。羅斯福總統對於頓巴敦會議，如上面所說，會給予非常的關心，並且可以說，如果沒有羅斯福及其賢明的幕僚幾年來的研究與準備，在那樣忽忽的會議上，決不可能有如此的成就。

爲什麼羅斯福對這一次會議特別關切呢？因爲這是實現四大自由的最初一步。「我們單獨不能達成我們的偉大目標。」羅斯福自己這樣說，「我們和世界其他國家共同作

戰使我們的生活方式得以免於危亡之後，我們有前車之鑒，再不能再擺脫我們用戰爭換來的和平。』

關於這個未來的組織，羅斯福說道：

『我們目前致力於和平機構，足以證明各大國之間正以互信的精神合作。不論我們對這問題的看法如何，結果卻一定相同的，即：假如我們不和其他大國合作，則將來會有一天和他們作戰。……盟國今日的合作實在是人類歷史上的創舉。我們以密切，和諧，和有效的方式從事作戰。同時又以同樣方式建立和平。假如我們對和平方面不能維持這種關係，不能擴大和加強這種關係，則將沒有持久的和平。』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在美外交政策協會上演詞）。

事實上，在德黑蘭會議之前，羅斯福心目中的世界和平圖案，就已經在大體上與頓巴敦橡園的建議案相近似了。——或者更準確的說，是這一建議案充分的包孕了羅斯福多少時日以來的一些理想。在一九四三年，羅斯福便已經認為戰後世界和平的基礎，應該和必須建築在美蘇英這三個國家的密切團結上；這三個國家中任何一國，如有相反的意見，就可以否決任何一個重要的議案。這就是後來五強否決權的張本。羅斯福早就不

止一次說過，他同意在必要的場合，可以用武力來維持和平。他認為『殖民地制度就是製造戰爭』，從殖民地國家中搬走一切財富，這種行為就等於埋伏下戰爭的導火線。也即是說『在和平的機構尚未開始以前，你已經在否定和平機關的價值。』這些後來都成爲建議案的基礎。

競選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羅斯福進行競選。他一如往昔，到各地去巡迴演說。這些工作，對於一個在幾年間從未知什麼叫做休息的人，是過於緊張的，但是他從競選演說回來的時候卻重了十磅，身心愉快而且安適。

羅斯福的政敵——以共和黨的候選人杜威爲首，在選舉中用了極大的力量企圖擊敗他，他們甚至用最卑污的手段來污辱他；他們竟把業經處決的著匪的照片和羅斯福總統的照片刊在報紙的同一塊地方，說總統也是匪類。同時又因爲得（反動大資本家們支持，有錢有勢，抓住了戰時人民所受的痛苦和『新政』實行下的若干行政上的缺點做宣傳資料，攻擊羅斯福。但是他們的一切企圖都是枉然的。人民大眾知道誰是他們的救主，

誰是他們的敵人。希爾曼領導的『產業職工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和自由主義者合組的『獨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發動了巨大的羣衆運動來擁護羅斯福，他們提出口號，誰放棄一張票，就等於增加反對派一票——因爲：善良的公民還不十分習慣於尖銳的政治鬥爭，儘管他們心目中頗想羅斯福當選，但自己卻並不起勁去投票，而反對派則動員了一切可能的票數，企圖壓倒羅斯福。

這兩個團體果然有了很大的成績，善良的公民在他們提醒之下提高了警覺性。可是這樣一來，他們就立刻成爲所有反動勢力衆矢之的。他們不僅以這兩個團體『赤化』來恐嚇資產階級與中等階級，他們甚至以勞工爲羅斯福所『偏寵』去挑撥農民對羅斯福的感情。但是這一切卑劣的煽動，終於也失敗了。

羅斯福第四次當選總統。

羅斯福的健康情況

這一年冬天羅斯福害過一次很嚴重的傷風，大家都知道這不僅僅是普通的傷風。在傷風之前，他曾患過一次喉炎。但其時華盛頓傷風流行，誰都不去想它，但是經過幾個

星期還沒有好，大家就覺得有點不對了。他這一次患的是一種複雜的傷風，併發氣管支炎，可能還帶少許肺炎。可是不久他也總算復元了。

就職那一天，他的精神煥發，他發表了很簡短的演說。這是他四次就職演說中簡最短的一次。和以前三次就職日所不同的，祇是他不再接見大批賓客，祇接待了幾個從老遠跑來慶賀的幾個密友。

在戰爭的日子里面他老多了。他的頭髮稀疏而且花白了。他的面孔已經有了縐紋。一九三三年的雕像和一九四〇年的雕像之間，差別實在太明顯了。面孔已經厚得多；他更加像德拉諾家族了，更像他的叔叔和他的母親了。他已經消失了一直保持到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那樣的一個清瘦的年青人的相貌。這，一部份是因為刻板的生活而起的，另一部份則由於工作過多，吃得過多——他的食慾很強。他幾乎不知道他在吃什麼，但似乎什麼東西他都覺得好吃；他不加思索就會吃掉一大堆東西。他的醫生也勸他減食。但是他的精神依然很好。戰爭的緊張雖然消耗他大部份的精力，可是他仍念念不忘和平的重建。

其時，他籌備一次新的三巨頭會議，這就是雅爾達會議，他不惜跋涉長途，取道馬爾他島和埃及，然後乘飛機經希臘南端，再向東北橫跨愛琴海及黑海到達克里米亞。爲了參加這一次的會議，和在會議前後訪問其他地區，羅斯福離開美國凡五個多星期，這是他到國外去參加會議所花的時間最長的一次。

雅爾達會議由二月二日開始，繼續了八天，得出了輝煌的成果。羅斯福和斯大林、邱吉爾不僅商定了如何加緊擊潰德國，並且重申『爲和平而團結正如爲戰爭而團結的決心』。他們同意歐洲的被解放國家和以前的軸心附庸國成立他們各自選擇的政府。此外，斯大林向與會者保證在擊潰德國之後三個月內對日宣戰。

這個歷史性的會議——羅斯福所參加的最後一次的國際會議，還決定了一個重要的課題：儘可能從速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及安全。這，如公報所說，『在頓巴敦橡園會議中已經奠定了基礎。』並且決定於這一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以便依照在頓巴敦橡園非正式會議中建議的方針籌備這一種組織的憲章。』

羅斯福多少年來所日常繫念着的理想，快要實現了，雖然照羅斯福天真的想法，這

個國際組織的成員，不僅僅代表政府，還代表有關的人民。帕爾金絲有一次問他說：

『在新的國際組織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每一個國家派來一個人民代表呢？』

羅斯福的答案是：

『我不相信目前這個辦法是行得通的。我們這必須沿着我們的傳統。我們還存在着偏見。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會有那一類的事情發生。當然，假如人民和政府截然分開的時候，人民是應該導入每一種的國際組織去的。』

最後的日子

帶着喜悅的心情，拖着疲乏的身體，羅斯福回到了美國。他準備迎接即將到臨的勝利。更重要的是，他準備迎接即將形成的新理想。

四月初，他到溫泉去休假——去準備甲克遜日（Jackson）的演詞和舊金山聯合國開幕詞。他準備在四月二十五日親自出席舊金山會議，然後他計劃渡海訪英。他確信歐洲的戰事到五月底一定結束。

但是——四月十二日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留下一個暫時沒有舵手的美國，漂蕩在

漆黑的汪洋里。

杜魯門政府如何背棄了羅斯福道路

羅斯福逝世之後，按照美國憲法，由副總統杜魯門繼任。一九四五年這一年，平穩的渡過了，杜魯門可以說還不得不依循着羅斯福的道路。從四月到六月，原定的舊金山會議在比較上可以說和諧的空氣下面開過，羅斯福日夜不忘的聯合國理想得到了初步的實現。其時對德作戰已經勝利地結束了。爲了處理的戰後德國問題，美蘇英三巨頭在七月間舉行了波茨坦會議；這一次會議的決定，還是和羅斯福精神相一致的。接着對日作戰也勝利地結束了。杜魯門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其時已經開始表現出相當惡劣的傾向，這表現在對日的管制政策上，也表現在對殖民地問題（例如印尼）的處理上，同時表現在五國外長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上。五國外長會議不歡而散，已表現出美國政府如何不尊重國際團結的志向了。但是反動政客們還不敢走得太遠——因而有了十二月的莫斯科會議。美蘇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的會議，奠定了對前軸心附庸國和約的基礎，處理了有關遠東戰後局勢的諸實際問題。

但是從一九四六年開始，杜魯門政府就一天比一天更加違背羅斯福時代的精神。首先，羅斯福時代實行『新政』的一些幹員，被從政府清除出去了。——到了九月間華萊士被迫辭職這一事件，就是這一傾向的最高峯。在國內政策上，杜魯門政府已完全浪費了故羅斯福所創造的道義上與政治上的資本，物價管制局給取銷了，大資本家的貪慾一次又一次的被填滿了，人民大眾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的惡化了。『新政』已被拋在腦後；惟一可惜的是國會（羅斯福時代的遺留）還不能完全『合作』。到了這一年十一月大選中，反動派控制了國會之後，這一點保留也給完全剝去了。新的唐吉訶德們通過了一系列反勞工法案，通過了一系列維護大資本家利益的法案，杜魯門政府於是澈底地背叛了羅斯福，公然向人民進攻了。

對外政策是對內政策的繼續。對內政策既然澈底違背羅斯福精神，對外政策自然決不可能與羅斯福精神相符合。羅斯福離開這個世界之後一個短期間裏面，如上面所說，這個在作戰中的美國多少還依循着他的路線，但愈來愈離開遠了，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反動派在大選中獲勝，霸佔了國會之後，美國的對外政策就更加走上與羅斯福精神完全相反的方向。

羅斯福日夜不能忘懷的是建立一個强有力的國際機構，他在作戰的幾年間一刻都不放鬆爲着這一目標而作的努力。但是杜魯門政府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公佈所謂杜魯門主義的路線時，即使不能說已澈底放棄聯合國，至少應該說戰後的美國政府已經不重視這一機構了。羅斯福會不斷致力於盟國的團結合作，杜魯門政府則竭力用種種事實來破壞這種團結合作。羅斯福會使美國成爲英蘇之間的橋梁，杜魯門政府則害怕英蘇的接近，而以反蘇的幌子引誘英國結成所謂美英集團，從而支配整個英國。羅斯福會認爲殖民地制度就是引起戰爭的導火線，可是杜魯門政府卻正在各處燃燒起這導火線，它自己更利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優勢，在叫囂的反蘇烟幕下，建立新的實際上的殖民地。一切都循着與羅斯福路線相反的方向進行，這就是戰後美國在杜魯門政府及其主人獨佔資本家們的道路。無怪乎中間偏左的中等階級人士如華萊士等，也不斷的嗟歎已經消失了的羅斯福時代，和已被背棄了的羅斯福新政了。

然而美國人民懷念着羅斯福。英國人民也懷念着羅斯福。蘇聯人民自然懷念着羅斯福。苦難的中國人民更加懷念着羅斯福。羅斯福的理想會在他們的面前發光。是羅斯福四大自由的理想，使盟國的人民比任何時期更加勇敢的投入戰爭，投入擊潰納粹軸心的

戰爭！現在，他們看見杜魯門政府背棄了這理想，他們是多麼痛心呵；可是他們——盟國的人民，爲了實現這一理想，他們要在國內能安定而且豐足地生活，要在國際上各國和平合作，他們的力量將要匯成一條洪流，自己去爭取這一偉大的理想底實現。全世界羅斯福精神的兒女們正在向着這一目標邁進！

羅斯福年譜

一八八二年 出生

一月三十日羅斯福生於海德公園。在這之前一年（一八八一），巴拿馬運河開始建築（至一九一四年完工）。

一八八三年 一歲

法國併吞安南。卡爾·馬克思卒（一八一八——一八八三）。

一八八四年 二歲

帝國主義各國爭奪非洲殖民地。

一八八五年 三歲

柏林條約成立，帝國主義各國對瓜分非洲殖民地得到協議。

一八八六年 四歲

英國合併緬甸。

一八八七年 五歲

英意協定，維持地中海現狀。

一八八八年 六歲

威廉二世就德王位。

一八八九年 七歲

第一次泛美會議在華盛頓舉行。

一八九〇年 八歲

英法協定分割非洲殖民地。飛機發明。

一八九一年 九歲

英葡、英意就殖民地成立協議。

一八九二年 十歲

歐洲社會陷入不安（至一九〇三年）。

一八九三年 十一歲

一八九四年 十二歲

德國基爾運河竣工（北海至波羅的海）。加拿大發生金融恐慌（至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年 十三歲

德國通過反革命法案。英俄劃定帕米爾勢力範圍。

一八九六年 十四歲

羅斯福進格魯頓預備學校。英法協定保證暹羅領土統一。美國有採用金本位之議；這一年土希發生戰爭（至一八九九年）。

一八九七年 十五歲

無線電發明。這一年聖誕節羅斯福與伊麗諾第一次會面——後來她就成爲他的夫人。

一八九八年 十六歲

美國和西班牙爲爭奪殖民地發生戰爭。爲戰爭引起了熱情的羅斯福，偷偷地要加入海軍，因病未果。俾士麥卒（一八一五——一八九八）。英德祕密協定，瓜分葡萄牙殖民地。

一八九九年 十七歲

美西戰爭激化。美國國務卿海氏宣布對中國「門戶開放」政策。

一九〇〇年 十八歲

羅斯福進哈佛大學。這一年美國採用金本位制。

一九〇一年 十九歲

西沃圖·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第二次泛美會議在墨西哥城舉行。

一九〇二年 二十歲

西伯利亞鐵道完成。

一九〇三年 二十一歲

羅斯福任哈佛『緋紅報』總編輯，向伊麗諾求婚。英國宣言支配波斯灣。

一九〇四年 二十二歲

羅斯福在哈佛大學畢業，入哥倫比亞法學院研究法律。日俄戰爭於二月爆發。

一九〇五年 二十三歲

羅斯福家族的西沃圖·羅斯福第二次連任美國總統。羅斯福與伊麗諾結婚。俄羅斯

發生革命，「紅星期日」大屠殺。

一九〇六年 二十四歲

第三次泛美會議舉行。

一九〇七年 二十五歲

羅斯福修完哥倫比亞法學院的功課，經過律師考試，加入一個法律事務所做事。

一九〇八年 二十六歲

塔虎特被選爲美國總統。美日協定維持太平洋及中國現狀。

一九〇九年 二十七歲

羅斯福參加州參議員競選。

一九一〇年 二十八歲

羅斯福就任州參議員，屬民主黨，代表海德公園選區。日俄協議維持滿洲現狀。

一九一一年 二十九歲

羅斯福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爾遜競選而作種種努力。歐洲局勢緊張。

一九一二年 三十歲

威爾遜就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再度就任州參議員。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中華民

國成立。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一歲

羅斯福辭去州參議員職，就任海軍部次長。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爆發。英法協商強化。

一九一四年 三十二歲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威爾遜發表中立宣言。羅斯福參加參議員競選失敗。

一九一五年 三十三歲

羅斯福被任為舊金山博覽會委員。歐戰激化。

一九一六年 三十四歲

羅斯福實際上等於代理海軍部長，因為他的上司專心於競選工作。

一九一七年 三十五歲

美國對德宣戰，羅斯福親自赴歐洲視察。俄國發生社會主義革命。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六歲

歐戰結束，羅斯福奉派赴歐；他拒任紐約州長。

一九一九年 三十七歲

羅斯福奉命拋售美軍在海外的剩餘物資。西沃圖·羅斯福逝世。凡爾賽和約成立，準備建立國際聯盟。這一年美國國會反對威爾遜在和約簽字。反對參加國際聯盟。

一九二〇年 三十八歲

國際聯盟正式成立，沒有美國參加。羅斯福七月被民主黨推爲副總統候選人，競選失敗。美國參院否決對德和約。

一九二二年 三十九歲

羅斯福在紐約市重操律師業務；從這年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任紐約市 Fidelity and Deposit Co. 的副主任。這一年夏天羅斯福沿海灣出遊。在坎普貝羅忽然感染小兒麻痺症，結果使兩腳行動不便。

一九二二年 四十歲

羅斯福的病狀轉佳，這一年夏天他已經能支着手杖走動了。墨索里尼進軍羅馬，成立法西斯獨裁。蘇聯正式成立了。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了。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國民黨軍戰勝了希臘軍。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一歲

羅斯福仍任上述公司的職務，一直到一九二八年爲止。洛桑條約簽字；土耳其成立共和國。

一九二四年 四十二歲

羅斯福到溫泉去醫病。英法意等國承認蘇聯。外蒙宣言獨立。

一九二五年 四十三歲

羅斯福又往溫泉治病，大有起色。羅加諾會議開始。托洛茨基去職。興德堡當選德總統。

一九二六年 四十四歲

春天，羅斯福把它的溫泉治療法提供整形治療協會。協會證實了他的說法。於是羅斯福把溫泉買下來，創設喬治亞溫泉基金，開辦不求營利的機構——後來他就逝世於此——。英國礦工總罷工，歐洲相當的動亂。中國大革命開始。

一九二七年 四十五歲

英蘇絕交，中蘇絕交。在蘇聯托派被清算。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六歲

羅斯福選爲紐約州長。非戰公約在巴黎簽字。

一九二九年 四十七歲

美國發生深刻的經濟恐慌。胡佛任美國總統；工黨麥唐納在英國組閣。英蘇復交。
蘇聯實行第一次五年計劃。

一九三〇年 四十八歲

羅斯福再度被選爲紐約州長。倫敦軍縮會議開幕。

一九三一年 四十九歲

九月日本進佔瀋陽，從而進佔東三省。西班牙發生革命，成立共和政府。

一九三二年 五十歲

羅斯福被選爲美國總統。一二八之戰。（日本突攻閩北），美國宣稱不承認非法佔領。中蘇復交。國聯調查團抵華。美參議院通過菲律賓在十二年內獨立。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一歲

羅斯福就任總統。同一年，希特勒的納粹黨奪取德國政權，成爲德國的獨裁者。而羅斯福卻成爲經濟蕭條的美國底救星。他聚集了有力的『智囊團』，實行『新政』

。三月十二日，羅斯福發表第一次爐邊閒話，向全國人民解釋銀行事件。三月十六日，他提出商業調整法案，五月十七日，他提出工業復興法案。新政開始了。蘇聯實行第二次五年計劃。美國正式承認蘇聯。德日退出國聯。美國金融恐慌，禁銀出口，廢止金本位。資本主義各國在倫敦召開世界經濟會議。

一九三四年 五十二歲

蘇聯加入國聯。德總統興登堡逝世，由希特勒兼任。德宣布無力償還外債。美國加入國際勞工局。

一九三五年 五十三歲

薩爾舉行公民投票，併入德國。蘇聯清黨。

一九三六年 五十四歲

十一月美國大選，羅斯福第二次被選為總統。這一年，日德防共協定簽字。德國武裝萊茵地帶。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法國人民陣線政府成立。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強化，七月，法朗哥率兵叛亂，西班牙發生內戰。

九三七年 五十五歲

十月三日，羅斯福發表有名的『防疫』演詞。美國發生經濟恐慌。蘇聯通過新憲法。西班牙內戰激化。日本全面進攻中國。

一九三八年 五十六歲

羅斯福向國會咨文，要求強化國防。美國向日本重申對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

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德國侵佔捷克蘇台德區，捷克政府改組。德國合併奧國。

一九三九年 五十七歲

英法蘇談判決裂；德蘇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德國侵略波蘭，向英法等國宣戰。西班牙共和政府潰敗，法朗哥獨裁政府成立。蘇聯實行第三次五年計劃。羅斯福寫信給希特勒，問他願不願保證在至少十年間不侵略二十個獨立國，希特勒加以恥笑，而不答復。羅斯福提議撤銷軍火禁運案，在九月歐戰發生之後，國會通過這一法案。

一九四〇年 五十八歲

世界性的戰爭在歐洲和亞洲激化；德軍侵入法國和別的歐洲國家，英國在危急中苦撐着。羅斯福第三次被選任美國總統。這在美國是第一次發生的事。

一九四一年 五十九歲

一月，羅斯福向國會提出租借法案，使美國成爲民主國的兵工廠；同時在一月六日對國會咨文時，他提出四大自由爲未來世界的標的。三月，國會通過這法案。六月，德國侵蘇。八月，羅邱在大西洋會晤，發表「大西洋憲章」。羅斯福對蘇聯援引租借法案。十二月，日本突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接着又對德意宣戰。

一九四二年 六十歲

世界各處的戰爭激化着；民主國家在苦撐着。羅斯福全力整頓國內生產陣線。

一九四三年 六十一歲

一月，羅、邱在卡港會議，議定無條件投降原則。八月在奎比克會議，討論英美戰略。十一月，羅斯福與邱、蔣舉行開羅會議，十二月，與斯、邱舉行德黑蘭會議。

盟國在軍事上已轉入主動。

一九四四年 六十二歲

七月，羅斯福在珍珠港與太平洋區諸將領會議，決定反攻戰略。八月，羅斯福視察阿留申基地。十一月，羅斯福第四次被選爲美國總統；在美國歷史上這是破天荒的事。六月六日盟軍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與東線蘇聯夾擊納粹。

一九四五年 六十三歲

一月，羅斯福就任第四屆的總統。二月赴雅爾達與斯大林及邱吉爾會晤，商定有關戰爭與和平的基本問題，決定於四月廿五日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三月一日羅斯福回到華盛頓，不久往溫泉休息，四月十二日突然病逝。四月十四日遺體運回海德公園安葬。

四月廿五日舊金山會議如期舉行。五月九日德軍無條件投降。這一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記

這本書的中譯本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即羅斯福就任第四次總統的那一個月——在重慶印行的。原書雖引用了一點點一九四三年的材料，但實際上是講到一九四一年初租借法案通過的時候爲止的。中譯本出版後不到四個月，羅斯福總統逝世，於是，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這一段歷史，本來已經是非常重要的了；這樣一來，就更顯得重要。但是原文戰後有沒有新版，我們此刻還不知道；紐約時報的書評周刊有一次曾檢閱了有關羅斯福傳記這一類的全部著作，可是其中偏漏了這一本。印行中譯本的出版家，爲了使讀者更加明瞭這一段重要的歷史起見，打算在譯本後面增補一章，敘述羅斯福總統的最後幾年的生活，再附論羅斯福精神在今天如何被美國政客所違背。這種增補有兩種方式：一是摹仿原作者的筆調，一是擇現成的論文輯譯；前一種方法雖似比較完整，但不容易做得到，做得不好，反而弄糟了原作；後一種方式似乎容易，但選來選去，結果還是選不出完整的一組論文。因此，受委託增補的人，就祇好硬着頭皮，把手頭所能得到的一點點材料，寫成現在附在書末的這一篇不到二萬字的東西；另外增補了原書的過於

簡略的年表，成爲現在的年譜，按照原書排在全書之末，給讀者做參考。這些增補的東西，與原書自然不十分溶成一體，不過提供一點事實，使讀者更加明瞭這個偉大人物的理想和實際罷了。

柏園

一九四七年八月。